

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

緊急時期的上

每冊實價捌角正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錢亦石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再版

代序

——世界現勢與中國——

國際間的風雲，的確日趨險惡了！如果我們肯睜開眼睛，無論在西方或東方，都可看出暴風雨快要襲來，祇須再加上一個偶然的因素，我們立刻可以見到刺目的閃電，可以聽到震耳的春雷。倘若暴風雨一旦降臨，倒霉的不僅是那些竹籬茅舍的貧家小戶，連住在洋樓廣廈的貴人，也不能不受到若干恐怖吧！

中國是東亞風雲的中心，自「九一八」以來，在暴力侵略的過程中，國土一大塊一大塊的被強鄰割去，到現在，還是「見其進未見其止」。而且別處的天空一發生陰霾，每每又影響到東亞，使東亞的風雲爲之變色。近幾年來的中國，就

在這種環境下受人擺佈，即是說，國際舞台上的任何事變，給中國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所以，我們想突破當前的危機，就不能不認清世界現勢。

誰都知道：戰後國際形勢的特徵，是有兩個不同的世界，一為資本主義世界，另一為社會主義世界。我們要從萬分繁複的現象中，看出全世界的真面目，必須懂得兩個世界的矛盾，乃是一切矛盾的基點。在這一基點之上，英法在歐洲會演過多次反蘇聯的趣劇。不料二三年來，法國已從蘇聯之敵變為蘇聯之友，法蘇互助公約業由法國參眾兩院通過了，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最近英蘇關係也有相當轉變，至少應該說：這兩個國家在目前沒有直接正面的衝突。可是英法暫時放棄反蘇聯的任務，並不是說兩個世界的矛盾從此消滅，正相反，反蘇聯的大旗已落到日德兩國的肩上了。日本在東亞方面向以反蘇聯號召的，「滿」蘇邊境問題與「滿」蒙邊境問題，不斷的引起紛擾，隨時有火併的可能。希特勒在西方也有瓜分烏克蘭的計畫，米美爾問題或者是進攻蘇聯的入口吧。這兩個「黑

花臉」不僅在暗中眉來眼去，而且已勾搭成功，所謂日德同盟當然以反蘇聯爲其主要的對象。橫臥歐亞之間的大熊，是這樣被人暗算的！

無論各資本主義國家怎樣想在反蘇聯這一點上共謀團結，然而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裂痕，——不，相互間不可逾越的鴻溝，總是一天天擴大。就西歐言，法德的世仇，英意由東非問題所引起的惡感，都無法消滅。而且維持歐洲安全的羅迦諾公約居然被希特勒撕破，不許駐兵的萊因區又重見「第三帝國」的鐵騎了。這麼一來，火藥庫遍地的歐洲似乎有火光燭天的危險了。東亞呢？情形也沒有兩樣。日美的盤馬彎弓不必說了，就是老盟友的英日近來亦有互不相下之勢。英國所公佈的國防計畫白皮書，強化海陸空軍，強化遠東的防務，頗使日本感受不快。太平洋上的怒濤與歐洲的火藥庫是一樣可怕的。

不過差強人意的有一件事，那就是和平運動的抬頭。集體安全制度本是蘇聯提出的，近來已得到若干國家——維持現狀的國家——的贊成，尤其是人民陣線

勝利後的法國更藉蘇聯以自重，前面所說的法蘇互助公約早經參眾兩院通過，便是鐵一般的證明。就是英國在德意兩個法西國家狼狽相依的時候，也不得不在英法合作的式形下，共同對付侵略者。甚至新世界的美國，近來受到世界大戰的威脅，亦在汎美和平會議的形式下，拉攏拉丁美洲各國以與外來的侵略者對抗。儘管資本主義國家接受集體安全制度的動機，及其終極目的，與蘇聯不同，可是既經在事實上參加這種制度，無疑的要使緊張的時局暫時鬆一口氣。

如上所述，我們似乎還可以說：目前國際形勢仍處在戰爭與和平的歧路中。固然，從某一方面去看，戰爭的因素正在增加，然而從另一方面去看，和平的曙光仍未斷絕。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們中國——俯仰由人的中國，就遇到空前的危機了！如果戰爭爆發（不管從西歐開始或從東亞開始），整個中國就會很快的陷入炮火之中，我們的一切都不可避免的要化為灰燼。如果和平的局面，還可撐持下去，侵略者當然要利用這一瞬間的和平來準備大屠殺；而我們的強隣，又當然

要趁大屠殺未開幕以前，想一口氣把中國吞下去，藉此爭取未來大屠殺的勝利。這即是說，暫時的和平也不見得是中國之福。

那麼，難道中國就無路可走麼？不是！決不是！中國雖遇到空前的危機，並非無路可走，我們是被宰割者，被宰割者如能不怕犧牲，與敵人決鬥，則我們的前面仍有一條生路。不過這條生路決不是那些甘心做順民的中國人所能達到的。

阿比西尼亞的抗意戰爭，印度、埃及與巴力斯坦的反英怒潮，敘里亞的反法運動，都是被宰割者自求解放的榜樣。我們要趁世界大戰未爆發的時候，來準備武裝抗敵的工作；我們利用國際間的各種矛盾，來確定革命外交的方針，我們要聯合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集體安全制度，來制止戰爭的爆發。我們不相信什麼「流血感化論」，等待敵人自動的放下屠刀，我們要衝上前去，奪取敵人的屠刀，並逼迫他們縮回侵略的魔手。

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焦點，是世界問題的重心，同時也是世界現勢轉變的

關鍵。所以，中國的命運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世界的命運也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我們要拯救中國，我們要改造世界，我們拯救中國即是改造世界的起點！
為改造世界而拯救中國，我們的勢力決不是孤立的。我們振起勇氣吧！我們大家奮起爭回中國的運命吧！

目次

代序——世界現勢與中國……………一

上篇 世界政治的演變

大戰前後各國政治制度的總輪廓……………一

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二

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三

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五

世界進入一九三七年……………七

中篇 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

世界經濟危機與第二次大戰·····	一九五
現代中國經濟的檢討·····	二〇〇
拉西曼報告書的研究·····	二一五
論中日經濟提攜·····	一九五
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危機·····	二二二

下篇 世界與中國的前途

世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	二三一
中國國民經濟的出路·····	二四六
太平洋民族解放的展望·····	二六七

中日關係的前途·····	二〇〇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前途·····	二五〇
世界和平還能挽救嗎·····	三〇〇
中國能跳出半殖民地嗎·····	三二二
今後各國政治制度發展的趨勢·····	三六六
附錄	
民主政治論·····	三九〇
校後記·····	三六一

大戰前後各國政治制度的總輪廓

一國的政治制度，是與一國的經濟組織分不開的。用現代社會科學的術語說，後者是真實基礎 (Real Foundation)，前者是上層建築 (Super-structure)，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分不開，正如上層建築與真實基礎分不開一樣。我們常聽到這兩句名言：『風磨機 (Wind mill) 給我們以封建貴族統治的社會，蒸汽磨機 (Steam-mill) 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風磨機與封建貴族統治有什麼關係呢？蒸汽磨機與工業資本家統治又有什麼關係呢？正確的解答，就是：某種生產力乃產生某種經濟，某種經濟乃產生某種政治。這是從社會的靜態說的。我們又常聽到：『經濟基礎一有變動，巨大的上層建築便隨之而緩慢的或急劇的變革』的名言，這即是說，經濟基礎的變化，可以引起政治方面的變化，可以決定

政治方面的變化。這是從社會的動態說的。無論從靜態觀察也好，從動態觀察也好，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總有拆不散的姻緣。

我不想把話頭拉得太遠，就以法國大革命爲例，作一個具體的說明吧！

真的，如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所說：「使全歐震動的，推翻了一切的，數年之內開始全部改造工作的法國大革命，是如宇宙的自然力一樣，分解而又集合，創造了一整個的世界。」在這被創造的世界上面，最引人注目的是：高豎着「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從此以後，議會政治便鼓盪而成時代的怒潮。這不是偶然的，簡單些說，就是法國的經濟條件，在當時已跳出封建制度的樊籠而走上資本主義的大道了。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時代最流行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種子萌發之處，即是議會政治降臨之處。一部十九世紀歐洲政治史很透徹的把這種事實說明了。豈僅歐洲如此，即落後的亞洲也不是例外，日本的明治維新固不用說了，就是中國的辛亥革命亦何常不是依照法國大革命的模型來改造東方

呢？

如上所述，議會政治以資本主義為地盤，本是歷史上的鐵案，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可是這似乎祇適用於初期的資本主義，即是說祇適用於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處在自由競爭的階段，新興的資產階級要壓倒舊的封建勢力以謀自己經濟的發展，不能不在政治上取得一種武器；議會政治就是資產階級藉以壓倒封建勢力的武器，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防止封建勢力復活的武器。所以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與議會政治，成了相依為命的伴侶。然而萬物是生長流變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到了其本身所包含的各種因素完全暴露的時候，即變為與原來相反的另一種東西。更明白一點說，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由競爭，採用大魚吃小魚的方法，即大資本吞併小資本的方法，不可避免的要變為資本主義末期的壟斷制度。從自由競爭（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到壟斷制度（金融資本主義時期），即是資本主義生長流變的結果。在壟斷制度形成以後，甚至在壟斷制

度形成的過程中，則其從前相依爲命的伴侶——議會政治——也漸漸等於「秋風團扇」了，所以當帝國主義時代，即金融資本壟斷一切的時代，不僅各國相互間的經濟關係有所改變，並且各國的政治形式，政府性質，以及國家各種機關制度，亦不得不有適應的改變。在從前，議會政治的德謨克拉西，有決定的作用；但到帝國主義時代，所謂議會制度不過是金融資本的裝飾品而已，不過是唯唯諾諾的機關而已。議員的莊嚴神聖，早被卡特爾 (Cartel)、辛狄加 (Syndicate)、托辣司 (Trust)……的鐵帚掃得乾乾淨淨。的確，議會政治在某些國家內已經名存實亡了。

這還是就大戰以前說的。歷史的車輪轉到一九一四年，人類大屠殺的悲劇發生了。在砲聲隆隆的時候，軍權高於一切，德國的威廉第二固然是個專制魔王，就是法國的克雷孟梭 (Clemenceau) 也染上獨裁的色彩，議會政治似乎已臨到末日了。然而歷史的發展，畢竟是迂迴曲折的，有時彷彿是前進一步後退兩

步。戰後的情形，就一般說，本是議會政治沒落時期；可是在趨向沒落之中，仍有迴光返照的現象。大戰的火燄，一方面毀滅了四千萬人的生命，毀滅了參戰國家四十二年的國庫總收入；另一方面却葬送了若干王朝，特別是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哈布斯堡（Habsburg）、羅門諾夫（Romanoff）三個根深蒂固的王朝。於是南斯拉夫的科佛宣言（Declaration of Corfu）發表了，德意志的威瑪爾憲法（Weimar Constitution）公佈了，俄羅斯的尼古拉第二（Nicholas II）、奧匈的查利皇帝（Emperor Charles）都成爲階下囚了。老牌的國家如德俄奧匈既宣布共和；新興的國家如波蘭、捷克斯拉夫，芬蘭、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以及土耳其，已不要皇帝；就是戰後擴大起來的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也於保存王政之外，施行議會政治。在這些事實之前，竟有若干政論家誤信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屠殺，是「爲德謨克拉西而戰」（War for democracy）。

是的，從表面去看，當時德謨克拉西的呼聲是比較流行的。各國都要求有代

表民意的議會機關，這種議會機關多為兩院制；此外應該有一個大總統，或是一個由憲法嚴密限制其權力的國王；內閣對議會負責；所有這些，都未跳出十九世紀德謨克拉西的範圍。而各國製定的新憲法，大抵率由舊章，有的仿效英國，有的仿效美國，但以仿效法國者為最多。為什麼如此？據一般的解釋，凡是製定新憲法的國家，不是因戰敗而改造，便是因和約而產生，當它們製定新憲法的時候，對於協約國的喜怒，不能不妥為留意，於是東施效顰，爭以戰勝各國的憲法為榜樣。意在謀得協約國早日承認而已。至於仿效法國者為最多，則以法國乃小黨林立的國家，與英美由兩大政黨更迭主政者不同。新興各國都贊成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實行比例代表制的結果，勢必產生多數政黨，依照這種情形，與其仿效英美，倒不如仿效法國更為適宜。

如果撇開表面的現象而進一步觀察，我們不難窺見戰後德謨克拉西的極盛一時，彷彿如小兒吹泡沫一樣，在某一剎那間，固然紅紅綠綠煞是好看，但時過境

遷即化爲烏有。新興各國的憲法，說起來是冠冕堂皇的。然在事實上，或視爲具文，或任意修改，甚至不惜公開的用指揮刀戳破。議會機關就算僥倖存在的話，也決不是代表民意，而已經老老實實的變成強有力者的御用工具。戰後德謨克拉克西的招牌，簡直是「掛羊頭賣狗肉」，這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要追問何以有這種事實，那就不能不說是戰後的經濟條件所造成的。因爲在大戰期內，資本主義機構受了無可醫治的創傷，加以戰後數年中，經濟危機日益劇烈，震撼了各國的基礎，在杌隉不安的情形下，議會政治的德謨克拉克西自然要成爲「贅瘤」。如果這種解釋不錯，我們應該說，在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議會政治已經宣告破產了。

正因爲戰後的經濟條件不同，所以戰後的政治制度不得不發生劃時代的轉變。剛才說過：議會政治已經宣告破產，這是有事實證明的。試問在這件事實的基礎上，戰後的政治制度朝着某種方向發展呢？或者說戰後的政治制度有什麼特

徵呢？

第一、革命後的俄羅斯（蘇聯）另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本來，在羅門諾夫王朝推翻之後，西歐的乃至俄羅斯的某些社會主義者希望俄羅斯建樹一個議會國家的新模型；可是事實證明在俄羅斯沒有議會制度立足的餘地，未幾，克倫斯基（Kerensky）的臨時政府崩潰了，代之而起者不是什麼議會制度，而是在革命的建築師（列寧）指導之下，成立一個新國家——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議），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在匈牙利，在巴威利亞（Bavaria），在保加利亞，各照這個新國家的模型仿製過，但都失敗了。到現在，祇有這一座「魯靈光殿」在六分之一的世界上巍然獨存，雖說十餘年來，受過不少的咒詛、憎恨與襲擊，然而畢竟站穩了。這是戰後政治制度的一種特徵。

第二、戰後的意大利，所走的道路正與俄羅斯相反，自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進軍羅馬後即宣布法西斯專政，這種專政的形式既與議會制度不同，又與蘇維埃制

度不同，而以建立所謂職團國家 (Corporate state) 相標榜。在這種制度之下，單是一個公民並沒有選舉權，有選舉權的公民須是某一職業團體的屬員，而這種職業團體須經法西政府許可；同時候選人名單又須先由法西最高會議圈定，可見所謂選舉不過是墨索里尼自求合法的一種手續而已。在德國活躍的國社黨，雖與意大利的情形不盡相同，然而同是法西專政。這是戰後政治制度的另一特徵。

這兩種特徵，擺在我們面前，應該怎樣加以解釋呢？前面不是說過：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嗎？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已經炸裂的地方，資本主義宣告死亡，而經濟組織正向更高的階段發展，在這種新環境下，自然有新政治制度產生，蘇聯即其代表。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尚未炸裂的地方，金融資本正在絕望中掙扎，以過去的政治制度不能維持秩序，遂用「新法寶」來應付。意大利即其代表。這兩種特徵，雖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產物，却代表兩個歷史階段。此外，應該談到的，還有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制度。我們知道：帝國主義

是向來用鐵練把殖民地鎖住，絲毫不肯放鬆的。不料在戰後，殖民地的奴隸們蠢動起來了，這確是一件麻煩的事。怎麼辦呢？帝國主義就因時制宜的採用所謂兩重政策 (Dual Policy)，即對高等奴隸表示寬大，對下等奴隸加緊壓迫。關於後者，自然是乞靈於鎗斃，要下等奴隸在鎗斃之前馴伏；這一點，是我們中國人受慣了的，勿須詳細說明。關於前者，則以憲法或自治等美名來賣弄欺騙手腕，使高等奴隸的代表坐在殖民地的議會席上甘心為帝國主義捧場，甚至在緊急關頭，代帝國主義挺身而出馬來鎮壓下等奴隸的反叛。帝國主義把自己國內過時的「陳貨」——議會政治——拿到殖民地來做「靈符」，這種「無用之用」，恐怕也是戰後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新花樣吧！

這是大戰前後各國政治制度的總輪廓

一九三六年一月

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

一 國際形勢的總輪廓

多災多難的一九三三年總算已過去了，前進的時間軌道上，正寫着「一九三四年」幾個大字。我們臨到迎新送舊的年關，要預測國際政治舞台上的新希望如何，不得不從一年來萬分複雜的事變中，先透視出一個總輪廓。

誰也知道，國際政治是與國際經濟分不開的。四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鐵鞭」，把許多講體面的國家打得焦頭爛額，幾個主要部門的生產倒退了三、四十年，降落到十九世紀末葉的水平線下，危機中的損失約與一九一四——一八八〇年帝國主義大戰時的耗費相等。近來有些國家的工業生產雖有相當進步，但其進

步是不平衡的，而且建築在加緊備戰與通貨膨脹（Inflation）之基礎上，這自然不是逃出危機的象徵，而是從一種危機轉入另一種危機的信號。在鐵的事實之前，我們應該說：資本主義相對穩定（Relative Stability）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其前途是動亂，是崩潰，是毀滅。

然而，在資本主義沒落的過程中，却又出現了一塊別開生面的國土——蘇聯，其社會、經濟制度與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近五年來，從事國內建設，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以及文化革命的成績，蒸蒸日上，目前正走向社會主義的坦途。假使說，資本主義世界已陷溺於一望無際之危機的大海中，那麼，社會主義的蘇聯就成爲繁榮的孤島了。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便把整個的地球分割爲「兩個世界」，這是國際形勢現階段的特點。

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世界中，國際關係呈現異常的複雜性，申言之，即現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擺列着許多尖銳的矛盾。首先要指出的，蘇聯是整個

資本主義世界的死對頭，資本主義各國常欲結成聯合戰線，撲滅這個社會主義的「怪物」，以謀奪回六分之一的市場，消售生產過剩的商品，躍躍欲試的日本，目前已在扮演反蘇聯的先鋒，這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其次，資本主義各國依照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不平衡的定律，重分世界，已提到議事日程上，在關稅戰、貿易戰、貨幣戰……白熱化的過程中，時時有武裝衝突的可能，這是資本主義各國相互之間的矛盾。其次，資本主義國家是以榨取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為生存基礎的，到了經濟危機無法克服的時候，更企圖將危機中的損失，盡量的轉嫁到弱小民族身上，因此，各弱小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亦日趨高漲，這是資本主義各國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矛盾。最後，還有資本主義國內失業羣衆與半失業羣衆，他們生活於飢餓線下，成為經常騷亂之源，甚至黃金集中的美國，在「藍鷹」滿天飛的「產業復興」聲中，也無法消弭西部的農民暴動，這是資本主義各國內部的矛盾。上述四種矛盾，參伍錯綜，形成百花撩亂之觀；而在國際

政治舞台上活躍的人們，絞盡腦汁，或賣弄縱橫捭闔的外交政策，或實行變本加厲的統治方針，都不能把這些矛盾緩和下去；反之，這些矛盾却又日益尖銳起來，釀成「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嚴重狀態。老實說，目前的國際形勢，正處在戰爭與革命快要爆發的前夜。

二 無法膠合的破局

一年來嚴重的事變，暴露了國際政治的破局，有下面幾個問題可以證明：

滿洲問題，自李頓報告書提出國聯後，曾引起各國外交家針鋒相對的舌戰，初以英法袒日之故，未有具體的決議。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十九國委員會重開，仍以調解為詞，延宕時日。到一月二十三日，方決定由九人委員會起草報告；到羅斯福明白宣佈遠東政策不變，金元外交在幕後活躍，才使英法態度為之轉移；於是在二月二十四日的國聯大會通過不承認「滿洲國」的決議。遲至六月

十二日，以通告形式送達各國，聲明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均繼續不承認「滿洲國」偽組織。這是國聯裁制日本之最後的武器。可是，「滿洲國」並不因國聯的一紙通告而消滅，依然是日本的傀儡，依然是進窺關內擾亂平津的根據地，依然是遼東戰爭乃至世界戰爭的火藥庫。而且日本悍然不顧，宣告退出國聯，這樣一來，無異把日內瓦的「紙老虎」戳破了。此其一。

國聯本是受不起一拳的東西，自日本退出以後，便害了半身不遂之症。雖然有西門彭古之流的外交家粉墨登場，總不能引起觀衆聯翩入座，「門前冷落車馬稀」，日內瓦的湖光且爲之減色。不料「禍不單行」，到十月半間，希特勒以德軍備平等的要求受英法的壓抑無法通過，遂繼日本之後退出國聯，於是半身不遂的機關便因希特勒的一顆炸彈而斷了氣。從此以後，凡爾賽系統再不能在主持「公道」、主持「正義」的掩飾之下幹那些宰割弱小民族的勾當了。近來墨索里尼不惜明目張膽號召改組國聯運動，即幸而「借屍還魂」，也不能恢復昔日的舊

威風。有十四年歷史的國聯，居然一蹶不振，從英法兩國看來，總是倒臺之事。此其二。

其次，開會次數最多而結果毫無的，恐怕要算軍縮會議了。過去的軍縮會議，把各國的矛盾發揮盡致，以至有人譏其為討論戰法的陸軍大學，可謂一語破的。一九三三年一月，軍縮會議繼續開幕，以各國提案太多，無法調和陷於僵局。到三月二十七日始決定以英國方案為未來軍縮公約討論的基礎。四月間，德國代表演說，要求實際的軍備平等權，法國代表則予以嚴厲的反駁，會議形勢因而緊張。同時，又討論統一軍制與限制私家軍力，更使德國不能容忍。五月間，在羅斯福的和平申請書發出以後，德國態度略有改變。六月初，祇通過英國裁軍第一讀，即行休會。在倫敦經濟會議期內，漢德森（軍縮會議主席）常一人出入於會議休息室中，欲與人談軍縮，無一應者，亦可窺見軍縮前途之黯淡了。自八月杪，台維斯重返歐洲後，奔走於倫敦與巴黎之間，形成英美對法讓步對德

壓迫的形勢，而意大利則仍袒德。到十月十三日西門的新提案發表時，問題就鬧翻了。這次新提案的內容，除拒絕德國軍備平等的要求外，並設立適當的監督制，不待言，這是爲對德而設的圈套。於是德國在十月十六日軍縮會議未開之前，便聲明退出軍縮會議。這樣一來，矛盾百出的軍縮，連開會也不可能了。近兩月來，不管是意大利從中調停，或是德法直接談判，都無一點結果，軍縮會議遂入於長期休眠狀態。目前雖預定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重行召集，但能否成爲事實，祇有「天曉得」。騙人的軍縮會議既經擱淺，於是各國就彰明較著的從事軍備競賽了。此其三。

最後，還有所謂「世界經濟之癌」的戰債問題。戰債本與賠款有連帶關係的，自賠款問題在洛桑會議中規定相當辦法後，歐洲各國想借戰債問題結成反美的聯合戰線，而美國亦利用戰債問題以干涉歐洲的事件，或者借此挾制英法以干涉遠東的事件。美國明知歐洲各國大半無力還債，在事實上，一九三二年十

二月半到期的戰債，英、意、捷克、芬蘭、萊多尼亞、立陶宛等國雖已照付，而法、比、波蘭、愛沙尼亞、匈牙利則拖欠至今，但美國不願痛快的把戰債勾消，自然有其妙用。倫敦經濟會議時，麥唐納會說到戰債爲一般繁榮恢復的障礙，此事必須作一勞永逸的解決；而美國首席代表赫爾聞麥氏涉及戰債，極爲懊惱，甚至以不出席的形式表示抗議，一直到英國致牒聲明關於六月十五日到期的戰債，願繳付一部分，赫爾始重返會場。這一幕滑稽劇，把戰債的僵局形容透了。十月間，英美兩國代表在華盛頓會開過正式談判，亦無結果。最近十二月半到期的戰債，法比聲明不付，英國祇允付半數，而始終未應付一次者僅芬蘭一國而已。到現在，拖欠已成常例，解決遙遙無期。此其四。

以上四個問題，即是大破局的寫真，即是資本主義矛盾的反映，無論是誰，手中縱有鳩身補天之石，也不能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把這種破局膠合起來。

三 破局中的新現象

國際政治的破局本不始於一九三三年，其病根是老早種下的；不過，到了一九三三年，破局愈鬧愈大，彷彿像橫流潰決一樣，益發不可收拾而已。我們在大破局之前，固不可存隔岸觀火之心，亦無須有扼腕太息之感，應該很冷靜的認識破局中的新現象。

一年來的破局中，特別惹人注意的，就是法西運動的昂揚。法西是否可成一種主義？那是別一問題；但既出現於國際政治舞台，自然有其存在的根據。一般說來，在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現階段，議會政治表現破產，即當有新的統治形式起而代之，發揮應有盡有的強制與暴力，以維持「儂焉不可終日」的統治。法西運動是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其客觀的條件，大抵是（一）資本主義的動搖，（二）貧窮化了的中間階層的存在，（三）下層羣衆的鬥爭劇烈。墨索里尼在意

大利專政十年，可以看做法西運動典型的標本。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杪，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即是法西運動活躍的具體表現。從此以後，「褐色恐怖」的空氣就瀰漫於歐洲大陸了。在德意兩國法西「同志」相互提攜之下（自然兩國之間還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給許多國家以威脅，相驚伯有，若大亂將至似的，以此引起普遍的反法西運動。另一方面，也有些國家走上法西運動的羊腸小道，以期偷渡難關，即與德國極端對立的奧大利，在鐵腕總理陶爾斐斯統治之下，其情況也是如此。甚至有人認為美國經濟復興運動亦係採用法西手段以貫徹其政策，羅斯福儼然成了一個變相的狄克特多 (dictator)。至於日本，法西運動風靡全國，更是有目共觀的實例。在這些事實之上，可以說，一九三三年是法西運動拚命掙扎之年。

其次，幾個主要的國家，如英、美、日、法、德、意等，在經濟上有所謂「亞泰基」(Antarchy——經濟的國家主義)的形式，都想損人利己，實行「以

鄰爲壑」的政策，各種經濟戰的武器似乎都用盡了。這正如美國花旗銀行公報所說：「世界各國好像沉溺大海的一羣人，都想把自己立在別人的肩以上以謀自救，其結果，不過更加迅速的同沉於海底罷了。」這段話，恰是倫敦經濟會議內幕的素描。在這種經濟政策之上反映出來的國際關係，就構成各國政治的孤立，上述幾個主要的國家，無一不是「落落寡合」的（附庸國除外）。所異者祇是孤立的程度不同而已。不錯，四強公約，本是墨索里尼拉德制法的一篇得意文章，可是，原案內關於修改和約的條文終於刪去，仍不能改進歐洲的現狀。所以，英美衝突、日美衝突、日英衝突、德法衝突、法意衝突，一年來特別尖銳，甚至德意兩國本是法西「同志」，又係凡爾賽系統下的反對者，但對奧國問題，亦有不可調和的利害衝突。在這樣莽如亂絲的情形之下，美國欲在自己領導下建立反英的集團，却因戰債問題與安定貨幣問題的暗礁，無法拉攏法國。英國欲在自己領導下建立反美的集團，却因亞非兩洲市場問題的暗礁，無法拉攏日本。德意欲通力

合作建立反凡爾賽的集團，却因中歐與南歐問題的暗礁，無法結成牢固戰線。結果，依然一盤散沙，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三國同盟、三國協約的局面都辦不到，這也許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注定的命運！資本主義各國在政治上孤立的現象，到一九三三年幾乎跟着經濟的「亞泰基」而達於最高峯。

此外，一年來顯著的新現象，恐怕要算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暫時的平衡吧！前面說過：蘇聯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死對頭。可是，在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關係惡化的時候，更詳細些說，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感受戰爭危險的時候，（國內矛盾緊張自然也有關係，）它們不得不暫時放棄仇視的態度，向蘇聯送秋波，希望與蘇聯攜手共同制止戰爭的爆發。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的和平政策就有運用的餘地了。法蘇親善，美蘇復交，即是具體的證明。法國向來是反蘇聯的主謀者，因看到德國國社黨的強大，影響到「安全保障」，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冬天即與蘇聯互換不侵犯條約。自希特勒登台以後，法國更向蘇聯表示好感，

羅馬尼亞對蘇聯關係的改善（如簽訂多邊公約），當然是法郎外交之力。美國十六年來與蘇聯不通使節，可說是反蘇聯的健將；然到遠東戰爭萬分危急之際，羅斯福即自動的致電蘇聯，希望恢復兩國的正常關係，藉此共同裁制日本。及李維諾夫抵美後，復交談判，很順利的成功。遠東緊張的局面，從此鬆一口氣了。法美兩國外交政策的轉變，的確有助於世界和平，這是一九三三年大破局中差強人意之事。

四 戰爭威脅與和平勝利

現在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世界，資本主義既陷入危機的泥坑中，除了戰爭沒有其他出路。因此，戰爭之神與資本主義結了不解之緣。而社會主義既無危機，自無訴於戰爭的必要，因此，和平之神，又與社會主義結了不解之緣。目前是「兩個世界」分庭抗禮的時代，即是戰爭與和平對立發展的時代，所以，

一九三三年是戰爭威脅之年，同時又是和平勝利之年。

先從戰爭方面說起：記得摩溫克在第十四屆國聯大會開幕詞中，曾說過一句「戰爭的可能性瀰漫全球」的漂亮話，從這句話中可以窺見目前嚴重的局勢。就事實說吧！南美的哥（哥崙比亞）秘（秘魯）戰爭，玻（玻璃維亞）巴（巴拉圭）戰爭已經先後開火。遠東則自九一八以來，隆隆的炮聲始終沒有停止過；到一九三三年更急轉直下，日本的鐵騎居然從熱河察哈爾而蹂躪到華北，古代用以「拒胡」的萬里長城，拒不了近代的飛機重砲。這樣看來，戰爭不僅是「可能」，而且已變成「現實」了。不過，這種戰禍還祇限於一隅，尙未蔓延到全世界。自東京售路會議擱淺後，尤其是自「菱刈文件」宣佈後，遠東天空，全爲陰霾所蔽，日蘇兩國，戰禍迫在目前，如果一旦爆發，馬上遇到「血流漂杵」的災難。一言以蔽之，日本力征經營的滿洲即是遠東的火藥庫，炸裂只是時日問題。說到西方，火藥庫就更多了，在凡爾賽系統支配之下，擁護這一系統的國家，既

瘋狂的擴充武裝，以完成其所謂「安全保障」。同時，反對這一系統的國家，雖有些受條約的限制，無公開擴充武裝的自由，却在暗裏厲兵秣馬。希特勒在德國取得政權以後，更加速爆發戰爭的過程。遍地皆是的是火藥庫，可以在德法邊境炸裂，可以在德波邊境炸裂，可以在德奧邊境炸裂，可以在巴爾幹炸裂。倘若真炸裂了，全歐將捲入腥風血雨之中。所以，不論就遠東說，或就西歐說，戰爭的威脅，的確一天天嚴重起來。這正是資本主義沒落時期不可避免的犧牲呢！

關於和平運動方面，我們應該承認蘇聯是以和平政策相號召的，所謂和平政策，即與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分開的外交政策。過去的事實姑置不論。在一九三二年内，蘇聯已與西境毗連各國，如芬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波蘭等國簽訂不侵犯條約（祇有羅馬尼亞一國以比薩比亞問題爭執不決，故未就緒。）在一九三三年内，蘇聯所提議之「侵略者界說」已交軍縮會議安全委員會通過，孟徹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說得好：「假使這種界說規定於一九三二」

年，則日本在佔領滿洲後，將立即被人指為侵略者。」照此說來，日本就不能藉「自衛」以掩飾其暴行了，可見這種界說對於弱者是有相當利益的。到七月間，蘇聯又提出一種含有侵略者界說的多邊公約，先後簽字者有波斯、阿富汗、土耳其、波蘭、羅馬尼亞、拉特維亞、愛沙尼亞、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立陶宛、芬蘭等十一國，誠如李維諾夫所說：「這種公約是蘇聯與其鄰邦增進和平關係之新連鎖。」有了這種公約，則從波羅的海起，經東歐、中歐、南歐，以至黑海一帶，濃厚的暗雲便被和平的清風吹散了。此外，已經簽字者有意蘇不侵犯條約，希土互衛條約。在醞釀中者有黑海保安公約，德波不侵犯條約等。證明和平運動在西歐已占上風。至於前節所述的法蘇親善，與美蘇復交，更是蘇聯和平政策偉大的收穫，影響所及，足以使國際關係為之改變，在這裏用不着再說了。所有這些和平運動的成績，都是一九三三年的勝利品，在這些勝利品光輝奪目前，就是讀武主義者的荒木也拋出「召集東洋和平會議」的煙幕彈來。面孔猶惡

的戰爭之神，呼吸於熱烈的和平空氣中，終禁不住爲善的微笑啊！

五 今後的國際政局

擺在面前的問題是：在一九三四年的進程中，是和平之神制馭戰爭之神呢？還是戰爭之神壓倒和平之神呢？這是不能用武斷的語氣直截回答的。

我們知道：國際政治舞台上現存的各種矛盾不是靜止的，無論各國政治家怎樣鉤心鬥角，終究是「壓得東來西又起」。因此，今後的國際政局，固然不敢說比過去要糟糕萬分，但也不能說比過去要清明多少。其前途如何？應視各種矛盾發展的情形而定。現在且立於現實基礎之上作一度展望吧！

就西歐言，凡爾賽系統御用的國聯已成殭屍，此法蘭西之所憂而意大利之所喜也。見機而作的墨索里尼就趁此進行改組運動，擬招致美蘇參加，德日重返，這種如意算盤一旦實現，則意大利儼然成了國聯的主角，至少可使國聯擺脫法國

的支配，這樣，法國就不能獨霸歐洲了。難道法國就坐視不理麼？法即外交沒有這樣優，當然要積極活動，聯合其附庸國反對墨索里尼，使殭屍的國聯不從手中失去。所以法意矛盾必隨國聯改組運動而展開。另一方面，英國固討厭法國獨霸歐洲，同時又不願意國扶搖直上，它希望法國讓步，好拉德國回國聯，利用德與法對抗，利用法與意相持，自己從中取巧。可是，這種如意算盤也難實現，因為在凡爾賽系統支配之下，法德沒有修好的可能。現在交還薩爾區域問題，又經德國提出來了，不待言，這是法國「礙難照准」的。以後德國對內困難愈大，自然對外要求愈奢，希望圓其「第三帝國」的好夢，法德矛盾的展開，又是歷史的必然。在英、法、德、意各不相讓的環境下，歐洲形勢仍是糾纏不清的絲結，祇可用刀砍斷，不能用手解開。

就遠東言，美蘇復交的影響，在一九三四年當然要繼續的起大作用，無論美蘇關係是如何的貌合神離？但羅斯福在未逃出經濟危機襲擊以前，終不能不與蘇

聯攜手。這兩大勢力的合作，無異對遠東緊張的時局投下一劑「清涼散」，固不僅如法國航空部長所說：「蘇聯空軍力量足使日本陸相荒木躊躇顧慮」也。然從另一視角去看，日本是「不甘雌伏」的國家，其歷年夢想的大陸政策，決不因美蘇復交而放棄，終究要來一次軍事冒險。目前正在尋求「與國」，以謀跳出孤立的圍牆。最近廣田外交，除努力調整對華關係以增進戰時的便利外，並對歐美各國刷新外交的陣容，表面上是說作一九三五年第二次華府會議的預備，實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固然在矛盾百出的今日，尋求「與國」不大容易，可是，平時矛盾的存在，並不排斥戰時集團的結合。字林西報倫敦軍事通訊員會說過：德國現處四面楚歌之中有與日本締結「二強公約」的可能。依我看來，在反蘇反美的陣線之下，可與日本攜手者也許不止德國吧！到了日本有了「與國」的時候，或者設法打破美蘇聯合的時候，一九〇四——〇五年的全武行是要再演一次的。這就是說，遠東戰爭的危機，依然存在。

以上是就各國相互關係說的，至於各國內部的矛盾，也是急劇的尖銳化，在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雙流匯合的情形下面，在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情形下面，千百萬的失業者陷入飢寒交迫的火坑，其中不僅有勞動者、有農民、還有知識分子，甚至有科學家、藝術家。騷動、示威，成了家常便飯；這確是一個萬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假使一旦鬧翻的話，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危險性并不弱於戰爭。這是國際政治舞台上活躍的人們從本國內部所受到的威脅。

總括起來說：未來的一九三四年依舊是凶多吉少，世界大戰的火藥庫，時時有爆發的可能。爆發的形式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火併呢？還是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聯合進攻蘇聯呢？我認爲後者的可能性更大於前者。至於大戰在某地方爆發，或者在某月某日爆發，則是預言家的責任，在留心國際問題者看來是不重要的。同樣，斷定一九三四年一定要爆發大戰，那也是機械的說法；因爲在各國和平運動繼續擴大的時候，大戰仍可延遲下去。

一九三四年的前途，大抵是這樣：不是「陰霾蔽日」，就是「火光燭天」，再沒有第三種景象。無論人們歡迎也罷，恐怖也罷，未來的事變終於要來。「天不為無裘者不寒，地不為無舟者不水」，宇宙的本相原是非常冷酷的！怎麼辦呢？記得哲學家斯賓諾沙（Spinoza）有言：『不哭不笑，加深了解』，我們應該本此態度去迎接偉大的不平凡的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寫於露冷風凜之夜。

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

一 新火山爆發的前夜

陰霾密佈的一九三四年，已像流水一樣的消逝了，帶幾分神祕性的一九三五年，快要光臨。我們本着憧憬未來的熱情，當然希望一年勝似一年，當然希望過去陰霾密佈的天空，湧現出一輪光芒萬丈的紅日！

不幸希望是希望，事實是事實。依據事實講話，我想：如果全智全能的「上帝」沒有趁着新舊交替的年關，把世界澈底改造過，則未來的一九三五年，不見得比過去「清明」。豈止不「清明」而已，在舊有各矛盾的基礎上，向前發展，也許還更「糟糕」哩！

祇要回憶一下，大家總會覺得：一九三四年真是所謂「多事之秋」。這一年中間，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所遇到的事變，有的使人驚訝，有的使人戰慄。所以常常聽見說，一九三四年無異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一九一三年。真的，玻璃維亞與巴拉圭的火併，漢志與葉門的火併，不就等於巴爾幹戰爭嗎？七月二十五日的維也納血案，十月九日的馬賽血案，不就等於塞拉耶孚 (Serajevo) 事件嗎？至於軍事工業的擴張，軍火貿易的活躍，經濟備戰的加緊，以及各方面總動員的熱狂，與一九一三年比起來，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像這些「非常時」的狀態，證明了二十年前的舊火山，又在七處冒烟，八處冒火，大規模的總爆發祇是時日問題。不容置疑的，我們確已臨到新火山爆發的前夜了！

然而，歷史現象決沒有重複的。儘管一九三四年有些地方與一九一三年的情形相同，但並非依樣葫蘆的「再版」，這是分析問題者應該牢牢記着的一件事。因為如此，我們現在分析國際政治的總形勢，一方面固然應該注意一九三四年與

一九一三年的同點，另一方面尤其應該指出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一三年的異點。

一般說來，二十年前的舊火山——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時代矛盾的炸裂。這些矛盾雖在大戰的腥風血雨之中暫時解決了一部分，可是「壓得東來西又起」，到二十年後的今日，又在原來的基礎上，——不，在「擴大再生產」的基礎上，由復活而尖銳起來。如果說，二十年前的舊火山，限於歐洲一隅；那麼，二十年後的新火山——第二次世界大戰——却遍於全世界了。限於歐洲一隅的舊火山，在爆發時所招致的災難，當然在一隅之內，至多也祇「殃及池魚」；而遍於全世界的新火山，可以從歐洲先爆發，也可以從遠東先爆發，只要有一處衝破了噴火口，全世界都要很迅速的捲入災難之中。可見新火山的可怕，遠過於舊火山之上。這即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怕，遠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上。

這是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一三年的異點之一。此外，異點還多着哩！

二 帝國主義屠刀下的主題——重分世界

依據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律，到了適當時期，重分世界，要列入議事日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關於歐洲的再分割，是在巴黎會議完成的；關於遠東的再分割，是在華盛頓會議完成的。所以凡爾賽條約與華盛頓協定，是帝國主義在過去重分世界的議定書。假使各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力量對比一成不變，也許這兩種議定書就是千古不移的鐵案吧！

但是，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律，在戰前是真理，到戰後亦是真理。馬扎亞爾在世界帝國主義結構中之新現象一文中曾說過：『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有些帝國主義強國發展起來了，而工業生產品也有相當的增長，生產力更有相當的發展，世界市場擴充起來，貨幣信用制度也恢復起來了。這種發展的過程，在各國是非常不平衡的。在危機時期，破壞生產的過程——資本主義生產瓦解的過

程，在各國也是非常不平衡的。在這種基礎上面，便是世界的再分割。在遠東，在太平洋沿岸，這一鬥爭已經開始了」。假定這段話不錯，則過去的議定書，自然成爲不合時宜的「陳貨」。

拿凡爾賽條約來說吧！其主要內容有三：（一）賠款，（二）限制軍備，（三）劃定國界。關於賠款，德國沒有以自己的財源支付半文過，它從一九二四——三〇年，輸入外資二十萬萬馬克，而前前後後所支付的賠款，祇有十萬萬馬克。到現在，賠款這筆爛賬再無人注意了。關於限制軍備，無論德國迭次提出「軍備平等」的要求是否得到國聯的承認（近來奧國也提出同一要求），但德國現有軍備超出條約所許可的範圍（陸軍十萬人），是誰也知道。（據法國估計，德國在戰時可出兵五百五十萬人。）依據上述事實，應該看出凡爾賽條約所剩下者就只有「劃定國界」一項了。自希特勒上台後，特別提出了重新劃定國界的問題，一年來國社黨在奧國所鬧的各種把戲，一直到陶爾斐斯被刺止，都是重

新劃定國界的具體表現。而守護凡爾賽條約的法國怎樣呢？正如賴伐爾在日內瓦討論馬賽血案時所說：「任何人若將現有界碑移動一塊，即屬擾亂和平。」（二月八日哈瓦斯電）改成淺顯的話，就是：要重新劃定國界，非戰爭不可。

說到華盛頓協定，情形是更嚴重的。日帝國主義九一八佔領滿洲，一二八進攻上海，早在事實上把那些「尊重中國領土完整與維持門戶開放」的虛偽條文扯得粉碎。一年來的事實，如三月間溥儀稱帝，「四一七」日外務省獨霸東亞的聲明，十月間宣佈偽滿石油專賣，無一不是把華盛頓協定業經扯得粉碎的紙片，拋到太平洋裏去。最近在倫敦海軍談判的僵局中，日本已決定公開通告廢除華盛頓協定；而日大使齋藤在美國費城又發表「日本若認為維持遠東和平所必須，並將吞併中國北部」的狂言（十二月十二日哈瓦斯電）。試問華盛頓協定還能值一文錢麼？儘管英美當局假惺惺作態的重伸什麼「保障中國領土完整」的聲明，但由我們去看，不過是「掩耳盜鈴」的伎倆而已。

照這樣說，凡爾賽條約既被希特勒蹂躪得體無完膚，而華盛頓協定又被日本軍部連扯得粉碎的紙片也拋到太平洋裏去，可見重分世界，不僅已列入議事日程，並且在實際上幹了許久。甘爲戎首的德日兩國，自然在重分世界的大戰中，是無獨有偶的急先鋒。與德國正面對立的法國，也是當仁不讓，其一九三五年的陸軍預算，多至五十六萬八千九百萬佛郎（邊防工程費尙不在內），可以想見備戰的積極了。即號稱紳士的英國，除宣布加倍擴大空軍外，同時努力完成從新加坡至澳洲一帶的軍港；據每日郵報的統計，英國每天每一分鐘用於殺人武器的製造費爲三百四十二鎊，這是怎樣龐大的數字啊？美國呢？過去雖是以門羅主義標榜的國家，現在也不得不過問美洲以外的事；一年來正在加緊造艦，使其艦隊力量達到條約所許可的限度；另一方面，又在亞拉斯加建立空軍根據地，決定於一九三五年夏季舉行北太平洋會操。所有這些事實，祇有一種意義，就是：準備在歐洲，在太平洋，來一次毀滅人類毀滅世界的大廝殺。咱們中國，不待言，自然

像其他弱小民族一樣，在歷史上注定了做帝國主義屠刀下的犧牲品。

三 國際關係的協調及其矛盾

大廝殺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萬分複雜的國際關係中，要想殺得槍花不亂，一定要當大廝殺開幕以前，設法劃清陣線。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便是先例。

現在情形怎樣呢？在亞泰基（Antarctic）風靡一世的環境中，各資本主義國家外交上的孤立，幾成爲普遍的現象。雖說各國縱橫捭闔的外交家，你訪問我，我訪問你，栖栖皇皇的跑來跑去，協商之後又來一次協商，會議之後又來一次會議，然而結果，不是白費氣力，就是成就不多。在這一點上，可以窺見幾個主要國家相互間的利害是非常不易協調的啊！就一年來的事實說，勉強夠得上協調的，祇有：一月十六日簽字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二月九日簽字的巴爾幹四國公

約，（希臘、土耳其、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三月十八日簽字的意奧匈協定，九月十二日簽字的波羅的海三國公約，以及十月底簽字的波匈文化協定而已。此外，如德日祕約曾經一度喧傳，英日同盟尙未十分證實，法意協定則在若即若離之中。像這樣陣線混亂的世界，與大戰前兩個鮮明的營壘——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比起來，似乎相差很遠。甚至法國多年領導下的衛星，近來亦有少許離心的傾向。這也許是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一三年的異點之一吧！

爲什麼如此？這是有理由解釋的。在資本主義總危機與自一九二九年後工業循環期的危機雙流匯合之中，整個世界都陷入山窮水盡之境，這就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恃以托命的世界市場，不僅日益縮小了，而且日益乾枯了。大戰前，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本是短兵相接，但在特殊情形下面，未嘗不可作某種程度的迴旋，以爲協調的基礎。現在再沒有迴旋的餘地了，在日益縮小而又日益乾枯的市場上搶骨頭吃，狗多骨頭少，自然要相咬起來，黃狗與白狗固然相咬，就

是白狗與白狗也是相咬，要想在這些黃狗與白狗當中，劃清陣線，簡直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得多。目前資本主義國家孤立寡助的原因，大抵與此相類。

試就具體情形略加說明吧！關於歐洲，誰也知道是英、法、德、意四強的天。德國褐色勢力抬頭，重整軍備，無疑的英、法、意都感覺不快，尤其是法國，很想用武力把德國打下去。但英、意却不願再做法國的戰友。第一，怕法國由勝利中加強了在歐洲上的軍事領導權；第二，怕德國再受挫折引起社會革命；第三，怕法、德兩國在鵝蚌相持之下，讓蘇聯做得利的漁人。所以英、意一向是扶德抑法的。不過，英國扶德有一定的限度，決不許德國利用其工業基礎，昂首邁進，在經濟與軍事兩方面，很快的恢復到戰前狀況，使英國感受威脅。總之一句話，英國在歐洲上的傳統政策，不外維持勢力均衡，使自己便于操縱而已。德、意在反凡爾賽系統這一點上，本可攜手，然以德國企圖合併奧國之故，竟使這兩個獨裁者在威尼斯一度傾談（六月半）毫無成績，甚至迫使黑衫宰相與法國

送秋波，建立了法、意親善的基礎；這並不是說，法、意之間沒有衝突，在多瑙河流域，在亞德里亞海岸，在北非洲，在地中海面，到處有矛盾潛伏着，不過這些矛盾在德、法關係緊張與德、意友誼惡化的情形之下，降到不重要的地位罷了。假使法意協定真能成立，不待言，那也有一定的限度。歐洲有這些利害參差的關係，能希望它們劃清陣線麼？

再看太平洋方面，英、美、日的爭霸戰是非常激烈的。以日本之橫行無忌，不惜以東亞主人翁自居，似乎應該促進「同文同種」的英、美結成抗日戰線。不幸這兩個盎格魯撒克遜的國家，矛盾遍全世界，玻璃維亞與巴拉圭的戰禍，就是它們在背後指揮。因為有這些「難言之隱」，所以難得協調，至多不過對僞滿石油專賣一致抗議而已，至多不過像前面所說，假惺惺作態的重伸「保障中國領土完整」而已。英、美聯合，可說不大可能。這種真相，在六月與十一月兩次倫敦海軍談判中暴露無遺了。美、日是否可以協調呢？高唱協和外交的廣田，自然有

這種「單相思」，且在三月二十一日曾經一次「換文」，聲明彼此無構釁之意。無如這種「官樣文章」，不能解決兩國之間的矛盾，日本倭儒與三摩大叔 (Ure's Sam) 依然是太平洋上正面的敵人。至於英、日關係，却比美、日關係複雜得多，就反蘇反美的戰線說，就鞏固亞洲的統治說（鎮壓中國與印度的反帝運動），英日不僅可以協調，並且可望過去的同盟復活。然而，日本大亞洲主義的發展，給英國以不斷的威脅，因為它在中國的利益，在印度的統治，與日本大亞洲主義不相容。英、日在暹羅的衝突，年來也非常厲害，十月杪的盤谷政變，已把「春光洩漏」了；頃據紐約電訊，日本擬助暹羅擊穿加萊地峽 (kra Isthmus)，打通中國海與印度洋，使新加坡軍港失其效用，難道這是英國所能忍受的嗎？加以日貨傾銷，使蘭開夏的製造品大受打擊，亦不是英、日會商所能調和。有正反兩面的關係，常使英國對日外交路線，徘徊於歧路之中。可是自巴恩倍 (Barby) 考察滿洲回國後，英日同盟之聲，甚囂塵上，似乎這兩個老盟友，要嘗一次「破鏡

重圓」的滋味哩！固然日本大亞洲主義爲英國所厭惡，但于締結同盟之外，完
成軍港建築，阻止日本勢力侵入印度與澳洲，同時對於中國問題作某種限度的妥
協，那不是兩全其美麼？據我看，老奸巨猾的「紳士國」大抵要走這條路。從太
平洋三角式的爭霸戰中所預見的陣線，就目前言，不過如此。

在這裏，要附帶聲明的，我把整個國際關係分爲歐洲與太平洋兩部分說明，
祇是爲某種方便起見，並非認爲這兩部分之間有什麼不可逾越的鴻溝。老實講：
歐洲問題與太平洋問題是息息相通的，正與天空中的氣象相類，某一部分陰霾密
佈，另一部分決不會遇見日光融和。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應該認識：歐洲問題關
成僵局，可以助長日本趾高氣揚；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倘若太平洋怒濤洶湧，則
地中海與北海也不見得「水波不興」吧！

四 阻止戰爭的和平運動

以上還祇講到現世界的一面——資本主義世界。而與資本主義世界對立的不是另有一個社會主義世界麼？蒸蒸日上的蘇聯，就是社會主義世界中的孤島。所以，常常有人說，現在不是一個世界，而是兩個世界。

以為這兩個世界是平行發展的人，固然未看清歷史的遠景；以為這兩個世界是渺不相涉的人，彷彿一在人間，一在天上，那也未看清面前的事實。正確的說，蘇聯的經濟組織與政治制度，儘管與資本主義世界不同，但因帝國主義矛盾的複雜化與尖銳化，反替蘇聯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間造成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首先要指出：蘇聯的外交政策以和平為基礎，即所謂和平政策，這是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近幾年來，蘇聯努力和平運動，成效日著。那些在戰爭中毫無所得而只當砲灰的小國，固然成了蘇聯和平運動的支持者；就是有些大國——甚至向來是反對蘇聯的——到了某一時期，覺得戰爭爆發於己不利，也掉過頭來與蘇聯握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批准的法蘇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宣布的美蘇復交，即是鐵的證明。有了這兩次成果，西歐與遠東過去緊張的時局便輕鬆得多了。到一九三四年，蘇聯和平運動的勝利，仍向前發展，如波蘭以及波羅的海東岸三小國與蘇聯所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延長十年，如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墨西哥先後對蘇聯復交，都是例子。而勝利聲中，最惹人注意的一幕，恐怕要算蘇聯加入國聯吧！這一幕喜劇，是法國巴爾都奔走串成的。到九月十八日，李維諾夫就接受三十九國簽名的邀請書，做了國聯的主人。從此以後，國聯便在蘇聯的影響之下，變為擁護和平反對戰爭的機關了。這不僅是一九三四年的一件大事，並且是國聯成立以來的一件大事。此外，尚有法國與蘇聯共謀實現的東歐互助公約，雖因德波兩國不贊同而中途擱淺，但李維諾夫與賴伐爾仍在繼續進行。十二月五日所簽訂的法蘇協定，即是鞏固法蘇邦交的新步驟，予破壞東歐互助公約者以當頭一棒。假使東歐互助公約成立，則從波羅的海至黑海之間，就無異添築一道保障和平的萬里長城了。

和平運動果能阻止戰爭麼？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對於和平條約有正確的估計。第一，不可估計過高。和平條約由資本主義國家看來，是隨時可以撕破的（如果撕破有利的話）。戰前的三國同盟條約，意國何嘗沒有簽字？後來居然跑到協約國方面去，反對過去的盟友。第二，不可估計太低。和平條約一經締結，可以引起廣大羣衆愛護和平。窮兵黷武的野心家在未覺得適當的口實以前，不便公然挑釁，至少需要相當時間向羣衆做一番轉變心理的工夫。依據這兩種觀察，可以斷定：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所簽訂的條約，對於和平固然沒有絕對保證，但相對保證是有的，換言之，和平運動雖不能從根本上消滅戰爭，可是在某種情形下面，的確能使戰爭延宕下去。我們一年來遇到驚心動魄的事變非常之多，每次事變發生之初，總有些人認爲是戰爭的導火線，彷彿災難已經臨頭。然而到現在，都平平穩穩的過去了。是誰捏住了戰爭的機紐呢？這不能不歸功於蘇聯的和平運動。和平之神壓倒戰爭之神，無疑的又是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一三年的異點。

之一。

在和平運動勝利的過程中，除了使各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爲之弛緩外，而最重要的一點，則在使蘇聯突破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所以有人把和平政策看成社會主義國家擊退敵人的「法寶」。甚至十足的樂觀論者，以爲蘇聯有了這個「法寶」，不難戰勝一切，從此發展下去，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十字軍」，就不會有了。這種說法，我以爲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從原則上講，蘇聯是與資本主義世界對立的國家，它自五年計畫實施以來，基礎日固，使各帝國主義受到致命的威脅；因爲社會主義的勝利，即資本主義的死亡，這種矛盾是超過一切的。各帝國主義相互間固然有劍拔弩張的情勢，其實，沒有一刻忘記其共同的敵人——蘇聯。資本主義之王的英國，目前正在進攻蘇聯的組織者，企圖把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在反蘇聯的陣線上統一起來。它在遠東，對反蘇聯的急先鋒——日本不惜予以提攜；在西歐，對德國——反蘇聯

的另一個急先鋒——常常曲意拉攏。英、德、日三國在進攻蘇聯的佈置上，恐怕是「志同道合」的知己吧！法國在現階段，雖說與蘇聯打得火熱，但以社會制度不同之故，決非「百年偕老」的情人；假使德、法關係經英國的調停可以改善的話，則法國對蘇聯反目也不是什麼意外。看吧！近來（十二月初）希特勒不是派專使李本特羅浦（Ribbentrop）與黨代表赫斯往巴黎麼？巴黎日報不是宣布希特勒提議締結德法波三國公約麼？（十二月八日哈瓦斯電）十足的樂觀論者，如果把這些消息推究一下，應該知道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十字軍」不是歷史上的陳跡哩！

五 戰爭的另一制動機——革命酵素

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一三年之間，更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異點，那就是資本主義世界內的革命酵素一天天成熟了。在戰前，除俄羅斯外，各國革命運動，是不值

得注意的。近幾年來，却與戰前兩樣，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各國革命的火燄正在地下燃燒着，罷工、騷動、巷戰、流血……成了一般的現象。以「小茶壺」著名的西班牙，從三、四兩月的總罷工，發展到十月的加泰隆尼省獨立，固不用說了。維也納自二月間社會民主黨暴動以後，沒有一天安靜過。歐洲黃金國（法國）的首都——巴黎，在二月初也流過一次血，到十一月杜邁格下野的時候，幾乎鬧得風雨滿城。德國呢？本是一個公開宣布法西斯專政的國家，論理，在鐵腕鎮壓之下，似乎革命活動不大可能；但事實上剛剛相反，反法西斯運動的怒潮仍到處潛伏着。甚至國社黨內部，希特勒亦把握不住，六卅事變，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最近又在鬧什麼第三次清黨運動，（十二月十四日柏林路透電。）可見這位以領袖而兼總理的「褐色英雄」，其政治生命能延至何時？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吧！英國雖與歐洲大陸隔一衣帶水，然而內部也與歐洲大陸一樣，不大太平，春季的飢餓長行隊示威，秋季的威爾士礦工潮，畢竟震破了「國民內閣」的胆，使其拋

棄民主政治傳統的外衣，而通過所謂懲治煽亂法，這就是說，英國的憲法已經不能維持秩序了。至於美國，本是所謂新世界，不幸受經濟危機打擊以後，有一千萬以上的失業工人無法解決，羅斯福上台以來，變了許多戲法，依然不能解決失業問題；以致一年來，絡繹不絕的工潮震撼全國，特別惹人注目的，是紀載工潮的新聞中，也添上了什麼「暴動」與「大捕共產黨」……一類的字句；證明新世界仍與舊世界相同，無一片樂土。此外，如咄咄逼人的日本，儘管從中國身上剝去了許多血肉，還是不能醫治其國內的瘡痍，「勞動爭議」與「小作爭議」在報紙上常常見到；加以近來的關西風災，九州旱災，東北冷災，北陸水災，更使貧困化的工農，無法生活，這個「地震之國」的社會秩序，差不多像感受地震一樣，陷於日夕不安之境了。總之：從歐洲到美洲，從美洲到東亞，凡屬資本主義國家直轄的領土，都是危機四伏，一觸即發的。再加上各殖民地——如印度、菲列濱、安南、朝鮮、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天天高漲，當然不是什麼

「憲政改革」（印度）與「規定十二年以內獨立」（菲列濱）等等空頭支票所能緩和。所以，一九三四年是戰爭的前夜（這是與一九一三年相同的），同時又是革命的前夜。（這是與一九一三年相異的。）

帝國主義政府在重分世界迫於眉睫的關頭，未嘗不打算立刻挑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償自己的大欲；更未嘗不打算立刻組織進攻蘇聯的「十字軍」，以謀瓜分資本主義世界圈外六分之一的市場。但受國內與殖民地革命的兩重威脅，不得不顧慮到戰爭爆發，可以引起革命的火燄，從地下燃燒到地面，釀成燎原之勢。在這種環境下，就是最黷武的帝國主義，也要懸崖勒馬，深以「不戢自焚」為戒了。過去的沙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毀滅了的，前車已覆，來軫方遒，誰敢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孤注一擲呢？一年來，某些帝國主義國家躍躍欲試而終不敢一試者，其故在此。依據這種事實，我們應該說：革命酵素是戰爭的另一制動機。

難道帝國主義從此沒有辦法麼？難道帝國主義因受革命的威脅而放棄重分世界的戰爭麼？決不會這樣。帝國主義的「錦囊妙計」，是要在戰爭爆發以前，用盡一切方法，鎮壓革命；換言之，就是先肅清後方，先肅清國內的仇敵，使戰爭的火藥庫裏，沒有革命的炸彈。假使這種「錦囊妙計」施行有效，那麼，帝國主義者就變成「不倒翁」了！試問帝國主義者是不是「不倒翁」呢？

六 今後發展的動向

現在我們已臨到一九三五年的門檻了！

帝國主義的報紙不是常常嚷着什麼「一九三六年的大危機」嗎？它們不是藉這種大擂大鼓的宣傳以為準備戰爭的口實嗎？我們平素受這種宣傳的暗示，一踏進一九三五年的時候，便覺得毛骨悚然，彷彿歷史上注定的災難，是無法避免的。

不錯，法、德兩國糾紛的焦點——薩爾問題，決定在一月十三日投票解決，這件事的結果如何？不僅可卜法、德兩國的命運，並且可卜整個歐洲的命運。這是擺在一九三五年前面的第一道難關。

其次，日本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宣告退出國聯的，依據國聯盟約，應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與國聯正式脫離關係，關於南洋委任統治諸島，又成了嚴重問題。如日本屆時不肯交還國聯，則在太平洋上可以引起很大的衝突。這是擺在一九三五年前面的第二道難關。

第三，倫敦海軍條約規定於一九三五年再開海軍會議。一九三四年的兩次海軍談判，既鬧得不歡而散，則未來的正式海軍會議，自然吉凶多。假使真正鬧翻了，恐怕不免要發生大亂子吧！這是擺在一九三五年前面的第三道難關。

這三道難關，重重疊疊的擺在前面，大有使人望而却步之感！試問一九三五年是否因這些難關而鬧出潑天大禍呢？自然是可能的。不過，我們觀察國際形

勢，應該從大處着眼，不應該祇注意個別的問題。誠然，這些問題是很嚴重的，但都屬於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如果認定它們必為這些問題開火，那不是把現世界的基本矛盾——兩個體系的矛盾——放到「視野」之外麼？

前面講過：「各帝國主義相互間固然有劍拔弩張的情勢，其實，沒有一刻忘記其公共的敵人——蘇聯。」假使沒有蘇聯這個「怪物」存在的話，我想：各帝國主義國家也許早已開火了，不一定要藉一九三五年的難關來發動。惟過去的劍拔弩張既已弛緩下去，則一九三五年的難關，亦未嘗不可以和平超度，因為同是處在公共敵人未打倒的時候，同是大家應該小心、忍耐，以免上當的時候。

那麼，在一九三五年，各帝國主義國家是否應該釋嫌修好一致出征蘇聯呢？帝國主義御用的策士們，自然認為是千該萬該的。目前，進攻蘇聯的組織者——英國，正在百出其方，企圖在反蘇聯的陣線上，做「精誠團結」的工夫。它在歐洲的政策，是要拉攏凡爾賽系統與反凡爾賽系統，在「國際合作」的招牌下面，

一致與蘇聯爲敵；在遠東的政策，是要重溫英日同盟的舊夢，指揮「東方警犬」共同侵犯蘇聯。這種陰謀，在最近期間，當然要進一步的具體化。

蘇聯怎麼辦呢？這隻盤據歐、亞兩洲的「大熊」，向來是不動聲色的，文來則拿出社會主義獨有的「法寶」（和平政策）對外周旋，拆散英國包圍的陣線；武來則以飛機大炮對外作戰，予侵略者以迎頭痛擊。帝國主義的「十字軍」，要想衝入「紅色國土」。恐怕不大容易吧！

總之：重分世界已列入議事日程，大規模的戰爭恰如「箭在弦上」。不過，向誰戰爭？確是帝國主義者及其策士們所苦惱的問題。自己火併嗎？似乎太便宜了蘇聯。進攻蘇聯嗎？又因陣線不易統一，未敢輕於嘗試。加之，革命危機千鈞一髮，一旦戰禍重開，顯然要授被壓迫者以抬頭的機會。帝國主義在進退維谷的情形之下，或許仍舊「開弓不放箭」。所以，一九三五年有「火光燭天」的前途，也有「陰霾蔽日」的前途。

可是，無論是那一種前途，半殖民地的中國人，總是倒霉的！火光燭天嗎？中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屠場，我們的一切，都要化成砲灰。陰霾蔽日嗎？則帝國主義在準備戰爭的過程中，要征服全中國以爲保證勝利的條件。日本已由「滿洲國」而侵入內蒙了。英國正企圖在西藏一帶，製造「第二滿洲國」。美國則採另一種方式，想把中國緊縛在它的錢袋裏，近來厲行購銀政策，將使中國膏血乾枯，逼迫我們鑽進它的錢袋。這樣下去，恐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尙未正式爆發以前，中國已不是中國人的中國了！我們應該坐待戰爭降臨呢？還是趁着大家尙未化成砲灰的時候，一致起來反對戰爭呢？這是每個中國人（漢奸除外）在迎新送舊的年關，應該考慮的問題。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午夜

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

時代的車輪又把我們推到一九三六年的危險線上。

一點不錯，一九三六年是一九三五年的繼續，是帝國主義者所謂危機之年。帝國主義者所以誇大這種危機，其理由非常明白，乾脆一句話，就是藉此爲口實以準備戰爭，或者說藉此爲口實以重分世界。我們平素聽慣了帝國主義者的宣傳，當走進一九三六年的時候，便覺得面前正擺着一幅黑影與火光交織成的畫圖。

試問這幅畫圖是否是我們腦膜中的幻景呢？不是，決不是！誰也知道：目前的世界大抵是受幾個帝國主義者支配的，它們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既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要解決這些矛盾就必須訴之戰爭。戰爭是帝國主義時代注定的災難啊！一

九一四——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我們記憶中尙未消逝，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愈逼愈近，似乎大規模的爆發，不過是時日問題。如有人認爲一九三六年要重演一九一四年的全武行，決不是過分的估計。

但我們預測未來的事變，本與預言家不同。預言家可以信口開河，我們却要根据事實。假使說一九三六年是一九三五年的繼續；那麼，我們預測一九三六年的前途，就不可不從一九三五年的事實出發。「欲知來，視諸往，」這句話，在某種限度內是對的。

然則一九三五年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些什麼呢？

一 戰爭的序幕已揭開了

記得不久以前英國帕摩杜特 (Palme Dutt) 曾說過：「滿洲國」是昨日的問題，阿比西尼亞是今日的問題，米美爾是明日的問題。在這裏，姑且把昨日的問

題撇開不談，把明日的問題留到以後再講，暫從今日的問題——阿比西尼亞——說起吧。

經過大半年的積極準備，意帝國主義進攻阿比西尼亞的砲聲，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接二連三的響了。當硫磺氣充滿全世界的時候，從「黑暗大陸」放出火花，一點也不稀奇。但戰爭的發難者不是英國，不是法國，而是意國，頗值得我們注意。這種現象應該怎樣解釋呢？一般說來，意國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自爬上帝國主義的「梯子」以後，彷彿是一隻餓老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雖說活躍過一次，可惜未分得什麼獵獲品。因為有這種弱點，對內要維持統治，不能不宣布法西斯專政。同時，對外要擴張勢力，不能不挑起重分殖民地的戰爭。阿比西尼亞恰與勒德里亞、索馬里蘭毗連，簡直是意國的禁樹。墨索里尼採用「先下手為強」的政策，把這個黑人帝國放在自己支配之下，擴大在紅海西岸的地盤，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確有「棋爭一着定輸贏」之勢。

以上是從意帝國主義本身的要求去解釋的。可是僅有本身的要求，沒有外來的機會，仍不能爲所欲爲，剛巧，歐洲自希特勒登臺後，鬧得「滿城風雨」，尤其使法國夢寐不安。這樣一來，就替法、意兩國造成了釋嫌修好簽訂羅馬協定的條件。墨索里尼得到法國的諒解，於是放膽調遣大批黑衫隊馳赴東非。不久，又因英德海軍協定成立，在英、法之間生了一層很厚的隔膜，從而法、意關係越發牢固。墨索里尼估計到這一點，就更加有恃無恐了。有這些外來的機會，擺在黑衫宰相的面前，當然要用大礮飛機向阿比西尼亞進攻來完成其「宣揚文明」的偉業。這次戰爭的發難者，不是英國，不是法國，而是意國，其內幕就是如此。

自東非戰爭爆發以來，不，自意帝國主義者利用二十世紀最新的武器向阿比西尼亞大屠殺以來，約有三月之久。儘管在開頭一個半月內，軍事勝利屬於意國，然在黑炭頭堅決抵抗之下，意國是得不償失的。到最近，阿軍已反守爲攻了，意軍挫敗的消息，時有所聞。如果戰事越延長，則意國勝利的把握就越少。

這些事實，證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在遇到抵抗的時候，這即是說，在被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戰爭來回答侵略戰爭的時候，帝國主義者是一定要受打擊的。「戰到末一道壕溝！流到最後一滴血」！阿皇塞拉西這兩句名言，可以說是一切弱小民族禦侮自救的金科玉律！東非的阿比西尼亞既喊出這樣震動全世界的吼聲，難道東亞的阿比西尼亞始終是一匹馴羊祇有被宰割的命運嗎？

二 戰爭何以停滯在一隅

當東非意、阿戰爭擴大而為英、意衝突的時候，有許多人都認為東非這一把野火，將延燒到歐洲，將延燒到全世界。今後的發展怎樣？誰也不易輕下判斷。但截至目前為止，戰爭仍未踰越東非的範圍，却是事實。試問戰爭何以停滯在一隅呢？

要解答這一問題，須剖析下列幾方面：

首先要指出：在英、意惡化的過程中，地中海的危機確已達到一觸即發之境。但衰老了的英國，似乎沒有法國的幫助不願單獨與意國比雌雄。所以自七月十一日霍爾發表其「另覓新交」之外同時「顧及舊友」的外交演說以後，即執行聯法政策，用盡各種手腕以拆散法、意的友誼。法國的態度怎樣呢？經過了多次講價還價，賴伐爾雖允在某種限度內與英國合作，然而仍站在英國與意國之間，總想以調停了事。英、法對意所採的步驟既未能完全一致，自然英國就不敢與意國翻臉。此其一。

其次，西歐問題是與遠東問題息息相關的，四年來，遠東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急進，固然鼓勵了墨索里尼的野心；反過來也是一樣，這即是說，自黑衫隊在東非活躍以後，尤其是英國的亞洲艦隊西移以後，遠東霸主益發肆行無忌起來，以致英帝國主義在遠東經營百年的利益——特別是在華利益——都有全部喪失的危險。在「兩害相權取輕其者」的原則之下，英國對東非問題不得不適可而止，

以便有餘力照顧遠東。此其二。

最後，我們不得不談到和平運動了。近數月來，集體安全的呼聲，壓倒一切，確是一件差強人意之事。在和平空氣到處瀰漫的時候，日內瓦就在十月七日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奇蹟」。這「奇蹟」是什麼呢？一句話說完，就是國聯行政院通過六國委員會的報告書，宣布意大利爲侵略國。一個向來被帝國主義者把持的機關，這次居然援用盟約第十六條，給意帝國主義以打擊，不能不令人鼓掌稱快！自這次「奇蹟」出現以後，如軍火禁運，財政封鎖，經濟制裁都次第實施，到現在祇剩禁油問題尙待解決。有了這樣一個制裁侵略國的天羅地網，意帝國主義便成了「釜底游魚」，遲早是要毀滅的。我們拿這次國聯處理意、阿問題與四年前處理中日問題比較一下，可說是迴隔天淵。何以有這種差別呢？從表面去看，似乎是英國特別起勁（法國助一臂之力也有關係），借用國聯的壓力以促墨索里尼就範。其實，骨子裏的原因却有兩個：一是阿比西尼亞堅決抵抗，引起各

方面的同情；另一是蘇聯與各小國代表能替弱者主持公道。這兩者確是制裁運動所以進展的基礎。近來英、法所擬獎勵侵略國的「和平方案」，在阿比西尼亞誓死反對之下，在蘇聯與各小國代表嚴厲指斥之下，已於十二月十八日在日內瓦夭折，即是鐵的證明。因為和平運動得到大的成功，可使英國深深認識要擊敗意國，另有不戰而勝的法寶，不必訴之武力。此其三。

有這三方面（最後一項是主要的）的理由，所以戰爭到現在仍停滯在東非一隅，未越雷池一步。

三 戰爭危機的普遍化

如果有人相信戰爭始終不會擴大，那也是錯誤的。目前是各帝國主義者短兵相接的時期，有許多糾纏不清的絲結，不能以手解開，祇可用刀砍斷。日內瓦的軍縮會議跟着漢德森一起壽終正寢了，倫敦的海軍會議雖已召集，將來一定要鬧

得不歡而散。無論從何方面去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無法避免的。我們且睜開眼睛看看東非以外的國際形勢吧。歐洲與遠東乃著名的兩大火藥庫，這是誰也不否認的。自東非戰爭爆發後，這兩大火藥庫的危險性、不惟沒有減輕，並且時常有濃煙冒出。謂予不信，請看事實：

就歐洲言、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如羅馬半官式日報所說：「歐洲現已陷入混亂狀態，昏黑不見天日，所可見者，惟羣趨於破壞之一途。究竟伊於胡底？實難逆料」。專就英、意關係而論，固然有幾種理由，可使英國懸崖勒馬。但自「和平方案」在日內瓦夭折後，延擱已久的禁油問題當然要提出來。照墨索里尼的意見，禁油即是戰爭；而英國又於十二月八日向地中海沿岸各國（西班牙、土耳其、希臘、南斯拉夫以及羅馬尼亞）詢問英國海軍若在地中海受意國海軍的襲擊，各該國是否以海軍援助？可見英、意仍有破裂的可能。再就歐洲一般的形勢說，德國公開撕破凡爾賽和約，重整海陸空軍，總算一九三五年的的一件大事。

在希特勒挑戰之下，曾促成英、法、意三國一度建立斯德萊柴聯合陣線，曾促成法、蘇、捷等國簽訂互助公約，使德國陷於重重包圍之中。然而另一方面，德國外交活動的成績也還不差，除英德海軍協定外，五月間戈林將軍曾偕其「明星夫人」訪問東南歐各國；七月初德、波談話的結果，據說德、波的十年不侵犯條約，已經延長，九、十月之交，德、波、匈建立中歐新政治集團之說，又甚囂塵上。像這樣軍事與外交雙管齊下的幹，誰能保證這隻出柙的老虎不擇肥而噬呢？說到遠東，情形就更黯淡了！東亞的阿比西尼亞在東亞的意大利宰割之下，呻吟痛楚已逾四年。而日內瓦的外交家不會替我們說半個字的「公道」。不久以前（十月間），艾登反把我們大罵一頓，他老實不客氣的說：「意、阿爭端未可與中、日爭端相提並論。……當時中、日雙方自始至終，均未從事正式戰爭，中國既未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又未召回駐日公使，並未申請國聯援引盟約第十六條以制日本，中國此種態度容或可異，因而國聯從未有對日制裁一項發生」。本

來過去國聯偏袒日本，明明受英國操縱（法國也是一樣），現在艾登反把罪過完全卸到中國人身上，還有何話可說？不過，英國替日本抱腰，結果只落得「自貽伊戚」，這即是說，日本在英國支持之下佔據了滿洲，現在又利用歐洲時局緊張，要進一步吞併華北，吞併全中國，硬想一脚把英、美等國在華的利益踢翻。這樣一來，美國固然「吃不消」，就是英國也忍耐不住。於是英、美共同對日的傾向就一天天明顯了。最近倫敦海軍會議上，英、美主張比較接近，可說是眼前的例子。在這裏，要特別指出一點，即英、美共同對日仍是同床異夢的。詳細些說，英國大抵是裝出反日的姿勢，壓迫日本讓步，使其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不妨害英國的利益，未必有與日本作戰的決心。美國呢？它是以太平洋主人自命的，在目前正在積極準備，等到準備完成的時候，無疑的要向日本進攻。最近（十二月十八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Pitman）說：「日本政府的野心，實想征服全球，美國為太平洋方面自衛（？）計，將不得不出於一戰」。

假使日本繼續向中國進攻，則美、日火併的日期或更迫近。事實告訴我們，遠東風雲比歐洲要緊急得多哩！

在戰爭危機遍於全世界的時候，誰還相信東非問題不會擴大呢？

四 戰爭的性質能改變麼

我們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要爆發，差不多與推算「日蝕」「月蝕」一樣，是十九準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大抵是帝國主義戰爭，即以重分世界為基調的帝國主義戰爭。

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火燄中，資本主義的整個機構，有了不可醫治的傷口，以致在六分之一的世界內，產生了一個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同的國家——蘇聯。戰後十餘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的病症日深一日，而蘇聯自實行第一次五年計畫與第二次五年計畫以後，却大露頭角，欣欣向榮。這是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最放

心不下的事！因此，在帝國主義戰爭快要總爆發的今日，幾個主要國家的參謀部，總想把礮口對着蘇聯，這即是說，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反蘇聯戰爭。

就現階段言，資本主義的老大哥——英國是反蘇聯的領導者。儘管自東非問題鬧出禍來以後，英國與蘇聯手拉手的制裁意國，儘管英國答應以商務貸款給予蘇聯，儘管在英國如紐曼 (P. Newman) 一類的權威作家，了解英、蘇接近爲兩國利益所必要；然而唐寧街十號的主人決不輕易放棄進攻蘇聯的計畫，反而要犧牲蘇聯的安全來緩和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在歐洲方面，英國是一貫的支持德國做反蘇聯的先鋒。近數月來，英國更賣盡氣力，以弭縫法、德之間的裂痕，藉此減少德國東進的障礙。不久以前，法國駐德大使會見希特勒與德國專使李本特洛甫訪問巴黎，似乎是法、德正式談判的先聲。最近十二月八日霍爾與賴伐爾在巴黎會談的時候，曾交換對德關係的意見，擬在來年二月與德國談判限制陸上及天空軍備問題。如果法、德關係日趨協

調，則法、蘇關係就從此鬆懈了。甚至英國公開要求法國放棄東歐公約以爲英國保證歐洲大陸安全的條件。這明明是網開一面，讓德國向東揮其自由之手。所以說，米美爾是明日的問題。這些事實完全證明英國企圖在歐洲方面變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戰爭爲進攻蘇聯的戰爭。

英國在遠東的政策也沒有兩樣。「一九一八」事變後，西門支持日本是以滿洲爲日本進攻蘇聯的「賞金」。不過日本既佔領滿洲，並未替資本主義國家負起反蘇聯的責任，這不免使英國有些懷喪。近來，英國從支持日本的態度改爲拉攏美國壓迫日本的態度，一方面固然是保護自己的在華利益；同時也是逼日本向西北發展去進攻蘇聯。現在日本佔據察北六縣，劫掠外蒙邊境，且聞廣田將向中國提議締結軍事同盟，共同在蒙古、新疆防禦蘇聯的勢力。順着這種方向幹下去，也祇有一種意義，即在遠東方面變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戰爭爲進攻蘇聯的戰爭。

如果戰爭的性質，照上述計畫改變，顯然是對帝國主義者有利的。不過，客

觀事實的發展，往往超出帝國主義者預定計畫之外。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在俄、德兩國不是發生過革命嗎？這樣說來，戰爭的性質還有另一種改變，就是：變帝國主義重分世界的戰爭為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

記得去年今日，我在國際政治的總形勢（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一文中，曾說到：「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一三年之間，更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異點，那就是資本主義世界內的革命酵素一天天成熟了。在戰前，除俄羅斯外，各國革命運動，是值得不注意的。近幾年來，却與戰前兩樣，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各國革命的火燄正在地下燃燒着，罷工、騷動、巷戰、流血……成了一般的現象。」現在要補充的是：一九三四年如此，一九三五年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不必多舉例證，只須記憶下述幾件大事，如二月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暴動，三月的希臘革命，古巴罷工，五月的菲列賓革命，七月的英國汽車罷工，美國礦山罷工，丹麥農民示威，八月的印度回教徒暴動，十一月的巴西革命，埃及獨立運動，十二

月的中國學生救亡運動，再加上東非反意戰爭以及滿洲義勇軍反日戰爭，便可窺見革命怒潮已經洶湧澎湃了。把這種怒潮略加分析，即看出由兩個支流匯合而成，一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當戰爭危機成熟的時候，或者是戰爭業已爆發的時候，帝國主義者打算把廣大民衆驅到戰場上當礮灰，而那些不願當礮灰的「叛逆分子」——資本主義國家的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則高舉革命的旗幟，共謀打倒帝國主義，這麼一來，就變帝國主義重分世界的戰爭爲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了。

現在，一九三五年已經過去了，未來的一九三六年或許是戰神活躍之年吧！戰爭是以弱者爲犧牲的，我們如不甘心替強者當礮灰，就應該及時奮起，擴大反戰爭運動！不幸而戰爭爆發，我們唯一的生路，是以戰爭答復戰爭——以民族革命戰爭答復帝國主義宰割中國的戰爭。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思想新舊，都應該結成鞏固的民族革命

陣線，與宰割中國的帝國主義肉搏。與一切依附帝國主義的漢奸及準漢奸肉搏。這是我們中國人在緊急時期應該有的認識！這是我們中國人，在一九三六年應該有的決心！

雲南起義二十週年紀念日

世界進入一九三七年

我們已進入一九三七年的門檻上。

擺在面前的舊日曆——一九三六年的日曆——快要撕得精光，這無異告訴我
們說，大家已經熬過一九三六年了。記得去年今日，我在緊急時期的世界政治
(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一文中講過：「一九三六年是帝國主義者所謂危
機之年。帝國主義者所以誇大這種危機，其理由非常明白，乾脆一句話，就是藉
此爲口實以準備戰爭，或者說藉此爲口實以重分世界。我們平素聽慣了帝國主義
者的宣傳，當走進一九三六年的時候，便覺得面前正擺着一幅黑影與火光交織成
的畫圖」。到現在，一九三六年總算在黑影與火光中過去了。

我們熬過一九三六年而進入一九三七年，是否可以說，今後的世界已從此

脫離「惡運」呢？在黑影與火光中翻筋斗的人們，不僅希望脫離「惡運」，並且要求脫離「惡運」。假使「上帝有靈」的話，我們都願意向它祈禱：這幾年來的「惡運」跟着一九三六年一塊消逝；從一九三七年起，再不受戰爭的威脅，大家安樂，大家和平。

可是當前的世界，不是「上帝」所能支配，要想脫離「惡運」也不是祈禱所能奏功。眼前的事實，證明所謂危機之年，並未跟着一九三六年一塊消逝，而那些支配現世界的主人——帝國主義，仍舊飛揚跋扈，繼續準備戰爭，企圖用戰爭的手段來重分世界。我們從這一點去觀察，恐怕一九三七年的前景，還是一幅黑影與火光交織成的畫圖吧！

難道一九三七年依然在一九三六年的舊軌道上滾滾來滾去，沒有一點差別麼？自然也不是這樣。正確的答覆，差別是有的。差別在什麼地方？就是本文應該討論的中心問題。

一 先用經濟的分光鏡觀察起

要預測「天下大勢」，必先注意世界經濟問題，這是無可懷疑的真理。所以我們要預測一九三七年的「天下大勢」怎樣，必先明白一九三七年的世界經濟怎樣？

一提到世界經濟，大家都知道有兩個範疇：一是蘇聯的計畫經濟，一是蘇聯以外各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前者依照預定計畫，一年的進展，沒有什麼神祕；後者呢？情形非常複雜，它的變化也與人們的意志無關，不像蘇聯的計畫經濟那麼單純。在這裏，且專講後者。

凡是注意世界經濟的人，都知道以工業生產為標準，可把一九三六年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分成下列四類：

第一類以英國為代表，它們的工業生產已超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

第二類以日、意、德爲代表，它們的工業生產雖已超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但備戰在經濟生活上起了決定的作用。

第三類以美國爲代表，它們的工業生產沒有達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可是目前正在蒸蒸日上。

第四類以法國爲代表，它們的工業生產仍停滯在經濟危機的最低點，而且經濟改善的速度非常緩慢。

這樣一幅世界經濟的分野圖，告訴了我們什麼呢？第一，資本主義經濟好轉是事實，但這種好轉是不平衡的，從此便知道資本主義普遍繁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第二，這種好轉大半是在備戰的基礎上進行，就算工業生產超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仍與廣大羣衆的生活無關，所以城市的失業與農村的貧困，依然不能克服。第三，在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家不得不採用損人利己政策，以致各國相互間的經濟衝突，達到短兵相接之境。所有這些現象，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

特徵；從某方面去看，也可說，在資本主義經濟好轉的氛圍氣中，已包含着許多有害的因素在內。一九三六年的世界經濟是如此，一九三七年的世界經濟更其如此。

我不願意抄寫枯燥無味的統計數字，使讀者看了討厭，祇打算引一位有權威的世界經濟學者的話以資證明。瓦爾加(E. Varga)最近在世界經濟的現狀一文中，曾說過下面一段話：

「在各國發展這樣不平衡的條件之下，又在成熟着新的週期的世界經濟危機。大概它不是首先爆發於日本，便是首先爆發於英國。因為這兩國的經濟，最接近於普通的經濟危機以前的狀況，如生產水平線的很高，固定資本的擴充等。經濟危機究竟將在何時開始，目下還不能斷定。但大概說來，它將爆發於一九三七——三八年。」

這段話，是就世界經濟在和平發展之下說的。其實，當世界各種矛盾緊張的今日，這樣的和平發展能否延續到新的週期的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之後，誰也不敢

保證。所以瓦爾加接着又補充了下面幾句話：

「假使世界大戰一旦開始，那麼，它馬上定要摧毀週期的發展。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與上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樣，代替週期的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則是一種臨時的戰時經濟狀態——這戰時經濟狀態也許是資本主義史上的最後一次吧！」

把上面所引的兩段話合起來看，便知道一九三七年的世界經濟，有兩個可能的前途：一是要爆發新的經濟危機，一是因大戰開始而轉入戰時經濟狀態。無論那一種前途，都是過去「惡運」的繼續。一九三七年的世界經濟既是這樣，則一九三七年的「天下大勢」也可窺見一斑了。

二 侵略陣線與戰爭

一九三六年國際政治舞臺上第一件大事，是歐亞兩洲的侵略者擡頭，——不，是歐亞兩洲的侵略者在擡頭之後，結成「三位一體」的「侵略陣線」。這便

是震動全世界的德、意、日三角同盟啊！

德、意、日三個侵略者，要幹打家劫寨的勾當，自然不是由於希特勒、墨索里尼或荒木貞夫之流的野心，而是德、意、日的經濟條件所決定。它們都是金融資本控制一切的國家，自捲入經濟危機的漩渦以來，又都在絕望中掙扎，所以要求擴大「日光之下的地盤」。日本在東亞的狼吞虎嚥，意大利向東非「宣揚文明」，「第三帝國」在歐洲大陸上張牙舞爪，都是「弱犬易吠」的表現。固然，這些侵略者的暴行，不始於一九三六年，但在一九三六年之內，却特別來得露骨。如日本在華北增兵，走私，簽訂「防共協定」，要求「冀察政權明朗化」，嗾使蒙僞軍進攻綏遠；如意大利在攻下阿狄斯阿比巴之後，正式宣布吞併「黑人帝國」；如德國撕破羅迦諾公約，進兵萊茵區，窺伺但澤，插足多腦河流域；都在我們記憶中留着新的印象。有這些事實爲證，就說一九三六年是侵略者活躍之年，也許不算過分吧！

何況這些侵略者，近來已正式握手言歡？自七月十一日德奧協定簽字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間的矛盾即已緩和。十月間，經過齊亞諾訪問柏林，德意兩國已締結所謂「工作協定」(Working Agreement)。到十一月底，德日同盟與意日協定又先後成立。這即是說，德、意、日已結成三位一體的「侵略陣線」了。從表面看，彷彿是戰前三國同盟的「再版」，但是少了一個奧匈帝國，添了一個「東亞霸王」，決不是「李代桃僵」，而是把侵略網從歐洲牽到東亞。這種侵略陣線的結成，可使全世界爲之戰慄。假使說，一九三六年是侵略者單獨搶劫的時候，那麼，一九三七年恐怕要變成侵略者共同搶劫的時候了。目前，德意兩國一致支持弗朗哥，在西班牙造成殘酷無比的內戰，使法西斯魔手伸入意卑里亞半島之上，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不管德、意、日三角同盟把「反波爾雪維克」的旗子扯得多高，但它們的中心目標，却是要求殖民地，却是重分世界，乃是毫無疑問之事。它們在同盟成立

的時候，相互承認「賊物」爲合法的財產（如承認意國併阿，承認「滿洲國」等），是大家皆知道的。德日同盟的附件，有分割荷屬東印度羣島的傳說。希特勒公開提出殖民地問題，已不止一次。沙赫特也說德國需要殖民地，甚至主張「建立海外的德國」。墨索里尼近又聲明意大利在非洲的舊賬已經清算，但其他各處則尚未着手。所有這些說法，都有意或無意的把侵略的陰謀洩露出來。

假使這種估計不錯，則歐亞兩洲的侵略者在大聯合之後，一定要採共同的步調，向全世界進攻。日本自然是繼續宰割中國。意大利在消化「黑人帝國」之外，無疑的是對近水樓臺的西班牙開刀。德國雖在西班牙插下一隻腳，但這是不能滿足的，但澤、捷克、米美爾，甚至烏克蘭，都是它垂涎的對象。它們已在備戰的基礎上把工業生產拉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了，跟着工業生產向上所發生的原料問題與市場問題，又逼迫它們不得不上戰爭之路。現在什麼都預備好了，侵略陣線也結成了，祇等待時機，祇等待導火線，再下總動員令。一九三七年或

許是全世界同時大敲戰鼓之年吧！

三 由歐洲到全世界的和平運動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與侵略陣線分庭抗禮的，則有廣大的和平陣線。這種對立的形式，是否是戰前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的「重演」呢？祇見現象不見本質的觀察者，或以爲是「重演」，可是我們却看出兩者的不同。最不同的一點，就是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都屬於帝國主義的營壘，都是「一邱之貉」；而和平陣線則由全世界反侵略的勢力所結成，內中固然有帝國主義國家參加，但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在不願戰爭的情形下，已暫時放棄自己的侵略政策，以維持現狀爲有利，所以整個和平陣線是反侵略的，它與三國協約的異點就在這裏。

說到和平陣線，誰都知道法蘇互助公約是它的柱石，這也同侵略者的擡頭一樣，不始於一九三六年，但在一九三六年之內，因爲希特勒的再三挑畔，因爲蘇

聯的國防進步，尤其是因為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成立，所以這個維持和平的柱石，就越發鞏固而不可動搖。在這裏，應該附帶指出一點，從前或者是蘇聯借重法國，現在似乎是法國仰仗蘇聯。記得李維諾夫不久以前說過：「歐洲想孤立蘇聯，那不要緊，蘇聯能夠單獨應付所有的敵人而自衛；所可憂慮的，倒是歐洲離蘇聯而孤立，恐怕難保安全」。這幾句豪語，雖說是自誇，也許近於事實。

正因為法蘇兩國手牽着手的維持和平，所以歐洲大陸上許多害怕戰爭的小國——如波羅的海東岸三小國、如小協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雖有些動搖，但不至脫離和平陣線），如巴爾幹協商國，都集在法蘇互助公約的周圍，就是過去對德國送秋波的波蘭，近來又回到法蘭西小姐的身邊了。不僅歐洲大陸上的小國如此，連站在歐洲大陸圈外的英國，目前也在改變態度。唐甯街十號的主人對法國表示親切，年初在地中海上的合作，是誰也記得的；最近艾登與台爾博斯都先後聲明英、法、比三國互保安全；處理西班牙問題，英法已趨於一致；甚至對東歐

問題，在波蘭外長柏克訪問倫敦以後，英國更明白主張不可與西歐問題分開解決。英國與蘇聯的關係，半年來漸見好轉，如英國在蒙德婁會議上的讓步，以及英蘇海軍協定、英蘇商務貸款協定的成立，都是般鐵的事實。而倫敦泰晤士報聽到德日同盟簽字的消息，且嚴厲的斥責日本，並指出蘇聯的志願確係和平，蘇聯的整軍經武不以侵略為目的。截至目前為止，我們雖不能認定英國已與法蘇站在相同的立場，但它受到侵略者的威脅，一天天與和平陣線接近，是很明顯的。假使德、意、日三個侵略者，今後要實行重分世界，妨害大不列顛的利益；那麼，一九三七年的英國，在國內廣大羣衆的壓迫之下，也有正式加入和平陣線的可能。據美國赫斯上校 (Colonel House) 的觀察，德日協定的結果足以促進英、法、蘇三國的聯合；又照他的意見，英、法、蘇的聯合，不過是時間問題吧了。

以上是歐洲和平運動的輪廓。

再看美洲吧。在金元外交控制的新大陸，自巴、玻戰爭停止後，似乎不像歐

亞兩洲那樣充滿了硫磺氣。可是由於各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的角逐，正醞釀着深刻的危機；同時受世界大戰的威脅，特別是受日本侵略的威脅，以致遠隔重洋的新大陸，也不是什麼「世外桃源」；事實證明了和平是不可分割的。這次由羅斯福所號召的泛美和平會議，在阿根廷京城舉行，集合二十一國代表於一堂，通過中立公約，通過美洲各國團結與合作的宣言，一方面用外交途徑解決各國相互間的糾紛，一方面採取一致的行動以對付外來的侵略，實含有很重大的意義，應該說是和平的清風已由歐洲吹到美洲了。這是一九三六年的新收穫，也是一九三七年的新曙光。

倘若我們分析和平運動的發展，祇看到某幾國的要人跳來跳去，那還是見其偏不見其全。在實際上與各國上層和平運動互相呼應的，則有民衆間的和平運動。小者如反戰示威，大者如抵抗侵略，都是和平運動的支流。這一類的材料太多，沒有篇幅敘述。但布魯捨爾的世界和平大會，有三十五國參加，代表多至四

千九百人，總算是一九三六年中破天荒的盛事。這些代表負起「拯救和平」的責任，分佈在全世界，到處散播和平的種子，這一定要在一九三七年開出千紅萬紫的奇葩來，

總之：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到一九三七年是愈逼愈近的。侵略陣線內面的蝦兵蟹將，準備在毀滅世界的戰場上放起野火；而和平陣線內面的和平使者，却在分途努力，想把全世界每個角落裏一點一滴的和平力量，匯合而成洪流。究竟是野火燒乾洪流呢？還是洪流撲滅野火呢？這應該留待「事實先生」來回答。

四 噴火口也許在東方吧

在火山快要爆發的時候，必須有一個噴火口迸發岩漿。據說，噴火口總是地殼最薄或是有裂痕之處，即是抵抗力最小之處。這是地質學詔示我們的真理。世界大戰也有它的噴火口，但迸發出來的不是岩漿，而是人類的赤血與白骨，這些

赤血所塗的地帶與白骨所堆的體積，要超過往古來今的一切火山。試問世界大戰的噴火口在什麼地方呢？無疑的也是抵抗力最小之處。

在意大利侵阿戰爭打得不能開交的時候，紅海地中海一帶，已經白浪滔天，有些人以為世界大戰的噴火口一定在那兒；可是在英法合作的壓力之下，居然使戰禍未超越東非一隅。

其次，在德意攜手挑撥西班牙內戰的過程中，有些人又以為世界大戰的噴火口，將移至意卑里亞半島；但到現在，戰爭的火燄還未延燒到西班牙以外，這也不能不歸功於英法合作。今後是否鬧出意外的亂子，雖不敢斷定；假使英法一致貫徹不干涉政策或者設法使墨索里尼縮頭的話，也許問題不致擴大吧。

再單就德國說，它本想用納粹的槍尖，在歐洲大陸上戳開一個噴火口；然而西進則遇到英、法、比的共同防禦，南下或東向，又要碰法、蘇、捷的硬釘子，所以這隻「餓老虎」還不能跳出鐵籠。

這些例子，無異告訴我們說，在和平陣線強固的地方，侵略者是不能揮其自由之手的。儘管德意在歐洲狼狽爲奸，（同時，德意間的矛盾也不可忽視）。可是祇要法、蘇、捷始終團結不懈，祇要英法始終不分開（如果英蘇有進一步的聯合自然更好），我敢大膽說一句，歐洲的和平是有保證的。

美洲呢？它以地理上的優點，別洲的侵略者都不容易侵入，再加上汎美和平會議所完成的團結與合作，簡直造成一座「鐵桶江山」，在那裏，決尋不出噴火口來，

究竟世界大戰的噴火口在什麼地方呢？

無庸諱言的，東方是和平陣線最弱的一環。像歐洲那樣重重疊疊的互助公約及互不侵犯公約，這裏通通沒有，要說「聊勝於無」的話，就祇有一紙蘇蒙協定。誰也明白：在東方這樣嚴重的局勢，決不是一紙蘇蒙協定所能維持。不錯，中國人是以愛好和平見稱於世的，然而僅有愛好和平的心理，沒有保障和平的組

織，當然不能制止侵略者的活動。加以，德、意、日三國結成侵略陣線以後，在歐洲既碰壁，一定要到抵抗力最小的東方來找出路。這樣，噴火口勢必從歐洲移到東方了。

更從經濟上觀察，前面已說過：未來的世界經濟危機，不是首先爆發於日本，便是首先爆發於英國。假定首先爆發於日本，則我們的「友邦」，為填補危機中的損失，會從東方的弱者身上多割幾刀。假定首先爆發於英國，則「友邦」又要趁着紳士們無暇東顧的時候，再在東方舞臺上變新把戲。就這一點說，噴火口也要落在東方。

一九三七年啊！在東方的噴火口恐怕要迸發岩漿吧，——不，恐怕要迸發赤血與白骨吧！

五 我們怎樣自衛呢

大家期待着一九三七年給我們以新希望，誰料所給的是新希望的反面——噴火口。

我們願意在噴火口裏毀滅麼？不，決不，一百二十個不！我們要塞住噴火口，我們要團結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妨止噴火口衝開。

怎麼辦呢？我以為有下列兩種戰略 (Strategy) 可以採用：

一是包圍的戰略——仿照歐洲的辦法，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使幾個侵略者孤立起來。胡適之主張中國加入英、美、法、蘇的民主陣線，內容就是這樣。這是否可能呢？在大家都需要塞住東方噴火口的時候，是可能的。因為噴火口一旦在東方爆發，中國與蘇聯固然首當其衝，就是英國的澳洲與馬來半島，美國的菲列賓，法國的安南，都要遭受不幸。英國生怕它在遠東的利益再受打擊，前面所引倫敦泰晤士報的言論，即是證據。近來英、美、法擬在一九三七年談判經濟合作的消息，已由每日電聞透露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倫敦電訊。）萊翁伯倫

早發表過英、美、法三大民主國通力合作的意見，巴黎政府已向華盛頓提議清理戰債問題。羅斯福在泛美和平會議開幕之日，也鄭重表示美洲各共和國應該協助舊世界各國避免戰爭。根據這些事實，誰說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不能建立呢？（在包圍的戰略以外，利用侵略陣線的弱點，拆散意大利與德日的聯合，也是有益的。）

二是突擊的戰略——僅有包圍的戰略是不夠的。因為侵略者困在核心，隨時要投間抵隙，突出重圍。從侵略者的眼光看，中國自然是它的出口。所以我們遇到敵人投間抵隙的時候，必須給以當頭一棒，用流行的話說，就是「抗戰」兩字。目前的綏遠戰爭，即是我們抗戰的開始。本來，抗戰與和平在表面上是不統一的。但弱者要逃脫敵人的屠刀，要打擊破壞和平的侵略者，以保證永久的和平生活，除了採用突擊的戰略（抗戰）外，實沒有更有效的方法了。

我們為自衛計，同時為世界和平計，非塞住東方的噴火口不可，要塞住東方

的噴火口，又非採用上述兩種戰略不可。至於怎樣執行這些戰略，那是另一問題，非本文應該討論的事。

一九三七年的警鐘，正在不斷的響着。我們不願坐在噴火口上等待犧牲，就得努力前進！就得聯合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共同前進！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世界經濟危機與第二次大戰

一 危機的真相

「假使戰爭今日在歐洲爆發，也許對任何人不會引起驚異吧！今日在歐洲的一切戰爭，祇是十年來沉默而又潑辣的經濟戰爭之武裝的表現。經濟戰爭在關稅壁壘上、在通貨膨脹上、在政府補助本國工商業上、都已暴露出來。它的殘忍與無情同世界大戰一樣，並且成就不多。」

這是史提爾 (Johannes Steel) 寫在歐洲走向戰爭 (Europ. Moves Toward War) 一文中的第五節——國家主義的機構 (The Mechanics of Nationalism)——裏一段話 (註一)，我差不多完全同意。不過，上述情形不祇歐洲如此，就全世界

言也是如此。假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今日在歐洲或是遠東爆發，我想再沒有人說它是意外之變吧！

誰也知道：戰神不是什麼「不速之客」，隨時可以光臨；它之來也，祇在某種特殊環境之下；申言之，即在人家需要它的時候，並且是千呼萬喚不能不出來的時候，才挺身而出馬，以大刀闊斧來解決問題。現在，資本主義世界沉沒於幾年來經濟危機的「洪水」中，用盡一切方法，仍不能超登彼岸，不問是西方或是東方，都有訴於戰爭的必要。在這種危迫情形之下，戰神便捋髭微笑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於是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退隱的戰神，也想「東山再起」了。

前面講過：「……一切戰爭祇是十年來沉默而又潑辣的經濟戰爭之武裝的表現」。假定這句話不錯，我們要深刻了解第二次大戰的必然性，那就不可不從世

(註一) The Nation, April 11, 1934.

界經濟分析起，或者更精密一點說，那就不可不明白世界經濟危機的現階段。

首先應該請「統計先生」用輕描淡寫之筆，把全世界經濟的總輪廓畫出來。

全世界工業生產（註二）

年 度	資本主義世界（一九二五——二九——一〇〇）	蘇聯（一九二九——一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一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九四・六	一三〇・五
一九三一年	八二・一	一六〇・九
一九三二年	六九・〇	一八二・九
一九三三年	七八・一	一九八・一
一九三四年	八四・三	二三八・二

（註二） League of Nations: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August 1936, P.345—

一九三五年

九二·八

二八八·二

這是兩個世界工業生產的對照，情形非常明白。我們無須說蘇聯經濟怎樣比資本主義經濟優越，也無須說一九三五年的資本主義工業，退到大戰前的水平。我們祇請大家注意這一點，就是：資本主義工業在一九三五年的數字，雖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四·八，但比一九二九年仍降低百分之一七·二。這就是說，到現在，經濟危機的深淵依然無法填平。

如果要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世界幾個主要國家的工業生產，則有下面的統計可資參證。

幾個主要國家的工業生產指數（註三）

	美 國	英 國	德 國	法 國	日 本
一九二九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三）同註二 P343.

一九三〇年	八〇·七	九二·三	八五·九	一〇〇·四	九四·八
一九三一年	六八·一	八三·八	六七·六	八八·九	九一·六
一九三二年	五三·八	八三·五	五三·三	六八·八	九七·八
一九三三年	六三·九	八八·二	六〇·七	七六·七	一一三·二
一九三四年	六六·四	九八·八	七九·八	七一·〇	一二八·七
一九三五年	七五·六	一〇五·七	九四·〇	六七·四	一四一·八

上面數字，把幾個主要國家的工業生產和盤托出了。就一九三五年說，法、美全國情形較壞，德國次之，英國較好，已超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同時，我們應該記着，英國即在一九二九年的最高峯也未達到戰前的水平，這就是說，英國的青春早已過去了。）日本更扶搖直上，比一九二九年超過百分之四一·八。根據這些事實，我們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三二年已降到最低點；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雖說各國情形不一致，但多少的已擡起頭來。一九三六年仍在上

升，特別是美國與德國（十月的數字前者爲九一·六，後者爲一一一·三）。

二 戰爭前的利市

有些庸俗的經濟學家因此喧嚷起來了！他們以爲從一九三三年起，在世界復興的道路上已經一帆風順的前進。我們在經濟學家 (Economist)、年表記者 (Analyst) 等刊物上，常常看到許多樂觀的論調。彷彿寒冬過了，便是春天；危機過了，便是繁榮時代。

可是，凡屬研究真理的人觀察問題，不應該祇注意表面的現象，而應該分析其內部的本質。比如說，一九三二年以後的工業生產固然有幾分好轉，但這種好轉是緩慢的，甚至有時進一步，退兩步，姑且以美國爲例吧！一九三四年祇增加百分之二·五，一九三五年祇增加百分之九·二。再舉法國爲例，一九三三年雖升至七六·七，不料在一九三四年已降至七一·〇，在一九三五年又降至六七·

四。我們能說這種好轉是一帆風順麼？

然而，從一九三三年起，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已漸入佳境，總是事實。誇張這種事實固不可，抹煞這種事實亦非是。正確的態度是要了解事實的真相；明白些說，是要懂得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近年有相當進步是怎麼一回事。

「事實先生」是最公平無私的，擺在面前的許多事實，異口同聲的說：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所以有相當進步，毫無疑義的是與「備戰」有關。根據柏林景氣研究院的調查，世界軍費支出與世界生產價額，有如下之統計：（註四）

	軍費支出	世界生產
一九一三年	六四	五四
一九二五年	九〇	九七
一九二八年	一〇〇	一〇〇

（註四）有澤廣巳世界經濟的現階段（平明雜誌八卷三期）。

一九二九年	一〇四	一九二九年	一〇四
一九三〇年	一〇七	一九三一年	一〇四
一九三二年	一〇七	一九三二年	五六

很明白的，自一九二九——三二年，世界生產價額幾乎減少半數，而軍費支出不惟沒有減少反而增加百分之七。上表的數字，雖嫌陳舊一點，但一九三三年以後的軍費支出，在事實上當更大於一九三二年。如以日本爲例，一九三二年的軍費祇占歲出總額的百分之三三·九，而一九三三年竟增至百分之三六·五，到一九三四年又增至百分之四〇，到一九三五年便離百分之五〇不遠了。軍費不斷的擴大，即各國軍火購買力的提高，換言之，即各國軍事工業發展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之上，於是鋼鐵工業、化學工業、汽車工業……便從絕望之中漸漸回過頭來。

先從鋼鐵工業說起。下表是幾個主要國家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五年每月生產鋼鐵的平均噸數之比較：（註五）

	生鐵（單位千噸）					鋼（單位千噸）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美國	七三五	一,二一九	一,三四八	一,七七一	一,二八	一,九二三	二,一三九	二,八〇〇		
英國	三〇三	三五〇	五〇六	五五五	四四五	五九五	七五〇	八三三		
德國	三三八	四三九	七二八	一,〇四五	四八一	六三二	九九〇	一,三〇二		
法國	四六一	五三七	五三三	四八二	四七〇	五四四	五二四	五三三		
日本	六	一三三	一六一	一七九	二〇〇	二七七	三五五	三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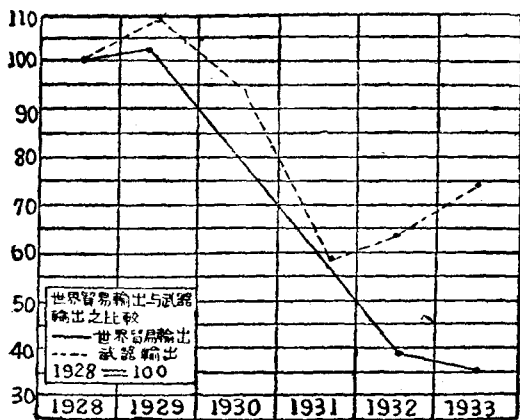
把上面數字稍加整理，便知這五個國家在一九三五年內比一九三二年多產生鐵二百一十萬四千噸，多產鋼三百一十七萬九千噸，不能不說是龐大可驚的數字！（如果再加上比利時、盧森堡幾個地方的鋼鐵產額，數字就更大了。）這種

（註五）同註一 P.751.

巨額的鋼鐵用到什麼地方去呢？不言而喻的，用於和平建設者少，用於武器製造者多；換言之，鋼鐵中之大部分，不是用去生產，而是用去殺人的啊。馬札亞爾（Magyar）說：『日本所以多製鋼鐵，爲的是藉此武裝軍隊；爲的是藉此製造坦克、軍用飛機、汽車、重砲、與射擊砲；爲的是要在滿洲築軍事鐵路，在朝鮮築軍港，在滿洲、在朝鮮、在日本建設兵工廠。』（註六）豈僅日本如此，即日本以外列強都是如此。所以，武器製造廠的股票（如英國的 Vickers，法國的 Schneider-Creuzot，捷克的 Skoda，瑞典的 Bofors，德國的 Krupp，）都飛漲起來。

自然，有些國家製造武器不一定是供自己用的，它們靠輸出武器賺錢。儘管近幾年來世界貿易輸出愈縮愈小，而武器輸出却是與年俱進。下面的剪刀形，即是這兩者背道而馳的結果。

（註六）馬札亞爾經濟危機發展中的新現象（時事類編，一卷四期）。



(註七)同註四，但圖是我根據統計數字製成的。

事實是這樣：世界貿易輸出自一九二九年後，急轉直下，到一九三三年降到

百分之三六；而武器輸出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與世界貿易輸出同樣減退；在一九三一年兩者的比率幾乎相等（約為百分之五八）。可是自一九三一年後，武器輸出便起了相反的運動，在一九三二年升至百分之六三·七，到一九三三年又升至百分之七五（註七）。一九三三年以後，情形亦同。

似乎再明白沒有了，所謂軍費支出的膨脹，所謂鋼鐵工業的復興，所謂武器輸出的擴大，都是與備戰分不開的。此外，如化學

工業——尤其是人造絲——的進步，汽車工業的轉機，以及軍用品原料的大批進口，都與備戰有關係，因限於篇幅，不及一一說明。總之一句話，沒有備戰的熱狂，就沒有經濟的好轉，一九三三——三六年的「興旺」，不過是戰爭前的利市 (Pre-war Boom) 而已！

三 通貨膨脹與市場鬥爭

可是，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有相當進步的因素並不止此。近數年來，各國財政巨頭 (Financial Oligarchy) 所用的另一法寶，就是通貨膨脹 (Inflation)。一般說來，通貨膨脹本像一種不易猜破的「謎語」，有許多人被這「謎語」難住，弄得神志昏迷，羅斯福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我在這裏，也無須把這「謎語」詳加解剖，祇把它與工業生產進步有關係者略述一二：

據說現時實行通貨膨脹政策者多至五十餘國，可見它已成爲世界經濟危機中

最時髦的「藥方」。不過，這個「藥方」對於世界經濟危機不是「培元湯」而是「興奮劑」。在通貨膨脹政策之下，幣價大跌，物價上升，本有利於工業生產者，藉此可以刺激工業的發展；這即是說，用人爲的方法造出暫時的「假繁榮」。但另一方面，幣價大跌，物價上升，降低了勞動者的真實工資，(real wage)，縮減了農民的各項進款（農產品價格雖略可擡高，然擡高之數不能與幣價跌落之數相抵），又使中、小資產階級在銀行的存款無形中大受損失，所有這些影響都是削弱國內購買力的。這樣一來，工業上的「假繁榮」就沒有出路了。暖室裏的唐花，在盛開時，未嘗不可博得觀衆的贊賞，然而轉瞬之間即行凋謝。用通貨膨脹政策所得到的「假繁榮」，其情形正是如此。

通貨膨脹政策在國內既行不通，可走的路只有一條，就是向國外打主意，明白些說，就是把過剩的商品輸送到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去。真的！「在國際商業競爭的範圍內，通貨膨脹乃是經濟戰爭——特別是爲國外市場而鬭爭——上一種很

尖銳的武器。它可減輕外債，獎勵輸出，阻止輸入。在這方面，通貨膨脹首先可供某些國家——如英、日及其他國家——獲得大批利益。所以，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在嚴重的市場競爭中努力降低本國的通貨以壓倒別國。英國降低自己的通貨百分之三二，美國降低百分之四〇，而日本竟降低百分之六〇。」（註八）所以，英國自一九三一年九月放棄了金本位以來，輸出激增，在世界貿易上所佔的分額，已由百分之九·三六（一九三一年）升至百分之一一·五九（一九三三年前八個月）。日本亦於同年十二月實行「金再禁」，它的世界貿易分額，在相同期間內，也由百分之二·八九升至百分之三·三七（註九）。美國飄泊於世界貿易競爭的狂濤之中，終苦無法撐持，只得於一九三三年四月麥唐納赴華府的前夜，演了「東施效顰」的醜劇——放棄金本位。所以，美國的對外貿易從一九三三年四月

（註八） *Imprecorr* 30th Jan. 1934.

（註九） *Varga: Economy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1933.*

以後，日有起色，就出口貨的金額言，在四月份本祇一〇三百萬金元，到十二月已增到一八九百萬金元。

這條路果走得通嗎？大家知道：通貨膨脹不能創造新市場，只能在現存的並且是日益縮小的市場上大家搶骨頭吃。骨頭是有限的，於是搶骨頭的狗子就必不可免的要演「狗咬狗」的活劇。厄爾德里吉(E. R. Eldridge)不懂得這一點，所以武斷的說：『日本不需要戰爭，它祇需要安全，只需要與全世界和平貿易的機會。』(註十)誰知道「狗咬狗」是資本主義經濟決定的命運呢！

四 再不能進到繁榮時代了

如上所述，各國軍備競賽與通貨膨脹為世界經濟好轉的兩大因素，這是有鐵一般的事實證明的。如果拿這兩大因素來解釋一切，那就犯了不可恕的錯誤。

(註十) Eldridge: *What Japan Wants* (Current History, May 1934.)

因爲有些軍事工業不大發展的國家以及貨幣安定的國家，其生產曲線亦漸漸向上，可見在軍備競賽與通貨膨脹以外，尚有其他因素，即是說與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力量（The internal economic forces of Capitalism）亦有作用。資本主義可將經濟危機中的損失轉嫁到本國工人與農民身上，轉嫁到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廣大民衆身上，用「剝肉醫創」的方法，使岌岌不可終日的經濟危機略見緩和。

然而，這是否說：「寒冬過了，便是春天；危機過了，便是繁榮時代」呢？

「要判斷這一問題，必須把資本主義總危機與工業循環期的現在緊急階段，辨別清楚。資本主義總危機實在是不能克服的，這是帝國主義的特別階段，自然要歸宿到資本主義運動內在律之基礎上；……另一方面，現世界的經濟危機，是工業循環期內一定的短促的階段；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影響之下，特別尖銳、普

及、持久，……然而仍不過是循環期之階段而已。」（註十一）看透了資本主義在歷史過程中的命運，便知道在不能克服的總危機影響之下，就是工業循環期的危機略見緩和，就是逃脫了這次危機的最低點，也不能回到過去的繁榮時代。體質衰弱的六十老翁，偶患時症，如果用藥得宜，時症是可以治愈的；然無論如何，總不能把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健康恢復過來。

真實的情形，正與樂觀論者的幻想相反。這即是說，資本主義的前途，再沒有什麼繁榮時代。就目前論，危機的最低點早已跳過，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已從危機的深淵進到蕭條的階段（The stage of depression）。不過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之上的蕭條，決不是「正常」的蕭條（Normal depression），而是特殊的蕭條（Special depression），申言之，就是：既不會走向新的繁榮期，又不會回到舊的衰落點。像不能恢復健康的老年人一樣，如果不受新的襲擊的話，或許不

（註十一）拙譯世界經濟危機的回顧與展望，國際政治經濟年報，第一輯二八頁。

死不活的拖延下去。

爲什麼如此？從來工業危機的克服，大抵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充；而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充，又大抵由於社會購買力的增進；其表現的形式，主要的是在固定資本（生產工具）的擴大與更新上反映出來。固定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循環進程中的物質基礎，沒有生產工具的擴大與更新，就不會跳出危機的陷阱，就不會走上復興的坦途。這是經濟學的基本智識。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固定資本的慢性剩餘，是其主要特徵之一。即在繁榮之年——一九二九年，英國工業生產仍未達到戰前的水平（約當戰前的百分之九九·一）；德國工業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只有百分之六七·四。到危機爆發以後，各國廢置不用的固定資本，便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了。因爲有這種牢不可破的病根（自然還有其他病根混在一起），所以危機特別延長。在一九三三——三五年的好轉中，各國工業生產雖有上升之勢，然生產工具與消費資料兩者間的生產有許多國家依然很不平衡，即前者遠落在後

者之後。茲引下面的統計為證：（註十二）

	美國		荷蘭		波蘭	
	生產工具	消費資料	生產工具	消費資料	生產工具	消費資料
一九二九年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七二・六	八六・八	八六・六	九六・三	七九・四	八三・五
一九三一年	四八・二	八五・二	六二・九	九八・五	五九・八	七五・二
一九三二年	二七・六	七五・九	四五・九	八三・〇	四二・四	六四・一
一九三三年	四一・二	八四・二	五五・二	八五・九	四六・六	六四・三
一九三四年	四六・五	八三・四	五五・八	八六・一	五五・四	七一・七
一九三五年	六二・九	八七・六	四七・二	八九・六	六二・二	七四・九

其他各國沒有這種統計可查，但局部數字是有的，如一九三五年機械工業指數英國為一〇三・四（一九二九——一〇〇），法國為六一・一，都落在各該國

（註十二）同註一 P.348.

工業生產總指數（見本文第一節）之後。有這些冷酷的事實擺在面前，還能希望資本主義轉入繁榮時代麼？大戰以後，慢性的失業本是經常現象，近來更匯合而成失業的洪流，加以各國農業危機又未緩和多少；在城市與鄉村普遍貧困化的環境之下，還能希望資本主義擴充市場麼？目前特殊的蕭條，也許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不易救藥的病態吧！

五 大戰的必然性

現世界許多偉大人物——從美國的羅斯福到德國的希特勒，從英國的鮑爾溫到日本的廣田，都以挽救資本主義的良醫自命，開了各種不同的藥方：不管是「帝國特惠」（imperial preference）也能，「第三帝國」（Third Reich）也能，「經濟的國家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也能，「超傾銷」（Super-Dumping）也能，都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問題——市場問題。他們儘管絞盡腦汁，

想以各種「錦囊妙計」，在資本主義的「迷宮」內，尋找新的出路，結果，不是效果毫無，就是「扶得東來西又倒」。

或許有人要這樣說，資本主義的發展已超過了國界，關於市場問題當然不是一國所能單獨解決，應該採用協調的方式來共同處理。粗看起來，這句話似乎不錯。可是，從前轟轟烈烈的倫敦經濟會議不是採用協調方式的實例麼？結果，都想以犧牲他國為協調的基礎，弄得你協我不協，我調你不調，大家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這次會議的教訓，證明採用協調的方式也是「緣木求魚」。

於是許多偉大人物都不免「茫然」起來！表面上雖裝腔作勢，彷彿「智珠在握」似的；實則早已束手無策，陷於進退維谷之境。這是否是說許多偉大人物都沒有出息呢？問題的核心，不在這方面，而在於「上帝」不應該創造這破綻百出無法彌縫的世界。

現在，似乎大家都已明白：單獨解決既不可能；協調處理又難實現。費了

九牛二虎之力，不，費了全世界「頭腦托辣司」(Brain Trust)之力，總不能把資本主義的輪子，扭轉到康莊大道上去，只得仍舊在「危崖」上盤旋；換言之，只得仍舊在軍備競賽與通貨膨脹的絕路上繞圈子。軍備競賽的結果，無異在全世界上滿佈了火藥庫；通貨膨脹的結果，無異在全世界上滿佈了哨兵。唯一的出路，只有戰爭，必須戰爭，而且非戰爭不可。因為重分世界，不是外交家的任務，而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所愛幹的把戲。於是乎久蟄思起的戰神便相時而動了。

戰爭能解決世界經濟危機麼？戰爭能創造資本主義的新運命麼？在各國財政巨頭的眼中，自然認為：第一，在大戰爆發之後，可以暢銷大批軍火，可以把一些工廠許久不用的車輪轉動起來。軍火製造家漢斐爾爵士(Sir Robert Hadfield)在向股東的報告書中，宣布營業獲利的狀況說：「很幸運的，跟着不景氣而來的時局已經好轉了。我們對於上帝的恩惠，實在感激之至！但我還希望他能使我們

感激那行將收穫的利益！」（註十三）這是公開的自白。第二，各國失業的洪流，長期泛濫，示威，騷動，幾乎鬧得資本家以至政府當局大家頭昏。就是他們得到一點失業救濟，勉強安靜起來，亦是虛耗國家財力。此薛福黎（Stegfried）先生所不惜大聲疾呼，稱爲「失業的毒素」也。（註十四）假使大戰一旦爆發，可以在「擁護祖國」的口號之下，把這些失業隊伍送到前線去，「爲國犧牲」。這也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方策之一。第三，在兩軍對壘之先，都想出奇制勝，打倒敵人。如果成功（自然只有一方面成功）的話，不僅可以奪取敵人的市場與殖民地，並且可以把自己在危機中與戰爭中所受的損失，用「賠款」的形式，轉嫁到敵人身上。各國財政巨頭的「如意算盤」，簡單說來，就是如此。

然而，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各國財政巨頭固然認爲戰爭是逃出經濟危

（註十三）司冬裁軍會議聲中軍火輸出的亢進（時事類編二卷十六期）。

（註十四）Stegfried: England's Crisis, PP.77—87

機的一條輕便鐵道，同時與這條輕便鐵道平行的，還有一大羣下層人所愛走的「捷徑」。當國際矛盾與國內矛盾參伍錯綜的今日，資本主義列強國內的被壓迫者以及帝國主義鐵騎下的弱小民族，都企圖乘機出頭。這即是說，在第二次大戰的火藥庫裏，也藏有「革命」的炸彈，「戰爭」與「革命」或許是經濟危機搖籃內的「孿兒」吧！從某一視角去看，戰爭本可制止革命；從另一視角去看，戰爭亦可引起革命。假使歷史的車輪還要走第一次大戰的舊路，那麼，在第二次大戰的血海中，就沒有舊制度的「救命圈」，而祇有新時代的「奠基石」。照此看來，在各國財政巨頭的「如意算盤」上，早被城隍菩薩註定了「不由人算」四個大字呢！

講到這裏，就可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了，戰爭可以解決世界經濟危機麼？戰爭能創造資本主義的新運命麼？「事實先生」的答案是否定的。扼要的說，第二次大戰不會把世界經濟危機減輕，也不會使目前不死不活的狀況特別改善。正

相反，第二次大戰的燬火，無疑的要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上，再加新的創口，使總危機的病症益發不可救藥。歷史發展的趨勢是與各國財政巨頭的願望相違的。

沒有「偏見」的事實先生，已將大戰前景揭開於我們之前了，讓見解不同的人們，各選各的道路去走吧！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修正

現代中國經濟的檢討

——一幅半殖民地經濟的透視畫——

一 解答「歷史之謎」

「中國歷史之長，蘊藏之富，遠出許多國家之上，似乎有些人以為這是一塊「神祕的國土」；其實，仔細研究起來，內中沒有一點神祕。中國的領土是全世界面積的一部分，在這塊領土上所發生的一切，當然也與其他各國所發生者大抵相同。肚皮餓了，要找東西吃；年紀老了，要長眠地下；這是無色人種與有色人種所共有的性質，沒有絲毫例外的。有些「國情」論者不明白這一點，常常把中國看成一個「特別區」，總以為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之間有一道「萬里長城」橫阻着；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偏見」。我們必須打破這種「偏見」，才可探討中國經濟的發展，才可在探討

中國經濟發展之中尋出一條鮮明的途徑。」

這是我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途徑一文中劈頭寫的一段話（註一），把它引在這裏作爲本文的發端，無非認定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之一環，就過去的軌跡言，就目前的動態言，就未來的趨勢言，都不能跳出世界經濟的圈外，自立門戶，與世絕緣。

世界經濟的發展，本是循着「歷史的梯子」，從下而上，拾級而升。詳細一點說，即是從原始社會的採集經濟與漁獵經濟，漸漸進到氏族社會的生產經濟（畜牧爲主，農業也有萌芽），漸漸進到封建社會的農業與手工業經濟，漸漸進到大工業的資本主義經濟，最後則進到否定私有制度的社會主義經濟。六合之內，四海之外，祇要有人類棲息的地方，其經濟發展的階段，總逃不掉這個「歷史的梯子」。

（註一）錢亦石，中國經濟發展的途徑（學藝十三卷一期。）

關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其過去的軌跡如何，本有一些爭論，在這裏，沒有篇幅讓我來說明。不過就現階段言，大抵都承認中國經濟正處在從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的過程中。

講到這裏，問題就發生了。「歷史先生」告訴我們：在中國進到封建經濟的時期，西方許多國家依然停滯在原始經濟與氏族經濟的階段。但自十六世紀以來，落後的西方已加足馬力，向資本主義的坦途上奔馳；而開化最早的中國，却仍在封建經濟的迷宮內繞圈子，與資本主義隔絕。一直到十九世紀西方東漸之後，以「外鑠」的原因，才在中國封建經濟這塊處女地上，撒播若干資本主義的種子。這似乎是一個「歷史之謎」，不易被人猜破。換句話說，即中國在海禁未開前何以未發展到資本主義？

對於這個「歷史之謎」的解答，當然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也許有些「國情」論者認為這便是中國歷史的神秘性，這種觀點，我是反對的。此外，有些人或以

爲由於中國沒有自然科學的進步，或以爲由於中國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強迫農民到工廠工作（註二），這都是「倒果爲因」的說法。事實的真相是：先有了資本主義才能引起自然科學的需要與進步，而強有力的政府亦是建立於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所以，中國沒有自然科學或沒有強有力的政府，都不是海禁未開以前資本主義無從發展的原因。

頭腦比較新鮮的人，則又認定中國過去未自動的走上資本主義之路，由於缺乏蒸汽機的發明。（郭沫若是這種意見的代表者）然而蒸汽機並非上帝創造的，它不過是社會的產物而已。不錯，中國固然沒有蒸汽機，可是與蒸汽機類似的機械也會經有過。如舊唐書載有：『李皋……常運心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蓆』。（註三）又宋史敘及洞庭湖中的湖匪使用輪舟時，亦有『以輪

（註二）拉狄克中國歷史之理論分析二七頁。

（註三）舊唐書李皋傳。

激水，其行如飛」等語。(註四)這些都是機械上的新發明，與西方不同之點，就是這些新發明只限於交通工具，未推及到生產工具。至於何以未推及到生產工具？正確的回答，當然不是因為中國過去缺乏像瓦特 (Watt)一類的天才，而是因為中國過去缺乏發明蒸汽機的條件。

「爲什麼中國沒有人發明蒸汽機呢？……我們必須了解的，就是現代的機器可以說是在英國發明的。……近代機器製造所以發明於英國，實有其歷史條件。中國人爲什麼沒有發明機器呢？這與英國以外其他各國所處的情形是一樣的。英國由手工工場進步到近代工業，有沒有什麼特殊原因呢？假如我們展讀技術發展史，就可以見到：企圖進到機器領域來的實有三個國家，首先是意大利……，其次是荷蘭，第三就是英國。在英國才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爲什麼只是在這三個國家中的表現，有超出手工業技術界限的企圖，而其他各國都沒有呢？因爲這三國

(註四)宋史岳飛傳。

都是海上的國家，他們都是靠海上商業及殖民地搶劫爲生的；在這三國之中，是產生大批生產品的；但這些條件，惟英國最好。我們知道：自從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先後把地中海與東方的關係割斷時，意大利的作用就終止了。荷蘭呢？版圖太小，天然物產也太少，實難負擔廣大生產技術的使命，使生產力加緊提高。：英國則不然，版圖很廣，礦產財富用之不絕，而且當手工業發展極盛的時候，英國就插入了東印度。中國是地大物博的，遠在十三世紀時，它就照這三國的方向走了。當時佔據全亞細亞者是蒙古民族，……引起中國商業資本很快的發展，以及工場手工業長足的進步。但蒙古統治一崩壞，……而廣大市場就隨之分散了，中國的商業資本不能在全亞洲大陸之上通商了。……總之：自元朝滅亡之後，中國幼稚資本主義（？）的一個最大的內地市場就消滅了，中國商業只得被封鎖於中國本國以內而與其他外界的市場隔絕了。自此以後，中國手工業的工場差不多就完全停在十九世紀中葉的發展的水平線上，沒有一點進步的情形了。

(註五) 如果把這段冗長的說明變為簡單的詞句，就是：英國有廣大的國外市場，所以發明了蒸汽機，完成了工業革命。中國自元朝以後，與國外市場隔絕，所以沒有引起發明蒸汽機的刺激力，就是手工業的工場也停頓起來。這無異說，國外市場即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

誠然，國外市場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但這種條件是屬於外部的。從鷄蛋孵化出小鷄，固然需要適宜的溫度與空氣，可是最重要的條件還是在內部，還是在蛋殼內必須具備「胚細胞」(Germ-cell)，用前面荷蘭與英國的例子來解釋，就非常明白。這兩個國家都有國外市場，然一則「版圖太小」，一則「版圖很廣」；一則「天然物產太少」，一則「礦物財富之不絕」，結果，工業革命祇見於英國，不就是內部條件重於外部條件的證明嗎？

現在要更進一步來研究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條件是什麼？

(註五) 同註二；二五—二七頁。

資本論上會說過：「資本主義生產是以大量資本與勞動力存於商品生產者手中爲前提的」。(註六)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有兩個不可缺的內部條件：一是大量資本；一是勞動力。在這裏，也沒有篇幅讓我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原始積累(Primary accumulation)來作詳細的剖析，我只鄭重的指明一點，就是：所謂大量資本與勞動力，不過是同一歷史過程中之產物而已，質言之，不過是原始積累之產物而已。這不是我個人臆測之詞，實有下面一段話爲根據：

「爲資本主義制度掃除障礙的過程，不過是勞動者與勞動工具所有權分離的過程而已；即是說，這種過程，一方面是轉變社會的生活資料與生產工具爲資本，別一方面是轉變實際生產者爲工錢勞動者。所謂原始積累，無非是生產者與生產工具分離之歷史的過程。」(註七)

(註六)資本論一卷二十四章。

(註七)資本論英譯本一卷七九一—七九二頁。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我們要把問題回到中國方面來。中國是否有大量資本與勞動力呢？

關於大量資本方面，中國老早已產生了兩個不同的資本形式——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可是受歷代抑商政策的打擊，談不到大量的積聚；即偶有若干資本投向工業上，如唐代商人之經營採礦冶金業，據說：「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一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似乎是工業的萌芽。而唐德宗居然採擇戶部侍郎韓洄的建議，主張「山澤之利宜歸王者」，把這些採礦冶金業劃歸鹽鐵使主管。於是絕無僅有的幼稚工業便被官僚斷送了。（註八）這些資本既不能用之於工業，祇有爭向土地投資，跌落到封建剝削的泥坑中去。在傳統的抑商政策之下，儘管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有長期的歷史，然終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走向資

（註八）新唐書食貨志。

本主義生產的康莊。

關於勞動力方面，在「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的畸形現象中，亡立錐之地的農民，本是飛鳥般自由的無產者。固然有人以為：「中國土地肥沃，天然條件適宜，使農民雖在殘酷剝削之下，還能維持其水平線下的生活，而不致潛離土地，」（註九）遂斷定中國不具備勞動力這個條件。這種說法，我認為是去事實很遠的。不過話應該這樣講，中國歷史上本有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却沒有購買勞動力的資本與市場，中國各城市大抵仍保持在行會制度掌握之中，而新的工場手工業（如景德鎮的瓷業，南京的綢緞業，宜興的陶業）亦強半生機不遂，以致潛離土地的農民大半無工可做，只犧牲於歷史上週期的風暴——如赤眉與黃巾之類——中，為「真命天子」打天下。這些飛鳥般自由的無產者（勞動力），長在「一治一亂」的螺旋上翻筋斗，無由敲開資本主義生產之門。

（註九）朱其華中國近代社會史解剖二九頁。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發展的兩個內部條件——大量資本與勞動力——在海禁未開以前的中國是不完全的；同時，所謂國外市場——外部條件——亦時通時塞。在這些情形輻湊之下，所以不能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數千年翻來覆去，結果，仍未跳出封建經濟的迷宮。即是說，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碩大之果未隨侵略者的鐵蹄輸入中國以前，這塊神祕似的處女地上，始終沒有國產的資本主義。這就是中國「歷史之謎」，一經猜破，也覺得很平常了。

二 海禁未開前的「廬山面目」

前面講過：中國經濟正處在從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的過程中，這當然是指海禁既開的時期而言。我們與西方隔絕的萬里長城被資本主義國家的砲彈打破以後，不問是東南的海岸，或是西北的岡陵，到處都有帝國主義的鐵騎縱橫馳騁。即就經濟方面而言，正在按着西方資本主義的模型從事改造，已非廬山面

目之舊，這是沒有任何爭議的。如果問及廬山面目是什麼？或者更明白一點說，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中國的經濟形式是什麼？那就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回聲。在這裏，我沒有時間與興趣，把近數年來爭論不清的陳賬，重新結算一次。我只願意從正面提出問題，且徵引一段重要文獻以為說明的論據：

「前資本主義的國民生產方法內部的鞏固與結構，對商業的解體作用所呈的抵抗力，在英國人與印度及中國的通商中表現出來了。印度及中國生產方法的廣大基礎，是由小規模農業及家庭工業的聯合構成的。」（註十）

內容非常明白！「中國生產方法的廣大基礎，是由小規模農業及家庭工業的聯合構成的」，這一句名言，勝似時人數巨冊的論戰。依照這種論據去解釋，應該認定：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中國的經濟形式是建立於小規模農業及家庭工業的聯合之上。

（註十）資本論三卷二十章。

假使中國向來就有完全的統計，我們祇要把百年前關於農業及家庭工業的數字，徵引一二，便比長篇大論的說明更有力得多；無如這一點誰也辦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且從線裝書中搜舉數例，以見一斑吧！

滿清以游牧民族入主中華，仍繼承我國歷代的重農政策。如：

康熙二十九年上諭說：「阜民之道，端在重農。」

雍正二年諭各省督撫說：「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厪念民依，重農務本。」又說：「四民以士爲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農民勤勞苦作，以供田賦，養妻子，其敦龐淳朴之行，豈惟工商不逮，亦非不肖士人所能及。」

皇帝這樣重農，即是當時經濟以農業爲基礎之一證。何況重農風氣瀰漫於全社會之中，就是世家巨族亦不能獨異？曾國藩家書內也說過下面一段話：

「……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常可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

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兩

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工……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改道光初年之規模。……」（註十）

一）

像曾國藩這樣的人家，當時仍靠作田爲業，除了承認農業爲經濟的基礎以外，沒有旁的說明。假使到現在，無論是誰都要放棄作田而注重工商了。

其次，關於家庭工業，在百年前亦是很普遍的。所謂「男耕女織」，爲我國農村生產的信條者是也。曾國藩家書中常有如下的詞句：

「……自七月以來，吾得聞家中事，有數件可爲欣慰者……家中婦女大小，皆紡紗織布，聞已成六七機。……」

「……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織，以事縫紉。……」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厨作爨，勤於紡織，不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

（註十一）曾國藩致澄弟書。

何以念念不忘紡織呢？不待言，當時紡織實為家庭工業的主要部門。如果以這些證據略嫌單調，不妨再從馬札亞爾所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一書中摘出下面一段材料：

「伊頓夫關於十九世紀中葉的情況，曾說過：「中國北部的婦女是從事棉紗或麻布的」，「在商業上棉織品及絲織品是最多的」，「此外還有大批的織品——如府綢——從中國走入蒙古，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去」。中國紡織品之貿易，亦走過高麗，那裏有「大批的中國紡織及絲織品」送過去。總之：中國製造的紡織品之對外對內貿易，在十九世紀中葉已充分的發達了。」（註十二）

以上還只就小規模農業與家庭工業分開說明的，當然我們不能以此為滿足，必須鄭重指出兩者聯合構成的關係及這種生產方法的內容。

前面不是說過「男耕女織」麼？粗看起來，似乎是男子必須在田野耕種，女子則在家庭內從事耕織。可是在事實上，兩者並不是各自為政的；這就是說，女

（註十二）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五五四頁。

子有時在田野參加耕種，而男子在雨天或是農隙的時候，也參加家庭內的紡織。「男有餘粟，女有餘布」，相依爲命，建立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的家庭經濟。這即是封建的生產方法。所以，杜博洛夫斯基 (Dubrovsky) 說：「封建的生產方法，是以農業和家庭工業的聯合爲前提。在此種場合下的農民家庭，因爲不依繫於市場，不依繫於生產的變動，不依繫於立在他的部分以外的社會的歷史運動，而差不多具有完全自給的性質。」（註十三）如果再估計到當時的土地關係，即知道小規模農業與家庭工業的聯合，必與土地私有制度不能分開，即土地佔有者靠榨取直接生產者以生存。或用杜博洛夫斯基的話說：「在此種自然的小農業經濟的生產和家庭工業聯合的制度下，地租是剩餘價值或剩餘勞動的唯一統治及常態的形式，直接生產者被迫着無代價的在他的勞動生存條件的私有者方面，在土地私有

（註十三）杜博洛夫斯基亞細亞生產方式、封建制度、農奴制度、及商業資本之本質問題八一

者方面，去執行工作。」（註十四）照此說來，我們必須承認由小規模農業及家庭工業聯合構成的經濟形式，實具有封建剝削的內容。

再從另一方面去看，小規模農業與家庭工業聯合構成的經濟形式，對於西方資本主義侵入之初所表現的抵抗力，是非常可驚的。我無須再引資本論的話，說明「農業與製造業的直接結合能節省很多的时间與勞動，因而對於大工業的生產物，予以一種最頑強的抵抗」。（註十五）在這裏，祇請讀者注意下列兩種材料便澈底清楚了：

「在太平暴動時，有泰晤士報（Times）通信員某氏，曾在中國遊歷。他指出過：外國的紡織品很難排擠中國的。他說把歐洲的棉布用中國的洗衣法在兩塊石頭中搓起來，經不得幾個月的洗，而中國的粗布却可洗用六年。到了二十世紀初葉，英國人才懂得幾萬萬中國人並不穿他們的布。在

（註十四）同註十三。

（註十五）資本論三卷二十章。

一九〇一年，海關監督翁文瀛道：「據我看來，我們商業最大的教訓與經驗，是我們蘭開夏的廉價布正的銷路不好，它不能在最貧苦的居民中奪得一塊地盤。……我們應該根據事實來設想，就是想幾萬萬中國人穿用西歐的棉布，真是做夢！」（註十六）

『在一九〇七年，薩真特 (Sargent) 於其所著的中英商務與外交 (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一書中說：我們的主要消費者，是城市內的服務員與商店老闆，而完全不是廣大的農業人口，農業人口只是我們的競爭者，因為家庭的紡織工業成了中國農村經濟的主要部分。』（註十七）

看啊！我們過去的家庭工業，是英國人最討厭的。現在雖說情形兩樣，回憶起來有些傷心，然從這些材料中却可窺見海禁未開前中國經濟的廬山面目。

也許有人以為我沒有提及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吧！我應該在此聲明一句，

（註十六）同註十二。

（註十七）沙發諾夫中國社會發展史四九四頁。

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在中國本有相當的發展；不過，它倆不能創立自己的生產方法，儘管在某種限度內可以腐蝕自然經濟，但沒有破壞封建制度，且在原有制度的基礎上加強了封建的剝削。也許可以這樣說：在封建制度的肚子內，並不妨害這兩個寄生蟲——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生存。因此，我不相信中國有什麼獨立的商業資本時代，也不相信「滿清時代政權的中心人物就是高利貸者」。（註十八）所以，在本節內未提及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是沒有什麼原則上之錯誤的。

三 西力東漸以後所起的變化

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即西力東漸以後，在經濟領域內，起了空前未有的變化；變化的結果，在陳舊的亞細亞式的搖籃裏，出現了一個嬰兒；有些人賜

（註十八）同上；四七六頁。

這個嬰兒以佳名，稱爲「外鑠」的資本主義。

本來，「外鑠」二字在某種範圍內我也認爲可用。不過，「外鑠」給予某物體的影響如何，是視某物體的內部構造如何爲轉移的。一星之火落在棉花堆上可以引起燎原，落在止水池內則又平安無恙，這是三尺童子共喻的真理。同樣，資本主義的脂粉塗在眉目清秀的小姐身上則異常「摩登」，而塗在面孔可怕的夜叉身上則益形醜惡。因此，要估計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發生怎樣的變化，換言之，是摩登化呢？還是醜惡化呢？那就不可不視中國經濟的廬山面目如何來決定。有些人不懂得這一點，只記得什麼「人體的解剖是對於猿體解剖的鎖鑰」一句話，便「認定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及近代中國經濟史，應當從資本主義的生長性上去把握問題，不應當從封建經濟的沒落性上去把握問題。只有認識了資本主義的生長性，纔能認識封建經濟的沒落性，纔能了解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及今日中國經濟的性質」。（註十九）這種說法與我的意見剛剛相反。

誠然，自西力東漸以後，這個亞細亞式的國家放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模型裏，似乎也一天天時髦起來。奇技淫巧的洋貨輸進中國的市場，從海口到內地，從城市到鄉村，像瀉地水銀一樣，無孔不入；儘管我們的經濟結構有可驚的抵抗力，然而「繩鋸木斷，水滴石穿」，久而久之，我國小規模農業與家庭工業兩者聯合的紐帶畢竟被斬斷了！洋油燈便代替了青油燈；在兩塊石頭中間搓起來可洗用六年的土布，終於被開夏的廉價布疋奪去了地盤。農業與家庭工業本是同根並蒂的「姊妹花」，既有一朵為暴風雨所摧殘，則另一朵勢必隨之凋謝，於是自給自足的農業也寢寢不振了！洋米，洋麥，洋棉花……也陸續成了「不速之客」到中國來觀光。這無疑的是中國人學時髦的代價啊！

不僅如此。西方先進各國，從商品輸出發展到資本輸出以後，無孔可穿的洋錢也流進中國了。它們不遠萬里而來，當然不是有什麼博施濟衆的好意，而是來

（註十九）施復亮中國現代經濟史自序。

執行「吸血鬼」的任務。吸血的方式是很多的，鐵路、礦山、銀行、工廠，相繼而起，操縱了中國全部的經濟命脈。

「自從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失敗以來，列強帝國主義者，除了奪取港灣和劃定勢力範圍外，競爭得最劇烈的是關於鐵路和礦山的利權。各帝國主義國家爲銷售商品，採集材料，擴充勢力範圍及輸出資本的必要，爭欲在中國敷設鐵路。他們或強迫中國政府允許他們在中國境內建築鐵路，如俄國之於東清鐵路，法國之於滇越鐵路；或強迫中國政府借款興築鐵路，如京奉（北甯），京漢（平漢），津浦等鐵路是。中國現存的大部分鐵路，都是帝國主義者爲自己的需要，直接築成或強迫中國築成的。各帝國主義國家取得鐵路建築權，往往同時便取得鐵路沿線礦山的採掘權。別方面，亦有因爲取得礦山採掘權而要求礦山附近鐵路的建築權的。自然亦有一部分礦山採掘權與鐵路建築權沒有關係。總之：投資鐵路和礦山是中日戰爭以後十餘年間各帝國主義國家對華侵略的主要目標，各帝國主義國

家，爲實行這種投資，乃紛紛在中國設立各種投資機關。各國在華的代表的銀行，除英國早已成立外，其餘都是在中日戰爭不久以後爲投資的必要而成立的。同時，中日戰爭的結果，外人取得在華設立工廠的權利；因之各國便先後在中國設立各種工廠，最先着手的是紗廠。此外，各帝國主義國家，還有以政治的目標借款給中國，以擴張自己的政治勢力。而義和團事件的賠款四萬五千萬兩，亦足以增加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勢力。從此，列強帝國主義的勢力，便侵入於中國的全部經濟生活。中國的經濟結構，亦漸漸發生根本的變化而起革命的作用。到了現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一方面是日益資本主義化，同時也就日益隸屬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註二十)

如上所述，中國百年來——尤其是近四十年來的變化是很大的。假使說，秦漢以後兩千餘年翻來覆去的一治一亂之局是進一步退兩步的徘徊，那麼，近幾十

(註二十)同上；一二——一四頁。

年來的絕塵而奔便等於一日千里的飛躍了。到現在，中國的農村已變為洋貨傾銷的市場，強迫「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的農民，出其終歲勞苦所得的農產品與高昂的洋貨作不等價的交換。就是幽人逸士所棲的林泉，也成為世界市場的一角，多多少少要受倫敦、紐約或東京的支配，再沒有什麼「世外桃源」了。簡單一句話，農民祇是商品購買者，祇是原料栽培者，其命運完全握在外國人的手中。另一方面，隨着帝國主義在華鐵路建築權的擴大，所謂國有鐵路、大部分仍是借款築成的）也敷設起來了。隨着帝國主義在華礦山採掘權的取得，從前用土法開採的礦山也逐漸改良了。隨着麥加利銀行（一八五七年）、匯豐銀行（一八六七年）、在華分行的成立，代替山西票號與錢莊的新金融機關也蜂擁而起了。隨着各通商口岸外國工廠的開辦（一八九五年以後），中國的新式企業也日趨發達了。此外，如不畏風波的輪船，翱翔天空的飛機，以及什麼殺人不見血的電椅，都尾隨「洋大人」之後輸到落後的中國來。甚至連那些「名不見於經傳」的勞資衝突與經濟危機，

也陸續在東方出現。真的，古色古香的中國確實一天天時髦起來。所有這些新花樣，都是百年以前的中國人未曾夢見過的，無以名之，名之曰：「外鏢」的資本主義。

不待言，「外鏢」的資本主義是東亞病夫與西方美人「戀愛」的結晶，——不，與其說是「戀愛」，倒不如說是西方美人垂涎東亞病夫的百萬家私，佈置一種迷魂陣，誘惑他乃至逼迫他自投羅網吧！東亞病夫與西方美人結婚以後，固然產生了一個睡在搖籃裏的嬰兒（外鏢的資本主義），可是與這個嬰兒對立的，還有西方美人與其前夫結婚所生的兒子——「拖油瓶」。她把「拖油瓶」帶到中國來，給搖籃裏的嬰兒以強大的壓迫。如果說搖籃裏的嬰兒是民族資本，那麼，所謂「拖油瓶」便是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勢力了。

為比較民族資本與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勢力起見，我想以華商銀行與外商銀行為例，摘引一些統計數字以資說明。

我國自一八九七年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成立以後，新式銀行接踵而起。到一九二五年，全國銀行共有一四一家，到一九三二年增至一八五家。就實收資本說，在一九一二年不過三千餘萬元，到一九二五年增至一萬六千萬元，到一九三二年已達三萬萬元以上，二十年內增加十倍，不可謂不快。據一九三二年的調查，一四九家華商銀行的實收資本如下表：（註二十一）

資本等級	行數	百分比
二十萬元以下	三一	二〇·八一
五十萬元以下	二八	一八·七九
百萬元以下	三七	二四·八四
三百萬元以下	二七	一八·〇九
五百萬元以下	一一	七·三九

（註二十一）李紫翔中國金融的過去與今後（新中華二卷一期。）

一千萬元以下	一〇	六·七二
二千五百萬元以下	五	三·三六
總計	一四九	一〇〇·〇〇

依照上表，資本在千萬以下的占九六%，在百萬以下的又占六四%，脆弱已可想見。更就存款說，如二十五家銀行在一九二三年的存款總額不過五五一百萬元，到一九三二年增至一、七七一百萬元，十年之間增加三倍以上，（註二十二）也可說是銀行業務上的進步。可是把這些數字拿去與外商銀行比較，那就有小巫大巫之別了。

「帝國主義者在華銀行勢力最大的為英、日、美三國。一九二五年二十四個主要外商銀行的統計，共計已繳資本六四七百萬美元，公積金四七一百萬美元，存款四、九四七百萬美元，鈔票八一二百萬美元，資產六、八七八百萬美元。外商銀行既據

（註二十二） 鄂荊洲我國銀行之資本比率（新中華二卷八期。）

有如此巨大的資力，復攫取保管中國關鹽稅收，支配中國交通事業，壟斷中國國際貿易，決定外匯價格，發行鈔票，吸收存款等特權。據估計，外商銀行在中國吸收的存款就有二十萬萬元之多；……這些資金更助長它們操縱中國金融與財政的勢力。」（註二十三）

再就匯豐銀行——英國對華實行經濟侵略的中心機關——為例，其壓倒一切的情形，尤顯而易見。茲引下表為證：（單位港洋——註二十四）

年次	實收資本	公積金	存款	鈔票發行額	純益	資本總額
一九一七	15,000,000	33,500,000	33,500,000	2,900,000	6,650,000	418,900,000
一九一九	15,000,000	27,150,000	33,700,000	3,500,000	7,360,000	435,700,000
一九二二	10,000,000	23,800,000	50,300,000	4,800,000	3,900,000	453,700,000

（註二十三）同註二十一。

（註二十四）同註十九；三一一—二五一頁。

一九二七	10,000,000	七,五七九,九三三	五五七,六六七,〇九〇	五三,六四〇,九六四	一四,三五九,三三八	七,七四九,一五〇
一九二八	10,000,000	七,三三一,四四三	五四七,九九九,六六五	四八,三六八,四六一	一三,四〇〇,〇六一	七,〇八〇,四七三
一九二九	10,000,000	八九,〇〇〇,〇〇〇	六五四,七六六,二七七	六四,八五四,七五〇	一四,一四八,二〇九	八五二,八三五,四七七
一九三〇	10,000,000	二八,三五七,一四一	九一五,三三九,一三三	一〇八,一〇四,四九〇	二〇,七六六,七〇一	一,三二四,六八一,九六六

顯而易見的，從一九一七—三〇年，公積金約增四倍，存款約增三倍，鈔票發行額計增四倍以上，純益增到三倍，資產總額也約增三倍，而實收資本不過增五百萬元而已。就一九三〇年的數字講：匯豐一家的公積金比二十六家主要華商銀行的公積金（三四、〇九九、三八〇元）多三倍，其實收資本與公積金的總數已超過二十六家主要華商銀行的總資本（一四〇、三〇四、六八五元），其純益且多於二十六家主要華商銀行的總純益，其公積金竟超過實收資本五倍以上，每年純益常占實收資本額的六〇%，甚至與實收資本額相等，當然所賺的是「咱們貴國」的錢。有許多高等華人願意把自己的存款送到匯豐去，華商銀行亦是如此。在事實上，

匯豐已執了中國銀行界的牛耳，簡直等於中國的中央銀行。

看了這些例證，便知道：民族資本與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勢力的優劣；便知道：睡在搖籃裏的嬰兒，在「拖油瓶」壓迫之下，是不能健全發展的。同時，在西力東漸以後，中國是摩登化還是醜惡化？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 喧賓奪主的工業

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骨幹，各國工業化的程度如何，即是各國資本主義發展與否的測量器。中國工業化的程度如何呢？不妨從美國駐華商業代辦阿爾諾德（Arnold）所製定的比較表（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前的數字）中先透視出一個輪廓（註二十五）：

產煤（噸）	美國（單位千）	中國（單位千）	中國對於美 國之百分比
	五八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四·一

（註二十五）引自馬札亞爾《中國經濟大綱關於中國的基本材料》。

鋼鐵(百分比) 九九·〇 〇·六 〇·六
 電力(啓羅瓦特) 一四、〇〇〇 二五〇 一·八
 汽車 二二、〇〇〇 二二 〇·一
 紡機數 六五〇 二九 四·一
 錠數 三七、〇〇〇 三、五〇〇 八·六

一望而知中國工業是悲慘的落後，如就各部門互相比較，則基本工業更其落後。固然，上面數字有點陳舊，近年頗見增加，如錠數到一九三二年已超過五百萬枚，即其一例。不過，中國情形有些蹊蹺，遇到統計數字的增長，在別國本視為工業進步的指標，在我國却只能看做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深度。

茲從基本工業說起。

一八九八年中，德、膠澳租界條約規定：「於所開各鐵路附近之處，相距三十哩內……允許德商開挖煤斤等項，及須辦工程各事，亦可德、華合辦合股開

探』，這是帝國主義奪取礦山採掘權的根據。從此時起，各國援例要求，以奪取中國地下富源為目標，辛丑條約締結後，尤為激烈，或獨占，或合辦，把我國重要礦山囊刮殆盡；就是英相山黎斯伯萊（Lord Salisbury）亦不得不認為是列強「礦權之戰」。所以，我國現時的煤鐵工業大抵落在外人手中，喧賓奪主，早成經常現象。

就煤工業說，我國煤的儲量約有二千萬噸以上，就中有六十萬噸以上已非我有。現在每年二千六、七百萬噸煤產額中，日之撫順占七百八、九十萬噸，英之開灤占五百四十萬噸，已達總額之半。而且發展的趨勢，華礦產額一天天減少，外礦產額一天天增加，例如日資煤礦所占產額之百分數，一九一八年不過二〇%，一九二八年增至三三，%一九三二年更增至三八%左右。（註二十六）

就鐵工業說，我國鐵的儲量，從前地質調查所估計為九萬五千萬噸，最近估

（註二十六）李業勳中國基本工業與帝國主義（新中華一卷二十期。）

計則爲一、〇〇〇、一九四、二九二噸，本占世界第九位。自東北四省喪失以後，鐵的儲量損失過半，現時中國本部只剩二三六、八五四、二九二噸了。每年鐵砂產額，二十年來增加一倍，截至一九三一年止，計有二、四四七、〇二〇噸。就中產於東北者幾達半數，而產於長江流域者雖與東北產額相等，亦幾全部輸往日本（受條約拘束，跌價售賣。）至於各鐵廠製鐵能力，從前每年約計一百萬噸，但東北本溪湖與鞍山兩廠（每年製鐵四十二萬六千噸）已被日本奪去，其他各廠多歸停頓，現時祇揚子鐵廠年產萬噸左右，再加上土法所製生鐵（據說有十二萬噸上下），亦不過十餘萬噸耳。每年反靠輸入昂貴生鐵以供用，寧不可笑！（註二十七）

基本工業的數字，簡直把我國資本主義的不幸描繪出來了！

其次，說到輕工業，尤其是紡織業，差不多是民族工業中唯一無二的鮮花，現在且就這朵鮮花觀察一下。

（註二十七）黃金濤中國鋼鐵工業的現狀及其自給計畫（新中華二卷二期。）

一八九五年中日馬關條約規定：「凡日本臣民於中國通商口岸，得隨時從事各種製造工業」，即是各帝國主義有權在中國內地開辦工廠的根據；這麼一來，我國即有關稅自主的武器也無法保護國內市場，以致我國紡織業常處在外商紗廠壓迫之中。「一着走錯，滿盤皆輸」，因此，就決定了我國輕工業的總命運。

中國紡織業在馬關條約簽訂以前，不過六廠，錠數只有十八萬三千枚，可說是太倉一粟。隨着外國綿織品的輸入，注定了我國家工業的失敗，於是新式紡織業便有發展的地盤。到一九一一年紗廠擴張到三十二所，錠數增加到八十三萬一千餘枚，十五年間幾達五倍。尤其是歐戰爆發以後，可說是我國紡織業的黃金時期，從一九一六到一九二二年，中外資本家新設的紗廠達六七十所，錠數增加二百餘萬枚，極空前未有的盛況。一九二二年九月以後，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一時陷於停頓。以後漸次整理，從一九二八年起，又一天天向上，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止，都是發展的（錠數增加到五百萬枚）。只在一九三三年才有幾分逆轉。

(錠數減少十六萬九千枚) (註二十八)

如果認為這是我國紡織業的幸運，或者斷定：民族工業有一帆風順的前途，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上述數字是包括華商與外商兩種紡織業而言的。假使不分皂白，一視同仁，豈非把「拖油瓶」看成親生子麼？

原來，在華外商的紡織業，以日本最占優勢，英國次之，它們與華商紡織業競爭，近年亦有喧賓奪主之趨勢。欲知其詳，請看下表：(註二十九)

華、日、英紗線錠數比較表(單位千錠)

	華		日		英	
	錠數	百分比	錠數	百分比	錠數	百分比
一九二八	二、一八二	五七·〇	一、五一五	三九·〇	一五三	四·〇
一九二九	二、三八六	五七·〇	一、六五二	三九·〇	一六三	四·〇

(註二十八)同註十九；一四八一—一五三頁。

(註二十九)一年來中國經濟概況四四頁(申報月刊社叢書第五種)。

華、日、英布機台數比較表

	華		日		英	
	台數	百分比	台數	百分比	台數	百分比
一九三〇	二、四九九	五六·〇	一、八二一	四〇·〇	一七八	四·〇
一九三一	二、七三〇	五五·七	二、〇〇三	四〇·八	一七一	三·五
一九三二	二、九一〇	五五·六	二、〇九六	四〇·四	一八三	四·〇
一九三三	二、七七三	五五·二	二、〇六三	四二·一	一八三	三·六
一九二八	一六、七八七	五六·七	一〇、八九六	三六·九	一、八九九	六·四
一九二九	—	—	—	—	—	—
一九三〇	一五、九五五	五四·四	一一、四六七	三九·一	一、九〇〇	六·五
一九三一	二〇、五九九	四八·四	一九、三〇六	四五·三	二、六八一	六·三
一九三二	二一、五五九	五〇·四	一八、二八九	四二·八	二、八九一	六·八
一九三三	一九、〇八一	四八·二	一七、五九二	四四·五	二、八九一	七·三

無論就紗線錠說，或就布機說，英商無大變動，華商則江河日下；日商呢？恰恰與華商相反，近數年來是蒸蒸日上；如果回溯到一九一三年，（華商占五二、五%，日商占一一、五%，英商占二一、〇%）則日商的發展尤顯而易見，一方面壓倒英商，另一方面又將壓倒華商，異軍突起，彷彿中國紡織業的霸主，非日本人莫屬。

爲什麼如此？一般說來，日商有雄厚的資本，有優良的技術，有精密而嚴厲的管理方法。同時，在中國又有領事裁判權作護符，有租界與租借地作根據，換言之，即是有國家權力作後盾，予以保護與獎勵。這些條件都是華商求之不得的。何況在國內封建勢力割據的情形下面，民族工業受各種重稅的打擊，那能與日商相競呢？

然而日商的優勢並不止此。讓我再列一表以資比較吧：（註三十）

（註三十）同註十九；一六一——一七〇頁。

	華商紗廠	日商紗廠	英商紗廠	總數
廠數	八二	四五	三	一三〇
資本(元)	一三九,四〇〇,八〇〇	三〇六,九三三,四八八	八,三六〇,〇〇〇	三五六,五三四,二八八
錠數	二,四四九,三五四	一,八二二,二八〇	一七,三三八	四,四九七,九〇二
織機數	一七,〇八六	一五,〇八二	二,四八〇	三三,五六〇
勞動者數	一六四,二七五	七七,七九二	一三,一八九	二五五,二六一
用花量(担)	五,三〇一,九九九	三,一九一,七六九	三四五,九三二	八,八三五,六九〇
產紗量(包)	一,四八〇,九一五	八三三,四三七	七六,三二五	二,三九〇,六七一
產布量(疋)	六,八四四,〇九一	七,五八七,七六七	一,七三七,九六六	一六,二一七,八四四

上表是以一九三〇年的統計為根據的。從錠數、織機數、用花量、產紗量來看，華商紗廠本多於日商紗廠（英商紗廠更少。）不過，八十二個華商紗廠中，有一個已停工，四個未開工，其他四個有外資關係，除去這九個，只剩下七十三個，

實際運轉的錠數還不及全體錠數之半。再就產紗量言，華商紗廠多屬粗紗，所以產量當然要多些，用花量也是如此。假使更從別一方面來看，即是說從廠數、資本額、勞動者數、產布量來看，則日商紗廠便遠勝於華商紗廠了。第一、四十五個日商紗廠只屬於十六個公司，而八十二個華商紗廠却屬於六十四個公司，可見日商紗廠資本之集中。第二、日商廠數與錠數雖較少，然資本却多些，可見日商紗廠資本之雄厚。第三、日商紗廠勞動者數不及華商紗廠二分之一，而產紗量的相對數字與產布量的絕對數字都多於華商紗廠，可見日商紗廠生產力之強大。日商紗廠具備這些特點，宜其在中國紡織業的領域內，南面稱尊啊！

民族工業的鮮花——紡織業——既是這樣，其他繅絲業、捲烟業等等……更不必說了。在鐵般的事實面前，就是中國銀行報告的編製者也不能不忍痛的說：『以全般工業論，二十二年度（一九三三）可稱工業界困苦時期之開始。』（註三十一）

（註三十一）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中國銀行報告四〇頁。

不待言，以後是困苦更多的。倘若還有人把紡織業看成我民族工業的鮮花，那麼，我要請他認識這朵鮮花已經開始凋謝，或者不久將被狂童搗碎呢！

五 焦頭爛額的農村

我國工業——不管是基本工業或是輕工業——映出這樣一幅悲慘的畫圖，本是大家感覺不快的事。但有些慣作退一步想的中國人每每自慰自解的說：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在城市工業上雖鑄成喧賓奪主的大錯，可是我們還有農業方面的「無盡藏」，於是「到農村去」的呼聲便應時而起。

城市與農村之間果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麼？我在這裏，不想加以解釋，祇請那些夢想田園生活的「隱君子」睜開眼睛看看農村的真相。

無可掩飾的，中國農村是破產了！不僅與農村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的人深刻的感受到，就是住在城市大洋樓上靠「剪利息券」過活的人也於日常報章上領略一

二。關於農村破產的姿態，我在中國農村的過去與今後一文中曾指出五個特點：第一是耕地面積逐漸縮小；第二是自耕農減少，佃農增加；第三是農產品價格跌落；第四是農村金融枯竭；第五是農民離開故鄉，向外逃亡；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註三十二）同時，我們應該認識這些事實，不是暫時的，也不是零碎的，而是發生了若干年，蔓延了若干省，成爲一種不易挽救的頹勢。一直到現在——儘管「農村復興」之聲高唱入雲，儘管延聘外籍專家參加合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並未把農村破產的狂流稍爲減殺一下。

在農村裏掙扎的農民，不僅是生產者，並且是消費者，他們在生產上既受打擊，自然無腰包可花來購買消費品，這就是說，在農村破產的局面下，不可避免的要縮小城市工業的市場。農村的命運與城市的命運原是休戚相關的。農村中的「火災」不熄，民族工業的鮮花也不能單獨繁榮。

（註三十二）錢亦石中國農村的過去與今後（新中華二卷一期。）

到現在，雖說還不免有人未看透農村破產的嚴重性，或者別有用心，「運用輕鬆的筆調，把水深火熱的中國描寫得與太平盛世相去無幾」；（註三十三）然而事實總是事實。正因為事實太多，隨在可見，所以我不打算再引大衆周知的材料與枯燥無味的統計來填本文的篇幅；祇想就觀察所得，把農村破產的原因——或者稱爲農村問題的癥結——加以扼要的說明。

我在前節裏，曾鄭重指出過：中國工業所以不振之故，是由於喧賓奪主，即是說，帝國主義是我國民族工業的敵人，這是合於事實的。說到農村問題就不像這樣簡單了。固然，帝國主義的鐵網籠罩了全中國，我國農村的一切也逃不出帝國主義的巴掌心；正如我在前面所說：『農民祇是商品購買者，祇是原料栽培者，其命運完全握在外國人的手中。』可是，我國農村內部的複雜，遠過於紅樓夢裏的大觀園，不僅劉姥姥撞進去了不辨途徑；就是西歐著名的「中國通」如馬

（註三十三）周憲文讀了中行二十二年度營業報告以後（新中華二卷九期。）

扎亞爾等之流，有時也被迷住，以致說出「亞細亞式生產方法之殘餘，幾乎佈滿了全國」的囁語；似乎我國農村比莫爾根（Morgan）所研究的孫內加（Seneca）部落還難了解。一般說來，靠我國農村生活的人，除帝國主義這個「吸血鬼」外，有軍閥、地主、貪官污吏、商業資本家、高利貸者，……所有這些各種各色的寄生蟲，都以耕種土地的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為其剝削的對象。因此，要了解農村問題，就必須從分析土地問題入手。

關於土地問題的材料，可靠者少。據陳翰笙先生的調查與研究，則以為：「農村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窮苦農民都很迫切的需要土地耕種。中國的經濟學者以為自耕農是自給自足的，其實，這是遠於事實的見解。在黃河與白河兩流域間，自耕農很占優勢，然而大多數和貧農一樣，所有土地不足耕種。……杭州、平湖很多大地主，以百分之三的人口，而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無錫百分之六十九的人家都是貧農與僱農，占有土地僅為百分之一四·二。……南陽百分之

六十五的人口都是貧農，他們所有的耕地僅當全耕地五分之一。……廣東百分之七十四的貧苦農家占有耕地不及百分之一，同時，百分之二的人家却占有耕地二分之一以上。」（註三十四）這些簡單明白的數字，無異把我國土地集中的祕密宣布出來。沒有土地的農民要耕種土地，不得不向地主繳納百分之五〇——八〇的地租。這種地租無論是現物形式或貨幣形式，至少也等於全部的剩餘價值，甚至佃農一部分的工資亦包括在內了。地租剝削及全部的剩餘價值，即是說，農民不能「擴大再生產」；地租剝削及一部分的工資，即是說，農民連「簡單再生產」也無法維持了。在百分之五〇——八〇的地租制度之下，農民還有改良技術的可能麼？農村還有欣欣向榮的希望麼？現在的佃租制度，或正確一點說，現在的土

地制度，確是封建時代的殘壘，近已變成農村經濟發展的制動機了。

何況農民的催命符多着呢！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壟斷獨占的商業利潤，屁

（註三十四）陳翰笙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中國經濟一卷四、五期。）

股大過頭的高利貸息錢，以及貪官污吏的敲詐，……無不打在農民身上。真的，農民的血液，已在封建制度的火坑內烤乾了，現在只剩下幾根骨頭包在焦枯的皮膚之內。再加上水災、旱災、蝗災、豐災……的襲擊，不得死所的農民更無處逃生。到城市做工嗎？被失業的狂潮打回來了！於是純良者坐以待斃，狡黠者挺而走險。但在飢火內燒的情形之下，坐以待斃者究屬少數，於是社會上亂子就越釀越多，越鬧越大。

以上對於農村問題的癥結，還只說到一方面。如果認為這一方面是封建勢力的尖刀，那麼，另一方面就是帝國主義的毒氣了。外國資本對於農村經濟的直接影響，據馬扎亞爾的研究，計有下面十四項：（註三十五）

「一、外國資本的輸入，引起了罌粟（鴉片）栽種的盛行。

二、外國資本給了絲業發展以最有力的推動。外國競爭的結果，引起了中國絲業之急劇的危

（註三十五）馬扎亞爾中國經濟大綱三一——三三頁。

機。

三、外國資本幫助了中國種茶的發展，但在錫蘭、爪哇、日本、印度大規模的茶種植的發展，却引起了種茶的衰落與急劇的危機。

四、外國生產品的輸入，破壞了或引起許多栽種的衰落——例如印度藍及其他染料植物，甘蔗的衰落。……

五、對外貿易及農村經濟生產物輸出的增進，引起了許多農作物之迅速的擴大，尤其是油子——滿洲的大豆，河南的胡麻，山東的落花生。……

六、外國工業的發展，幫助了內部市場的發展。……這種情形推進了農業生產的地方化和專門化，接着便影響了內部市場的擴充。鐵道的敷設，是殖民地化之最有力的因子。

七、農民家庭工業與農村經濟的分立，傷害了或破壞了農民的紡織，轉變農民家庭工業的各部門為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以及建立新的家庭工業部門，是外國資本深入的重要結果之一。

八、以緊縛着中國的戰爭，資助軍餉，國際借款，關稅攫取……為媒介，外國資本便助長了附

加稅的增加，並將自然品的實稅轉變為貨幣的捐稅。

九、在農村經濟工具的、灌溉工具的、礦質肥料的、應用於改良種子和其他農事的以及比較時的絲業的方法的輸入意義上，外國資本的影響非常微弱。

十、外國工廠消化一定量的勞動力。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僑民，在固定的或臨時的工作上，同樣在各省鄉村生活中有莫大的影響。

十一、帝國主義的影響，引起了中國金融幣制的崩壞，銀價的跌落，無任何保證的紙幣的盛行，及其本身不斷再生產之變態的過程。

十二、以低度資本有機構成的中國農村經濟與以高度資本有機構成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交換，是不等價的交換，因而引起中國農村經濟之巨大的經濟和農事的虧折。

十三、帝國主義鼓勵軍閥戰爭和內戰，并由戰爭連帶的引起了破壞和損失。

十四、帝國主義與農民的敵人結成政治聯盟。……帝國主義擁護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官吏、紳士、買辦以反對農民」。

這是農村問題的癥結之另一方面。於是農村中唯一的生產者——農民便陷於封建勢力的尖刀與帝國主義的毒氣兩面夾攻之中了！

總括起來說：帝國主義侵入我國以後，逼迫農民放棄其家庭工業，變成商品購買者；同時，又誘惑農民出售原料，變成原料栽培者；這即是說，把我國農村捲入世界市場之中。在某種範圍內本可推進我國農村走上資本主義的旅途。然而，在封建制度重重壓迫下的農村，要想完成資本主義化亦大非易事，至少非打破封建制度的藩籬不可。果真如此，則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隨之喪失。於是帝國主義的毒氣便與我國封建勢力的尖刀同向農村進攻。橫在農村前面的，決不是資本主義的旅途，而是崩潰與滅亡的死線。近來世界經濟危機給各帝國主義以打擊，它們在無路可走之際，仍取「以鄰為壑」的政策，將經濟危機中的損失轉嫁到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這樣一來，我國農村就變成人間地獄了。這是我國農村破產的原因，也是我國農村問題的癥結。目前的焦頭爛額，恐怕只是初交惡運吧！

六 前途的展望——到何處去

我不是預言家，但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仍可預言一二。

各國經濟的發展，有其客觀的規律性，這種客觀的規律性是超越一切的。

「孫行者一個筋斗可打十萬八千里，終跳不出如來的巴掌心」。各國經濟的發展，儘管千變萬化，終不能擺脫客觀的規律性之支配。我在本文第一節裏，不是說過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之一環嗎？不是說過世界經濟的發展，是循着「歷史的梯子」，從下而上，拾級而升嗎？不是說過中國經濟正處在從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嗎？所有這些說法，都是以承認客觀的規律性之存在為前提的。

然而，這是否說，各國經濟的發展都是印版文章，一模一樣，甲國與乙國相同。乙國與丙國相同，其中沒有任何差異呢？也不是如此。我們知道：在事實

上，各國經濟的發展差異是有的，有時差異很大；因為在規律性支配之下，並不排斥變化性。例如說中國經濟正處在從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的過程中，這本是一句正確的話；可是中國到現在，封建經濟已瓦解了，而資本主義經濟，却可望而不可即，大家在青黃不接的過程中，痛苦呻吟。這又是什麼一回事呢？當然不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沒有規律，而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下，起了變化。（自然這種變化沒有超過規律所許可的範圍）規律性與變化性參伍錯綜起來，就決定了今日中國的命運。

中國的特殊環境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資本，本產生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程中，然受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勢力的壓迫，無由健全發展，就造成了喧賓奪主的工業。另一方面，從前自給自足的農民，已被帝國主義牽進世界市場裏去，而與農民敵對的封建勢力，復受帝國主義的扶持，吸髓剝膚，不留餘地，使農村無由資本主義化，就造成了焦頭爛額的農村。

城市與鄉村兩方面的資本主義之路既走不通，從外面而來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壓力，又一天天加重，結果，非「窒息」不可。老實講，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正處在行將「窒息」之中。

果真「窒息」了，不獨全國的生產者大眾要化為殭屍，就是國內的寄生蟲（封建餘孽）與國外的吸血鬼（帝國主義）也同歸於盡，這是千萬使不得的。於是救濟的方案就提出了。在各種各色的方案之中，自然以「國聯對華技術合作」這一計畫為最時髦。據拉西曼的報告：「技術合作之目的，在使中外技術機關協刀合作，同時並鞏固中國發展經濟機關之基礎及權能。」（註三十六）似乎技術合作的碩果完全落到中國方面。倘若真有這回事，真是求之不得。但消息太好了，倒使我們不敢相信。乞兒想中「航空獎券」，頃刻之間變成富人，恐怕人間世沒有這種「奇蹟」吧？與國聯對華技術合作計畫對立的，則有日本外務省獨霸東亞的聲

（註三十六）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

明，即所謂「四一七」聲明，以爲：「在滿洲與上海事變之後，外國所擔任之任何聯合行動，縱出以技術或金融援助之名義，當然含有政治意味；此種性質之擔任，如實施到底勢必發生糾紛，終至釀成爲劃定勢力範圍，共管中國，或瓜分中國等問題之討論。」日本這樣的態度，是否有愛於中國呢？當然不是，它是爲「履行其在東亞之特殊責任」而聲明的。要之：國聯的方案，是想在中國行將「窒息」的危險狀態中，把中國拉出來，走到國際共管的懷抱裏去。日本則恰恰相反，想從國聯手裏把中國奪過來，走到日本獨占的樊籠中去。中國在目前，似乎停留在國際共管與日本獨占的十字路口上，不管走前者或走後者，都使中國跌到殖民地化的深淵，展開殖民地化的前途。

難道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這樣一種悲慘的前途麼？不是！決不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有另一種前途，即自由與獨立的前途。不過就目前言，這種前途有兩大障礙橫阻着：一是帝國主義，一是封建勢力。

要發展工業，要「復興農村」，決定一切的步驟，是奮其全力排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祇有把這兩大障礙掃平，中國經濟才可脫離「窒息」的危險，才可從絕望中孕育蓬勃的生機，才可跳出封建經濟的迷宮向資本主義經濟的坦途上邁進。排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本是發展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從客觀情勢看來，大抵是如此。

講到這裏，似乎又有問題發生了。中國經濟既是世界經濟之一環，那麼，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臨到日薄西山的時候，能夠讓落後的中國單獨建築資本主義的瓊樓玉宇麼？資本主義經濟是以剝剩餘價值為基礎的，在排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過程中，當然以多數被剝削者的力量為骨幹，這些被剝削者既不願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剝削，難道願受資本主義的剝削麼？

這確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我以為：各國經濟的發展，固有其客觀的規律性，但並不是一種機械運動。這即是說，在封建經濟沒落之後，不管時間與空間

怎樣，認為每一個國家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就是機械論者的見解。我國現在努力的目標，本是為資本主義創造有利的環境，假使這種有利的環境一旦實現，也許以空前的速度飛躍，很快的趕上或追過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乾脆些說，就是利用新的環境，走向非資本主義。這就是中國經濟自由與獨立發展的前途。如果我們能夠與西方先進各國同時達到「決勝點」，則過去在封建經濟的迷宮內多繞幾個圈子又算得什麼呢？

或者覺得這是一種「意外」麼？歷史上的「意外」多得很！特引下面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終結：

「歷史的變動是十分可以驚人的，初到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險家，總不會想那樣荒涼的地方可以變成現代的黃金國；在隋唐時代的人們，那裏會想今日日本的軍閥能夠來劫奪東三省，炸燬上海中國地界？十五年以前，因外患、內戰、飢餓、窮困、產業崩潰，而置於絕地的俄國，誰料到目前竟一躍而為世界第二、三位的大工業國，而且成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沒有失業的國家。只有

歷史告訴我們真理，只有歷史增加我們自信，只有歷史指出橫在我們前面一條無限光明的大道！

(註三十七)

一九三四年七月寫於氣溫超過百度以上之日，上海。

(註三十七) 江公懷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將來(東方三十卷一期)。

拉西曼報告書的研究

一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

國聯駐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的報告書，最近在日內瓦與南京同時公布，全書近五萬言，可說是李頓報告書以後的另一「鉅著」，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前者與後者是「姊妹篇」。現在，拉西曼的報告書已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經國聯行政院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通過，足見報告書內的一切分析、計畫、與建議，不僅是技術合作代表個人的意見，並且是國聯技術機關共同的要求。

在這冊報告書公布以後，也如李頓報告書一樣，引起各國政治家以至新聞記者的注意與批評，「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發表了各種不和諧的論調。一般說

來，國聯的後台老闆——英法是願促成拉西曼的意見早日實現的；美國雖非國聯的正式會員，然因我國接受棉麥借款，用以辦理國家建設事業，當然對拉西曼的意見更饒興趣。祇有日本的感覺不同，它以為「拉西曼來華之初，其使命確為技術的，但其後即轉成實際上熱心的政治人員」；（五月十日東京路透電，）甚至懷疑報告書中「含有離間中日關係之政治作用」（五月十一日東京電通電）。很明顯的看出日本的態度與英、法、美是對立的。即當拉西曼的報告書尚未公布之先，日本已有「先發制人」的妙計，在其外務省「四一七」聲明中，曾指出：「在滿洲與上海事變之後，外國所從事之任何聯合行動，縱出以技術或金融援助之名義，當然含有政治意味。此種性質之事業，如實施到底，勢必發生糾紛，終至釀成如劃定勢力範圍，共管中國或瓜分中國等問題之討論。」這即是說，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無異日本的眼中釘。

這些外國人的看法，顯然各有用意。老實講：中國這塊「處女地」，早成了

他們「爭風吃醋」的目標，甚至可以引起他們「決鬥」。其實，他們之中並沒有一个是真愛中國者，不過假獻殷勤以達其「揩油」之目的而已。我們到現在，固然沒有「守身如玉」的自由，但總不應該糊糊塗塗的認「騙子」爲「情人」，再投羅網，以致一朝失足，貽恨終身。所以，我們對西拉曼報告書的看法，當然與外國人不同。

不錯！我國政府代表顧維鈞曾在日內瓦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五月十七日的會議上，發表過一篇演說，對西拉曼的報告書認爲忠實。且謂：「技術合作問題，乃中國以獨立國所應享的不可分讓的權利。中國確信其迅速的建設事業，乃其本國與受經濟厄運的世界所必要，故決計以種種有效的方法，廣續其努力，其最可收效者祇有與國聯技術合作。」（五月十七日日內瓦路透電。）從這些漂亮的「外交辭令」中，可以看出顧維鈞是擁護西拉曼的報告書之人。

然而，有些漂亮的「外交辭令」，儘管在國際會場上博得熱烈的鼓掌，究不

一定與本國「小百姓」的意志相符。這並不是說小百姓們一生出來便不相信所謂「友邦」，但因過去上當太多，彷彿被蛇咬過的人，見了黃鱔也害怕。拉西曼的報告書，是否是中國的「救命金丹」？我們在未澈底明白之前，究不能「囫圇吞棗」。因此，應該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或者更正確一點說，站在「中國小百姓」的立場上，根據客觀的事實，把拉西曼的報告書作一次澈首澈尾的研究。

二 技術合作的任務與範圍

首先要明白拉西曼來華的任務。拉西曼原是國聯祕書處衛生組組長，於一九三三年十月，應中國政府之請求，擔任國聯駐華技術合作代表。所謂「技術合作代表，即爲國聯與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技術連絡員，辦理中國與國聯各該管機關技術上之合作事務」。(見報告書 10 頁以後徵引報告書原文祇記頁數。) 國聯是什麼機關？在這裏無須介紹，我們在實際上，尤其是在「九一八」後東北問題被處理的過程

中，已經認識國聯的面孔。至於全國經濟委員會是國民政府於一九三一年五月決定設立的，「爲計畫並實施全國經濟建設之機關」(P. 16)。凡國家一切經濟建設或發展計畫，其經費由國庫負擔或補助者，須經該會審定。可見全國經濟委員會在我國經濟建設上是籠罩一切的。拉西曼既爲兩者中間的「連絡員」，即是說，有了他，國聯與全國經濟委員會中間的「橋梁」便架起來了。他的具體職務。計有下面四項(P. 4)。

(一) 供給中國關於國聯各技術機關工作情形之報告，並爲使中國經濟建設事業得與國際合作起見，貢獻中國政府如何利用各該機關之方法。

(二) 技術合作代表接到中國政府關於技術合作之請求，應即轉送國聯祕書長，分轉國聯各機關。

(三) 中國政府關於經濟建設工作，如願延用外籍技術專家時，技術合作代表應予以協助。

(四) 技術合作代表應輔助全國經濟委員會，將國聯駐華各技術專家之職務，就地妥爲分圖。

根據這四項，儘管拉西曼的「薪水、旅費、及生活費，由中國政府供給」(P. 2)，可是他並不是我國的「客卿」，明白些說，就是他不受我國政府的支配。豈止不受支配而已，並且以他為「橋梁」，把我國經濟委員會無形中放在國聯支配之下，至少是放在國聯影響之下。拉西曼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角色。

其次，關於技術合作的範圍，是非常廣大的。以拉西曼的報告書為根據，如農業、棉業、絲、水利、公路、衛生、教育……都包括在內。即是說，技術合作不僅涉及國民經濟各部門，並且超越國民經濟的範圍，而伸入到社會文化的領域。讓外人控制我國的經濟建設，固屬有損獨立國的尊嚴；讓外人在教育方面越俎代庖，更無以杜絕文化侵略的「禍水」。現在擬於全國經濟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之下，成立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並在日內瓦設辦事處；至美國應否設辦事處一節，亦正在考慮中(P. 79—80)。把中國教育放在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指導之下，無論從何方面去看，都尋不出適當的理由。這樣幹下去，是我國的物質生活以至

精神生活都逃不出國聯的巴掌心。

何況「技術合作之原則，並不限於全國經濟委員會所補助辦理或直接辦理之事業，即其他部、會所辦技術事業之合作，亦可由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常務委員定其辦法」(P. 93)。這麼一來，技術合作的範圍可以說是「至大無外」了。技術合作代表這樣的「熱心」，一方面使我們「欽佩」；另一方面却又使我們懷疑。

三 關於技術專家問題

誠然，處在我國經濟破產的今日，祇要是頭腦不十分糊塗的人，都知道從事經濟建設，乃我國目前最迫切的工作，都知道實行經濟建設必須借重技術專家。似乎我們與國聯技術合作，也沒有什麼可以非難之處。不過，說到技術專家問題，應該考慮三件事。第一，我國是否有可用的技術專家？第二，借材異國是否人地相宜？第三，假使非倚仗外籍專家不可，是否必須採取與國聯技術合作的形

式？茲依次解答如下：

第一，我國可用的技術專家是有的。在前清時代，京張鐵路（即今平綏路的一段）由本國工程師築成，並且成績不錯，這是大眾皆知的事實。二十年來，由國內外大學出身的技術專家，日多一日，正苦無事可作，投閒置散。這些情形，從拉西曼的報告書中，也可得到證明。他一則曰：「中國各技術專家類皆不務虛譽，努方奉公，辦理各項事業，皆進行不息，以期有成。」再則曰：「彼等（指中國技術專家）有真實之技術知識，其背景半得之於中國，半得之於國外；且對於世界各大國經濟組織之運用，亦嘗悉心研究。故於泰西公衆企業、財政、經濟、實業、農業等應用之道，及外國社會政策，每特爲基礎之哲理，多有異常之心得。此則或爲世人所不及料者。」三則曰：「具有必不可少之專家知識，又能了解其本人之技術需要，且洞悉中國應有之改良或革新方式者，如此人材，在中國並不爲少。除特殊專門之事數種外，此等人物及後起之流輩，在有利形況之下，皆足

應付緊急事變而有餘。』(P. 95-96)

第二，借材異國，人地不大相宜。這一點，用不着我來提出證據，拉西曼自己已自供出來。他說：「查外籍專家在華服務，其工作之效果究屬有限。彼等不但須灼知事實，且須了解事實之真實意義，及其相互間之關係。彼等之在中國，平日所到之處極少；又以不諳言語，鮮能與民衆接觸，隔膜之處，在所難免；又每一事業範圍之內，因各地風俗習尚之不同，益以社會演進中各時期之差別，倘外籍專家僅持其在本國所得之經驗，以應付此複雜而特殊之任務，良非易易。」(P. 93) 外籍專家不適於中國工作，就是技術合作代表也無法掩飾下去。

第三，姑且退一步講，假定我國沒有可用的技術專家，又假定借材異國，無人地不宜之弊。在這種情形下面，我也不主張採取與國聯技術合作的形式。因為吸收個別的外籍專家是一事，與整個的國聯技術機關合作又是一事。前者主權操之於我，是保證中國經濟事業獨立發展的基本條件；後者主權操之於人，喧賓

奪主，流弊所至，將使中國經濟事業成爲國聯的附庸。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有遠大眼光的人，當開步走的時候，就應該懸前愆後，擬定方針。這是我國經濟建設的總路線問題。我們在着手試辦之先，不可不辨別清楚。

四 拉西曼的總路線

就目前的事實講，自拉西曼來華以後，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局面，已經展開。我們應該從他的報告書中，研究我國經濟建設在拉西曼指導之下的總路線。

拉西曼說：「技術合作之目的，在使中外技術機關協力合作；同時，並鞏固中國發展經濟機關之基礎與權能」(P. 98—99)，這是十分冠冕堂皇的話。我們且看他怎樣幹？看他幹了一些什麼？

依照拉西曼的意見，「凡國聯負責派遣之專家，均有其特殊任務」(P. 94)。關於「特殊任務」的內容，並未列舉，使我們無從捉摸。但是，前面講過，小百

姓們過去上當太多，彷彿被蛇咬過的人，見了黃鱧也害怕。我們平素在外交文書中，看到什麼「特殊地位」、「特殊權利」之類的名詞，所得的印象極壞。現在又看到「特殊任務」四字，不免有幾分毛骨悚然！這並不是我個人的心理作用，實有相當材料來證明的。拉西曼在報告書中，指出：「各技術代表當首先與國際技術方面保持必要之聯絡」(P. 92)，又聲明技術合作的實行方法，「以不背國際技術機關之組織為範圍」(P. 93)，顯然把中國利益隸屬於國聯利益之下，從這方面去觀察，則所謂「特殊任務」的內容，可以窺見一斑了。如果以為這是推測之詞，我就再舉如下的真憑實據吧！

(一) 棉業統制委員會是拉西曼來華任職後的第一個產兒，該會第一年試辦期間之工作，「以努力改良原料為初步之準繩」(P. 4)，藉謀棉業原料能夠自給，這一點是對的。拉西曼何以要如此呢？他說：「若中國農民能利用改良棉種，則每年可不必購買外棉，此項財力，可用以購置機器及其他現在不能自製之

物品」(P. 46)。證明拉西曼進行棉業統制的目的，是想節省購買外棉的財力，為外國機器及其他工業品擴大市場。

(二)蠶絲改良委員會是拉西曼來華任職後的另一個產兒，該會辦理改良蠶種以及謀將現有各小單位之絲廠合併，也是對症之藥。不過，拉西曼主張改良蠶絲是別有企圖的。他說：「中國蠶絲之天然利益，較其他各國為大；而絲業之發展，向予農村以相當之生產剩餘。目下斯業既日趨衰頹，殊足使中國成一貧弱之工業品購買者」(P. 45)這即是說，拉西曼挽救我國的絲業，原來是為外國工業品謀銷路的。

用不着再引證了，這兩個實例，便是拉西曼的「自畫相」。「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拉西曼之意不在中國經濟之獨立的發展，而在乎增進中國的購買力，為西方過剩的工業品擴大國外市場。照拉西曼所指導的總路線從事經濟建設，將使我國全部國民經濟的依賴性一天天加深；換言之，拉西曼對華技

術合作的計畫，無異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佈置新的侵略網。

倘若這種分析不錯，那麼，所謂「一九三四年份之主要事業，如交通之改良、水利之修治、及在若干區域施行廣大之農村建設」(P. 6)，特別選定西北與江西為實驗區(P. 35)，經費總額共計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Pp. 81—82)。在拉西曼看來，無非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恢復市場與穩定市場之先決條件而已。顧維鈞所說：「中國確信其迅速的建設事業，乃其本國與受經濟厄運的世界所必要。」對於拉西曼倒是「心心相印」之言。

這就是拉西曼指導中國經濟建設的總路線。

五 農業問題與公路問題

因為拉西曼是負有「特殊任務」來華的代表，在「特殊任務」拘束之下，對於一切問題的觀察，祇見其偏而不見其全，或者更深刻一點說，就是故意裝聾帶

啞，不肯揭穿真相。例如我國農村破產，誰也知道是帝國主義長期的侵略以及近年轉嫁經濟危機的損失之總結果。而拉西曼則斷定：「各項研究，均認為中國農業產額低微、高利借貸、賦稅過重——尤以附加稅爲然——及國內大部分所通行苛刻而不經濟之佃租制度，爲造成農業危機之基本原因」(p. 20)。誠然，這些因素與農業危機不無關係，但都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什麼？無疑的祇有帝國主義夠得上資格，他把帝國主義的罪惡撇開不提，彷彿我國飢寒交迫的農民是「自作孽」，至少是「中國人紆中國人」，與帝國主義絲毫不相干。像這種說法，頗有祖護「主兇」之嫌。

使拉西曼感興趣的，自然是我國農業問題，關於農業一章的報告，約占全篇幅四分之一，其中也有些比較正確的意見；如認定：我國自耕農之百分數爲三二，半自耕農之百分數爲二五，佃農之百分數爲四三(p. 21)，大抵與事實相近。他又斷定：「佃農之數日見增加，則以自耕農近受農業衰落之影響，被迫變賣或

典出其地產，而變爲佃農，大概新業主多爲商人或官吏，並不欲在農村料理農作』(P. 31)，甚至說到：『農民所受經濟之痛苦，以及由痛苦而發生之失望與憤恨，實影響於江西省生活之各方面，而爲江西現況之重要因素』(P. 37)。因此，也感覺到『中國急需改革土地制度』(P. 35)。怎樣改革呢？他同意『改變佃農爲自耕農』的方法(P. 32)，他同意『如有佃戶繼續租種十年以上，地主不在該地居住時，佃戶得無條件取得該地之所有權』(P. 38)。這樣一來，他就跌落到「矛盾的漩渦」中了。既看出自耕農有變爲佃農的趨勢，又主張以「河清難俟」的程序改變佃農爲自耕農，使人看了莫名其妙。接着，又引證某項文件說：『統計全國人口與土地分配，尙屬地浮於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即人口繁殖之內地省區，亦絕少數百畝數千畝之地主，而三數十畝之中、小耕農確占半數以上。職是之故……認爲經營及整理問題，實更急於分配問題』(P. 41)。這簡直將「改革土地制度」之意見推翻了。這都是拉西曼的矛盾處。

其次，公路一章的報告，亦占全篇幅七分之一。會說到：「在最近兩年中，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協助督造完成之公路，計達四千餘公里，連同七省（蘇、浙、皖、贛、鄂、湘、豫）前已築成之路，因是而可聯絡互通者，共計一萬三千餘公里」（P. 62）。一九三四年之築路計畫，「以完成重要公路四千八百公里為目標」（P. 72）。不言而喻的，這是拉西曼認為滿意的成績。我們姑且不論汽車輸入之與年俱增（P. 68—70），姑且不論汽油輸入在過去五年中總量達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一萬九千加侖（P. 71）；但發展交通，原以運費低廉為最重要之條件，根據拉西曼搜集的材料，證明「汽車運輸代價超過鐵路甚多」，如鐵路每公里每噸的運費，從一角七分到三分二釐，而汽車運費，則從五角二分一釐到二角五分六釐（P. 61—63），昂貴若干倍。似於貨物運輸上未獲何種便利。結果，不過是「為維持治安、傳達政令、統一國家之要政」而已（P. 61），不過便於「江西特種問題之處理」而已（P. 39）。不待言，這是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恢復市場與穩定市場有密切關係

的。耗中國民脂民膏所築成的公路，其運輸代價竟超過鐵路若干倍，真使我們「啼笑皆非」了！不知道拉西曼的感想如何？

六 有與政治絕緣的技術合作嗎

關於拉西曼來華的任務，是技術的，抑是政治的？本是一個萬分重要的問題。

根據國聯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的決議，明明寫上：

「國聯行政院應依照中國政府之請求，委派技術合作代表一人，其任務純屬技術性質，絕不涉及政治」(p. 31)。五月十七日顧維鈞的演說中，亦有「拉西曼博士恪遵國聯行政院之決議案，並以純粹技術與非政治的狀態盡其職責」(日內瓦路透電)。這些決議與言論，是否是「劃一不二，童叟無欺」的廣告呢？

判斷的標準，不在白紙黑字的決議案如何規定，而是關係複雜的實際問題。就事論事，如果拉西曼以個人資格來華服務，或者在服務的過程中能聽從我國經

濟委員會的指揮，那就是技術性質。可是，他是國聯技術機關的代表，地位高於一切；他有與我國國民經濟利益不相容的總路線，這即是說，我們要求在經濟建設中漸漸到達國家的獨立，他却企圖把我國經濟事業變成國聯的附庸；他又有分配國聯駐華各技術專家職務的大權，關於農業、棉業、絲、水利、公路以至衛生、教育各部門，要怎樣幹便怎樣幹；他的工作情形，是隨時直接向國聯行政院陳報的 (P. 4)，只將報告副本送全國經濟委員會備查 (P. 5)。在這些複雜關係之下，他的職務怎能不超出技術性質的範圍呢？不錯，利用外國技術，發展本國經濟，各國不乏先例；就是新興的蘇聯在實行五年計畫的時候，也重視外籍專家，「楚材晉用」，本不自今日始，更不僅我國為然。不過，像蘇聯這一類的國家，主權完整，他們有力量制止外籍專家的工作踰越範圍，試問目前環境能讓我們這樣幹嗎？

何況各項建設，非財不舉？處在羅掘俱窮的今日，想從事經濟建設，除借

債外，無他財源。一九三四年度一千五百萬元的建設經費，來自棉麥借款，即是顯例。假使世界平靜無事，允許我們按部就班的建設下去，則建設完成之日，就是債台高築之時。壓在債台下的窮鬼子，當然要受人宰割。所以，退一步講，即令我們與國聯合作是純技術的，那麼，在技術方面所保持的「清白」，將在債務方面沾滿了政治的污垢。

上項估計，沒有半點玄妙的哲理，差不多是一望而知的。不過我國有些人，向來戴上一副「純技術」的眼鏡，把許多複雜的關係，看得非常簡單，甚至如上海協定與塘沽協定，都認為未涉及政治問題，其他更不必說了。在事實上，明明被惡漢「糟蹋」過，却硬着舌頭說自己一塵不染。與其「自欺欺人」，倒不如那些崇拜「洋大人」的人，歡迎總稅務司安格連管理中國來得坦白；如果還有人仍相信拉西曼來華的任務是純技術的，我只好仿照羅蘭夫人的調子說：技術技術，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最後，應該鄭重聲明：我不贊成與國聯技術合作，與日本的看法，沒有一點相同之處。日本是懷着「中日經濟提攜」的鬼胎來抨擊拉西曼的，所謂「中日經濟提攜」即是「中日滿集團經濟」的別名，我們應該一樣的反對。同時，要指出那些拉攏國聯來抵制日本的人，或倚靠日本來抵制國聯的人，都是同等的荒謬。這就是說，日寇的路線與東京的路線，都使我國陷入殖民地化的火坑。

總之：我們在經濟建設上應該走自己的路線，即保證中國經濟獨立發展的路線，即保證中國經濟脫離帝國主義支配的路線。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可利用外籍專家，也不是說，我們不可輸入外國資本；不過，外籍專家與外國資本應該放在我國主權支配之下，（不待言，在救死不遑的現狀之下，要爭回主權，也不是容易的事）。或者更精密一點說，要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建築起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新壁壘。祇有緊緊的抓住這一點，才可期望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踏上自由與獨立的坦途。

論中日經濟提攜

——兼質李權時博士——

一 先來一次「臨床診斷」

「自海通以來，我國以受帝國主義之長期經濟侵略，致農村破產，工商業日趨危殆。降至近日，……在列強勢力環攻之下，益以水旱飢饉，致農村破產日益尖銳，工商業崩潰愈趨惡化。最近以銀價高漲及入超累積，致白銀大量流出，金融恐慌，達於極點。……上海自去年（一九三四）總結束以來……銀錢業以自救不遑，工商業更形束手，工廠停工者十居其三，商店停業者十居其四，失業職工日有增加，可統計者數達七十餘萬。社會秩序之必然騷動，產業崩潰形勢必然擴大，將為不可避免之事實。……」

這段話，可說是一幅中國經濟的寫真。我們從這幅寫真中，看出農村的破產，看出工商業的崩潰，看出金融業的恐慌，看出失業數字的浩大，就是向來抱樂觀主義的人，在這些觸目驚心的字句之前，也不能不說中國經濟已到了特別困難的地步。

試問這段話出自何人之口呢？假使是新聞記者的紀事，我們還要疑心有幾分故意鋪張；假使是經濟專家的論文，我們還要疑心有幾分神經過敏。然而這段話，既不是新聞記者的紀事，又不是經濟專家的論文，而是瀕於崩潰的全國工商業者的呼聲。（原文爲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宣言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申報）因爲這種呼聲是從全國工商業者的痛苦與掙扎之中喊出來的，所以值得我們注意，更在新聞記者的紀事之上，更在經濟專家的論文之上。

不過，在大家共謀救濟的時候，首先應該認識我國國民經濟受病的根源。不明白受病的根源，決開不出有效的藥方。這一點，全國工商業者似乎已見到了。

他們在宣言中，一則曰：「受帝國主義之長期經濟侵略」，再則曰：「在列強勢力環攻之下」。這兩句話確已搔着癢處。可見他們從經驗上所得的教訓，比那些「見樹而不見林」的學者在經濟研究室製成的報告要正確得多。

我不想把話頭扯得離題太遠，在這裏，祇就上面所講過者，綜合爲兩點如下：

(一) 中國國民經濟現已臨到總崩潰的前夜。

(二) 帝國主義是破壞中國國民經濟的主兇。

這兩點，是替中國國民經濟「臨床診斷」的人應有的起碼的認識。前一點是「病象」，後一點是「病源」。我們必先認識了「病象」與「病源」之後，才能判定某種藥方有害，某種藥方有益。

二 「東洋藥」可吃嗎？

正當一羣國醫束手的時候，日本人便假獻殷勤的替我們開出一個藥方。那當然不是「道地貨」而是「東洋藥」。什麼是東洋藥呢？一句話說完，就是目前宣傳的所謂「中日經濟提攜」方案。

自「九一八」以來，我們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過死裏逃生的生活已三年有半了。當恐怖與絕望之中，忽然看見面目猙獰的敵人露出一絲微笑，本是值得慶幸的事；而又於微笑之餘，拿出一瓶「東洋藥」給我們吃，更使人受寵若驚！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有某些中國人要向日本天皇上「謝恩表」。

可是，仔細一想，中國人是向來命苦的，命苦的人偶然聽到意外的好消息，決不敢信以為真。因此，這次日本人送來的「東洋藥」，就是出於誠意，我們也應該謹守孔子所謂「丘未達不敢嘗」的遺訓，在吃進口之前，把它分析一下。

所謂「中日經濟提攜」方案，據中外報紙所載，約有下列五點：

(一) 中國徹底取締排日運動。

(二) 中國放棄依賴外國的經濟政策，由日本予以生產的援助。

(三) 促進中國的農業生產，尤其是要生產大量的棉花以供日本工業之用。

(四) 中國盡量購買日本的工業品。

(五) 日本在上海設立二萬萬元的信用借款，以應中國財界與產業界的急需。

看了上述五點，便明白認識「東洋藥」的內容是些什麼東西。再拿前面「臨床診斷」所發見的「病象」與「病源」對照起來一看，誰也能判定所謂「中日經濟提攜」是有毒的藥方或有益的藥方了。

老實講吧，所謂「中日經濟提攜」方案，不論就那一點說，都是對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第一點，澈底取締排日運動，是要中國人馴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屠刀之下，聽其宰割。第二點，放棄依賴外國的經濟政策，即是排斥英美在中國市場上的勢力，使中國從各帝國主義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變成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第三點，促進中國的農業生產，無非想使中國放棄現有的工業基礎，大家替

日本培植原料。第四點，盡量購買日本的工業品，更把日本毀滅中國民族工業的陰謀和盤托出，其目的在使中國四萬五千萬人都靠日本貨過活。第五點，尤爲毒辣，在表面上似乎是日本拿二萬萬元的信用借款來救濟中國財界與產業界的困難，實則企圖運用資本輸出的鐵鞭，打倒中國的金融業。

我想用不着多加解釋，誰都明白所謂「中日經濟提攜」方案，是日本帝國主義吞併全中國的設計，想把中國金融家、工業家、商業家以及廣大的工農羣衆，不分貧富的，不分貴賤的，一律壓在日本經濟勢力的金字塔下，永遠翻不過身來。

這種毒素十足的「東洋藥」可以吃下去嗎？

三 經濟博士的「高見」

然而「經濟博士」的答案，是與我們這些平常人不同的。茲從銀行週報十九

卷七期上引其別開生面的意見如下：

「經濟提攜不過是經濟合作之一種。國際經濟合作，以其程度淺深言之，似可分爲：（一）國際經濟分工；（二）國際經濟提攜；和（三）國際經濟集團或同盟」。

「中日兩國壤地僅一衣帶水之隔，自上海起旋，二十四小時內即可直達長崎，是就地理言，不特經濟分工爲無可避免，經濟提攜爲相得益彰，即經濟集團亦已具有天造地設的可能性矣。其他種族上，文化上，和歷史上之因素，足以促東亞二大民族提攜者，亦所在多有，如何利用之以共謀東亞之和平與幸福，是則二國朝野上下文武各界之責也」。——見中日經濟提攜運動的我見一文。

在中日關係萬分緊張的空氣中，居然發表這種觀點的文字，請大家猜一猜，看是什麼人的「大作」？我想：一定有許多人要斷定是冒充「支那通」的日本人寫的。因爲字裏行間酷肖日本人的口吻，甚至日本當局在目前還只主張中日經濟提攜，他却進一步指出中日經濟集團的可能性，更像一個無所忌憚的日本人。可是，在銀行週報原文的標題下，署名的却是經濟博士李權時的大名啊。

李權時博士爲中國人，是誰都知道的。他當「九一八」事變初起之際，在課室中寫「知己知彼能屈能伸」八字以自勉，可見他的見解，向來就「高人一着」。因爲「經濟博士」的頭腦有點特別，所以在我們這些平常人反對中日經濟提攜的時候，他則大胆的發表獨樹一幟的「高見」，對日本帝國主義吞併全中國的設計，一則曰「歡迎」，再則曰「歡迎」，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爲「知己知彼能屈能伸」的學者。至於排日運動，誰都相信是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大的打擊，誰都相信是我國民族意識高度的表現，而李權時博士却自承認「吾人今日亦慚悟抵貨運動之非計」。試問抵貨運動既爲「非計」，難道讓日貨大批湧進充溢我國市場就爲「得計」嗎？我不知道這種觀點與販賣日貨的奸商有什麼分別？

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國民經濟現已臨到總崩潰的前夜。事實告訴我們，帝國主義是破壞中國國民經濟的主兇。假使這些事實不錯，則在今日要挽救我國國民經濟的危機，就非建築起完整的經濟壁壘不可，就非依賴完整的經濟壁壘去抵抗

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可。倘若「中日經濟提攜」方案一旦實現，不僅完整的經濟壁壘在我們永遠建築不起來，恐怕目前殘破的經濟壁壘亦維持不住了。這樣說來，我們歡迎「中日經濟提攜」，就無異吃「安眠藥」。不料我國鼎鼎大名的「經濟博士」連這種淺顯的真理也不懂得！是修養不夠呢？還是心勞日拙呢？這是應該向李權時博士請教的。

四 事實勝於雄辯

現在且讓一步，撇開政治意義不談，專就經濟方面觀察，甚至專就貿易方面觀察，看看所謂「中日經濟提攜」是否合實際的需要？李權時博士說：「中日兩國貿易採用以貨易貨制，此為吾人所極端贊同，日本購華棉三千萬元，即吾華對外貿易入超得以減少此數，而白銀流出的威脅亦得減輕許多。」這幾句話究有若干真理？可請事實先生來答復。茲引中日兩國貿易統計如下（一九三四年一月至

十一月數字，單位千元）：

日本的主要輸入品

中國的主要輸出品

棉花	六三九、八四三	茶葉	三四、二三九
羊毛	一六九、三〇四	棉紗	二九、五八五
石油	一一一、二七九	蛋類	二八、五六〇
機械	八九、六二三	桐油	二五、一三六
藥品	六二、八六五	皮貨	二一、八八五
鋼鐵	六二、五九七	生絲	二一、〇九九

依照上表，日本需要棉花、羊毛、石油……等等，而中國却沒有這些商品輸出。

日本的主要輸出品

中國的主要輸入品

棉織品	四四五、二〇五	棉花	八五、六二一
-----	---------	----	--------

生絲	二六〇、九五八	鋼鐵	七四、四三九
人造絲織品	一〇一、一三二	米	六二、一三二
絲織品	七〇、二一二	機器工具	五五、三一〇
機械及零件	五一、七五七	車輛船艇	三四、四九〇

依照上表，中國需要棉花、鋼鐵、米……等等，而日本也沒有這些商品輸出。這些沉默的事實，把李權時博士極端贊同的「以貨易貨制」駁斥得不留餘地了。

再進一步觀察，日本不是提議向我國購買棉花、鐵、羊毛與農產品麼？假使我國真有這些商品賣給日本，那也許如李權時博士所說得以減少入超，然而事實先生的答復是這樣：

(甲) 棉花——據東亞經濟局的調查，日本每年需要棉花一〇、六一八、〇〇〇擔，除日本與朝鮮能生產五〇八、〇〇〇擔外，不足一〇、一〇九、〇〇〇

擔。中國呢？每年只生產棉花八、〇九九、〇〇〇擔，不敷自己紡織業之用，以致進口棉花每年達一、〇〇〇、〇〇〇——三、〇〇〇、〇〇〇擔之多。我們決沒有剩餘的棉花賣給日本。

(乙)鐵——據說，日本每年從海外輸入之鐵，約為七、七三八、〇〇〇擔。中國以前每年本產鐵七、七三八、〇〇〇擔，有半數可以輸出。自東北失陷後，每年只產鐵二、二〇七、〇〇〇擔，不敷國內消費，那有剩餘的鐵賣給日本呢？

(丙)羊毛——日本每年只產羊毛一、五三八擔，需要額則達一、八〇七、〇〇〇擔之多，不敷甚鉅。我們羊毛產額無統計可查，但其輸出額在一九三三年約計二五四、〇〇〇擔，其中百分之八七賣給美國；而賣給日本者只一三、三六三擔，僅能供給日本不敷額百分之〇·七，就令全數賣給日本，也不過供其不敷額百分之一三·三而已。

(丁)農產品——說起這一項，更使我們慚愧！自「九一八」以來，我國主要輸出品之一——大豆，已落到日本手中，我們再沒有什麼大批農產品可以輸出，反而要從海外購買米麥進來。

至於日本提議拿棉布與機器賣給我國，也是事實先生所不允許的。就棉布說，因我國紡織業繼續發展，進口棉布一年減少一年。在一九二八年計從日本輸入棉布二八五、一五二、〇〇〇碼，到一九三〇年已降至二一五、一三六、〇〇〇碼，到一九三三年更降至一一三、二二六、〇〇〇碼（東北除外）。就機器說，本是我國急切需要的，但是日本也從海外輸入機器，決不會有機器供給人家。

事實如此，日本帝國主義有什麼資格與中國講經濟提攜呢？而李權時博士却極端贊同以貨易貨，誰也想不到半殖民地的「經濟博士」竟缺乏經濟常識——至於此？

五 安眠藥呢？回生丹呢？

也許有人要問：日本帝國主義既然沒有資格與中國講經濟提攜，爲什麼要厚着臉皮提出這種問題？這是有道理的。申言之，就是日本人講「中日經濟提攜」，並非如李權時博士一樣的缺乏經濟常識，而是有他們的如意算盤。

首先要指出的，日本近年利用「匯兌傾銷」「社會傾銷」的方法，使廉價的日貨，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流入各國市場。不料在傾銷的過程裏，激起排斥日貨的怒濤，各國都採用防止「經濟黃禍」的策略，或提高關稅，或實行輸入比額制度 (Quota System)，或徵收匯價跌落補償稅……向日本反攻。日本在四面碰壁之中，當然要在失掉抵抗力的中國尋出路。此其一。

其次，日本對華貿易額雖落在對美貿易額之後，可是中國市場畢竟是一隻肥羊。從日本輸入中國者，有百分之九五的糖，有百分之八四的紙，有百分之七五

的石炭，有百分之七二的海產，有百分之四二的棉布。日本失掉美國的市場，受打擊者只是生絲，日本失掉中國的市場，則受打擊者不僅某一工業部門，而是整個工業構機了。所以，日本要玩弄新把戲，抓住中國市場，不肯放手。此其二。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有這些如意算盤，所以裝出一幅偽善的面孔，拿這瓶不易猜透的「東洋藥」來誘惑中國，來威逼中國，要我們鑽進中日經濟提攜的天羅地網，中它的好計。

日本帝國主義這樣惡毒本不足怪，所不可解者，是某些中國人不惜替敵人宣傳，說「中日經濟提攜」不是安眠藥而是回生丹。甚至如李權時博士也未能免俗。究竟「中日經濟提攜」是安眠藥呢？還是回生丹呢？也許在我們為安眠藥，在人家為回生丹吧！講到這裏，我覺得啼笑皆非，不能再寫下去。姑且從三月十日大公報星期論文裏摘出一段以為本文的結論。

「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無端的侵佔了人家四省的地方，用飛機重砲轟毀了人家許多城市和人

民，擾亂了人家許多地域，而且日日計畫如何吞併，如何宰割，簡單的說，就是處處要置人家於死地。人家無力抵抗也就罷了，却還要進一步強迫他和你講親善，講提攜，這未免太難了！天下事更奇怪的，乃是土地被人佔了很多，人民被人殺了很多，劫餘的性命還是朝不保夕，在此種岌岌可危的情勢下，有些人竟然一聞人誘以親善之詞，謊以提攜之說，便似乎欣然色喜，以為好了，有辦法了「今日演說惟恐不親，明日訪問惟恐不善」，這未免更難了！人於侵略之後來講親善，自然是於「傷害之上加以侮辱」，我於被侵略之後甘心和人去講親善，豈非表明不但無力抵抗，並且情願受侮？若是這種甘受之侮是「含垢忍辱」之類，有重大作用或特殊苦心在內，那還可說。不過在今日彼此懸殊的情勢下，任何作用——假如有的話——都不能發生效力，任何苦心都不能達到目的。惟一的結果，只是上當，受騙，使國難愈加嚴重，國運愈難挽回！」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午夜脫稿

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危機

一 世界經濟發展的現階段

資本主義世界被無情的魔鬼——經濟危機——蹂躪了五、六個年頭，到現在似乎已鬆一口氣了。依照「統計先生」的報告，證明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生產——測驗資本主義命運的指標——從一九三二年秋季起，即跳出經濟危機的深坑，近幾年來，有逐漸向上之勢。就幾個情形較好的國家說，英國，日本與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瑞典、挪威）已超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於是一般庸俗的經濟學者，又興高采烈的向資本主義世界大唱其贊美之歌，滿以為資本主義仍在工業循環期的輪盤上繞圈子，從前是由繁榮而危機，今後是由危機而繁榮，

這即是說，資本主義永久不會失掉青春，永久不會走向死滅。果真如此，則資本主義世界便如秦始皇幻想中的江山一樣，「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可惜這樣的幻想，被鐵面無私的事實打破了。有那些事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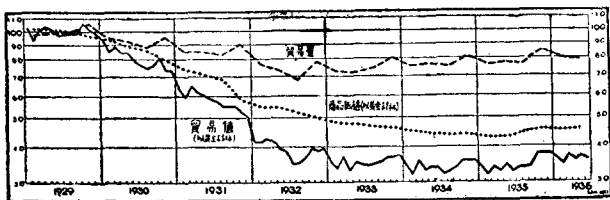
第一，就從工業生產方面看吧，雖說有逐漸向上的事實，然而這種向上，不僅是波動的，並且是不平衡的。除前述英、日、瑞典、挪威外，其餘如美國、法國、波蘭、捷克……皆距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尚遠。（在一九三六年第三季，美國為九一·六%，法國為六八·一%，波蘭為七四·九%捷克為七八·三。%）所以就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生產的總指數而言，假定一九二五——二九年為百分，則一九三五年所達到的限度（九二·八）比一九三二年七月的最低點（六一·五）提高得不少，而比一九二九年六月的最高點（一〇九·八）却相差百分之一八。如果再進一步觀察，工業生產中有製造生產工具者（第一部門），有製造消

費資料者（第二部門），前者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循環進程中的物質基礎，沒有生產工具的擴大與更新，則資本主義決不會走上復興之路，近年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固在好轉之中，可是許多國家的第一部門仍遠落在第二部門之後（註一）。這就無異告訴我們說，資本主義世界在目前還談不到什麼復興哩！

第二，再從世界貿易方面看吧，無論就輸出貿易或輸入貿易說，都是江河日下，在一九三〇——三二年工業生產逐漸減退的時期是如此，在一九三三——三六年工業生產逐漸向上的時期也是如此。這證明從一九三三年起，工業生產與世界貿易的發展，採取了相反的方向。

如下圖所示，世界貿易在一九二九年以後是一瀉千里的。無論就貿易量說，或就貿易值說，都是一樣。一直到一九三六年才有上升之勢。然而貿易量還落在百分之八〇以下（一九二九年為百分），貿易值則更落在百分之四〇以下。

（註一）參看本書世界經濟危機與第二次大戰第四節。



世界貿易這樣的萎縮，難道是資本主義世界交紅運的徵兆嗎？

(註二)

第三，更從資本市場方面去看，情形依然是黯淡的。現在許多國家，儘管貨幣貶值，儘管銀行利率極低，但握有巨資的財東，大抵保持貨幣資本的形式，或者作短期貸款，並未大批的向工業方面投資。茲引四個大工業國家的資本放出額以為說明的根據。(註三)

	美國 (百萬元)		英國 (百萬鎊)
總額	}	總額	總額
		工業方面	工業方面

(註二) League of Nations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Nov. 1936

(註三) Imprecorr. 12 March, 1935. 但一九三四年的數字，美、英、

德三國是前三季之和，法國則是前兩季之和。

一九二九年	一〇、一八三	一、八九七	二八五	四五
一九三二年	一、一九三	一七	一八九	九
一九三三年	七一	一一二	二四五	一〇
一九三四年	一、〇四八	二四	一二五	三三
	總額	工業方面	總額	工業方面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八六	五、九九二	四、二五八	七一一
一九三二年	一七、八六〇	一、五二六	七〇九	四五
一九三三年	一三、七八四	九二九	五六三	五五
一九三四年	七、四八一	三三八	三五九	五一

法國(百萬法郎)

德國(百萬馬克)

一望而知自一九三二——三四年，各國資本投在工業方面者為數甚微，原因是固定資本（生產工具）過剩，即想投資無從下手。至於國外投資，也減到最小限度。下面的統計（每月平均數），很清楚的把這種現象說明了。（註四）

美國（百萬元）

英國（百萬鎊）

一九二八年	一一〇	一一·九
一九二九年	六四	七·八
一九三二年	二	二·四
一九三三年	〇	三·二
一九三四年	〇	三·七

美國在一九三三——三四年的國外投資等於零；英國雖說增加了一點，但就貶值百分之四十的金鎊計算，也是很少的，並且都投在大英帝國的領土以內（殖民地或自治領地）。從國內與國外所看到的資本市場如此，可見資本主義世界還在倒霉之中。

第四，假使我們把目光移到農業危機方面，也看不到特別好轉。大家知道：

（註四）同註三。其中一九三四年的數字，是前十個月的平均數。

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雙流匯合，是這次世界經濟危機特徵之一。現在，工業危機雖說有些國家超過了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然而農業危機並沒有獲得相同的進步。依照「統計先生」的報告，情形是這樣（註五）

資本主義世界的農產收穫量（單位百萬噸）

	小麥	大麥	燕麥	玉蜀黍
一九三四年	八一·五	二五·五	二五·六	五二·四
一九三五年	八三·八	二八·〇	四六·〇	六九·五
一九三五年對一九二九—三三年平均百分數	九八%	九六%	九九%	八八%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一九三五年的農產收穫量，雖比一九三四年進步，然仍未達到一九二九——三三年間的平均數。如與一九二九年以前的數字對照起來，自然相差更遠。在農業危機推波逐瀾之下，誰敢相信資本主義世界欣欣向榮

（註五） Varga: *Economy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1935.*

呢？

夠了夠了，不必再舉事實了。在上述事實之前，我想：一般庸俗的經濟學者，可以閉着眼睛向資本主義世界唱贊美歌，決不能以隻手掩盡天下耳目。假使我們未患「色盲」把事實看錯的話，那就應該說，現階段的世界經濟，從一九三二年秋季起，已跳出經濟危機的深坑，是事實；目前還停留在不死不活的狀態，未見到普遍繁榮的影子，也是事實。

二 資本主義總危機與特殊蕭條

講到這裏，或者有人要說：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是週期的；因為資本主義的機構內包含有克服危機的條件，所以，在危機發生之後，不久即進入蕭條時期，以後由蕭條而起色，由起色而恢復繁榮，到了繁榮的極巔，則又受危機的襲擊。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本是如此。現在資本主義世界既跳出經濟危機的深坑

而停留在不死不活的狀態，無疑的已進入蕭條時期，依照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似乎繁榮終於要到來。

這種推測，就一般情形說是對的。證以一八二五年以來的歷史，資本主義確在工業循環期的輪盤上跑來跑去，每一度危機之後，即走向繁榮；每一度繁榮之後，即又發生危機。這種事實，誰也不能否認。不過，歷史的輪子把資本主義推到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經過了一九一四——一八年空前的戰爭，使資本主義原有的健康大受損失，它再不是一個體魄強壯的青年，而是一個百孔千瘡的老朽。這即是說，資本主義已發生總危機了。什麼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呢？扼要的講，有兩個特徵：一是資本主義的體制分裂；一是固定資本的慢性剩餘。前者是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分裂出六分之一的社會主義系統，形成兩個制度的對立，社會主義前進一步，即資本主義削弱一步。後者是戰後各國工廠的開工率不足，即在繁榮之年（一九二九），英國工業生產只達到戰前的九九·一，德國更少，只達到戰

前的六七·四，以致各國都有廢置不用的固定資本。這兩個特徵，在戰前是沒有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總危機在戰前是不存在的。誰忽視這一點，誰就把戰前的世界與戰後的世界看成沒有差別；誰就把戰前的危機與戰後的危機看成沒有差別。一般庸俗的經濟學者，腦膜中只有「由繁榮而危機由危機而繁榮」的公式，最大的錯誤，就是不認識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因此，不認識目前資本主義世界所以打得焦頭爛額，是由於在總危機的基礎上爆發了工業循環期的危機。資本主義明明成了一個百孔千瘡的老朽，偏說它是一個體魄強壯的青年，這自然要鬧出笑話。

記得我在世界經濟危機與第二次大戰一文裏，曾寫過下面兩段：

「看透了資本主義在歷史過程中的命運，便知道在不能克服的總危機之下，就是工業循環期的危機略見緩和，就是逃脫了危機的最低點，也不能回到過去的繁榮時代。體質衰弱的六十老翁，偶患時症，如果用藥得宜時症是可以治愈的；然而無論如何，總不能把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健康恢復

過來。」

「真實的情形，正與樂觀論者的幻想相反。這即是說，資本主義的前途，再沒有什麼繁榮時代。就目前論，危機的最低點早已跳過，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已從危機的深淵進到蕭條的階段。不過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之上的蕭條，決不是正常的蕭條(Normal depression)，而是特殊的蕭條(Special depression)申言之，就是：既不會走向新的繁榮期，又不會回到舊的衰落點。像不能恢復健康的老年人一樣，如果不受新的襲擊的話，或許不死不活的拖延下去。」

這兩段話，引在這裏，仍是適用的。現在要補加說明是：資本主義世界從危機的深淵過渡到蕭條的階段，無疑的是一種好轉，不過這種好轉是矛盾的，不規則的，並且帶人爲的性質。軍備競賽的影響，通貨膨脹的影響，是大家知道的。而最重要的方法，是把經濟危機中的損失在國內轉嫁到工人與農民身上，在國外轉嫁到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廣大民衆身上。關於前者，——國內轉嫁——美國的藍鷹運動便是實例，「據美國復興辦事處之研究報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止，

全國全部工資之支出，爲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六十，即工人之收入減低了十分之四，而全國全部利息及利潤之數額，爲同年的百分之百五十，即資本家之收入，增加了十分之五。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四年，全國之總收入，已減低了百分之四十，而利息利潤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可見在產業復興法規下，受利益的是資本家，而受損害者是依工資過活的；農民損失也很利害，……南方諸省受農業新法之利者爲大地主，而佃農得不到國家補助，却要生生的棄田不種，於是顛沛流離死亡於道路者日有所聞。『事實非常明白，不必再加注釋。關於後者——國外轉嫁——自然是向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開刀，在遠東方面特別是向中國開刀。這是我們應該詳細討論的問題。』

三 世界經濟危機漩渦中的中國

落後的中國，九十年來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光顧」與「提攜」之下，早

踏入世界市場。我們過去自足自給的農業經濟，在慢性的危機與破產之中，日與世界經濟的洪流匯合，這即是說，中國經濟已成爲世界經濟的一環了。真的，中國自海禁大開以來，全國農民不僅成了昂價商品的購買者，不僅成了廉價原料的供給者，並且有龐大的賠款與債款，像金字塔一樣的壓在頭上，很難翻身。同時，我們自己肥美的「處女地」又變爲世界資本的投資市場，於是外資經營的鐵路、銀行、鑛山、工廠……控制了我國的經濟命脈，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網，又成爲中國經濟的一環了。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是這樣「犬牙交錯」的。

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越結不解之緣，則中國經濟越受世界經濟的支配而失其獨立，這即是說，中國經濟漸漸降到半殖民地的地位。當帝國主義在走紅運的時候，它固然從中國身上多吸收一點血液以培養其經濟繁榮的鮮花；而到了倒霉的時候，則更加緊向中國巧取豪奪以補償其經濟危機的損失。瓦爾加在一九二八

——三四年的世界經濟與政治中曾經講過：「經濟危機在殖民地上的反映，最為嚴重。這是由於它們本身的地位——隸屬地位而來的。帝國主義者把危機的負擔，大半轉嫁於殖民地，因之，這些地方的經濟危機特別深刻而劇烈。」這幾句話應用到中國方面是十分適合的。

現在且舉事實來證明吧。中國急性的經濟危機本是一九三一年爆發的。在急性的經濟危機尚未爆發之前，即是說，在中國慢性的農業危機尚未與世界經濟危機合流之前，當時因銀價跌落關係，造成一九三〇——三一年中國工業與金融業的虛浮腫脹，從表面看去，似乎是一種假繁榮，其實在假繁榮的外殼之內已包含着危機的因素。一到一九三一年，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身上最好的一塊肥肉，硬被宰割去了。這麼一來，中國急性的經濟危機就不可遏抑。在中國經濟惡化的時候，正是日本經濟好轉的時候，所以日本從一九三二年起，工業生產已開始扶搖直上，即是有力的證明。然而中國吃虧的地方並不止此。自英日

兩國先後放棄金本位以來，貨幣戰爭的新局面便展開，到一九三三年四月，美國又起而「效尤」，結果，廉價的舶來品向中國市場湧進，而我苟延殘喘的民族工業與焦頭爛額的農業，就失其抵禦的力量了。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的狂潮，從此洶湧而來。到一九三四年八月美國宣布白銀國有以後，銀價飛漲，我國白銀不斷的外流；於是危機的「鐵帚」，在掃蕩工業與農業之餘，又進而掃到金融業，以致中國金融的危機，亦日益深刻。它們爲什麼要與中國開玩笑呢？內容很簡單，就是要在中國市場上來解決它們的經濟危機問題。中國經濟危機一天天深刻化，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對華的統治權一天天加強。中國的死路，就是帝國主義的生路。帝國主義與半殖民地的中國，正站在利害相反的兩極端。

帝國主義搾取中國顯而易見的形式，一方面是向中國輸入商品，另一方面是從中國輸出原料，即所謂不等價交換。最近五年，這種不等價交換，透過物價的變化，一年年的厲害起來，有下面數字爲證。

最近五年中國進出口物價指數（一九二六—一〇〇）（註六）

	進口物價	出口物價
一九三〇年	一二六·七	一〇八·三
一九三一年	一五〇·二	一〇七·五
一九三二年	一四〇·二	九〇·四
一九三三年	一三二·三	八二·〇
一九三四年	一三二·一	七一·七
一九三五年	一二八·四	七七·六

可不是嗎？進口物價從一九三二年起雖漸見跌落，但跌得很少，到一九三五年仍比一九二六年的水平線高三分之一。出口物價呢？從一九三一年起，江河日下，到一九三五年已比一九二六年的水平線低四分之一。從這些不同的數字中，

（註六）一九三五年中國經濟年報二二一—二二二頁。

我們便窺見帝國主義榨取中國的手段非常毒辣！它們在經濟危機中所受的損失，是這樣輕輕的轉嫁到中國人身上。它們由危機進到蕭條了，我們却在它們擺佈之下，越陷入危機的深淵了。

然而進一步觀察，資本主義國家不惜犧牲中國以緩和自己的經濟危機，祇在某種限度內有效，超過某種限度就要四面碰壁。第一，因為目下貧乏的中國究竟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有限的膏血快要乾枯，到了無可榨取的時候，或到了被榨取者不能忍受的時候，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反抗的怒潮。第二，因為中國不是某一帝國主義獨占的市場，你也想犧牲中國，他也想犧牲中國，誰也不肯讓誰，一定要演出「全武行」的悲劇。前一種結果是加深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後一種結果是加深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都證明「剝肉醫創」的政策終究是四面碰壁，此路不通。到了帝國主義四面碰壁的時候，也許是中華民族絕處逢生的時候吧！

四 「中國經濟何時能好轉」

前面講過：資本主義世界從危機的深淵過渡到蕭條的階段，無疑的是一種好轉。假使這幾句話不錯，當然有人會聯想到：世界經濟危機既引起中國經濟危機，則世界經濟好轉或許可以引起中國經濟好轉吧！

是的，世界經濟好轉了，然而是在「以鄰為壑」的條件下好轉。因為如此，所以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好轉的時候，我們更沉入危機的海底，無以自拔。中國既不能進一步執行「以鄰為壑」的政策，又不能退一步實施「自固吾圉」的計畫，將從何處獲得好轉呢？

記得申報月刊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討論中國經濟何時能好轉的時候，章乃器先生曾說過：「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破產不破產的問題，並不是好轉不好轉，繁榮不繁榮的問題。因為在目前，「好轉」和「繁榮」都根本談不到，倒反

是推測幾時破產，比較容易一些。」（註七）證以兩年來的事實，這幾句話是「不幸而言中」的。

也許有人要這樣想：中國是世界市場，中國破產決非世界之福。我們的「友邦」是要設法援助的。如果得到先進國家的援助，那就是中國經濟好轉的開始。的確，日本是最替中國關心的，所以首先倡議以「中日提攜」的方式來援助中國。美國也不願作壁上觀，所以組織了經濟考察團到中國來。英國呢？過去沙遜爵士的建議，賈德幹的奔走，是我們記憶尙新之事；近來又有羅斯來華調查中國財政金融狀況。這些「友邦」看見中國經濟危機的擴大，似乎比麻木不仁的中國人更爲躁急。

不過，它們注意中國，或者樂意援助中國，我敢斷定不是善意的，在表面上彷彿替我們幫忙，實則想在幫忙之中再撈一點「油水」，使其本國經濟上的蕭

條，轉向起色，這還是「以鄰爲壑」的把戲。「中日提攜」的內幕是如此，就是「中美提攜」「中英提攜」亦何嘗不是如此。儘管它們各玩各的花樣，並且彼此衝突，然而想利用中國瀕於破產的機會，在「援助」的烟幕彈下，進一步榨取中國是相同的。如果它們「援助」中國的計畫成功，這與其說是中國經濟好轉的開始，倒不如說是中國正式殖民地化的開始。

我不打算再寫下去，在這裏，只引吳覺農先生的一段話，以爲本文的「尾聲」。

「要解答中國經濟何時能好轉的問題，我們先得問中國何時能脫離帝國主義者的一切羈絆。在這個反問沒有解答以前，無論用什麼方法，統制也好，放任也好，恐怕都不見得能使中國經濟趨於好轉吧。」（註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修正。

（註八）同註七，十六頁。

世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

——世界經濟現勢講話的結論——

一 對立發展中的好轉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火，把資本主義統治全世界的鐵網，燒毀了六分之一。在這六分之一的廢墟上，成立了一個新興的國家——蘇聯。蘇聯的成立，不啻把完整的世界分而為二：一是資本主義的，一是社會主義的。所以到現在，橫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個世界而是兩個世界。

大家知道：蘇聯的經濟制度，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有根本的差異。因為如此，所以當資本主義世界被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雙流匯合的

洪水泛濫着的時候，這種洪水到了蘇聯邊境，却停止不前，而它自一九二九年實施五年計畫以來，工業生產反是躍進的。依照國聯統計，蘇聯的工業生產指數如下：（一九二九——一〇〇）（註一）

一九三〇年——一三〇·五%

一九三一年——一六〇·九%

一九三二年——一八二·九%

一九三三年——一九八·一%

一九三四年——二三八·二%

一九三五年——二八八·二%

一九三六年——三五四·三%

與工業並駕齊驅的，還有集體化的農業，這是人類歷史上曾未見過的新農業。現在占絕對多數的農民已捲入社會主義的農業之中了。現在全國耕地總面積一三三·七百萬公頃之中，由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耕種的已有一三〇·六百萬公

（註一）League of Nations: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Nov. 1936, P. 507. 但

九三六年的數字係前半年的平均數。

頃（一九三六年數字）農業機械化的成績，尤為可驚，機器曳引機站（Machine Tractor Station）的數目，在一九三二年只二、五〇二，到一九三六年已增至四、九五—，幾加一倍之多。這些簡單的數字，已映出一幅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縮圖。

另一個世界——資本主義世界是與蘇聯對立的，其發展的狀況，可從下列統計材料得其大概的情形。

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五——二九〇〇）（註二）

一九二九年——一〇・〇%

一九三〇年——九四・六%

一九三一年——八二・一%

一九三二年——六九・〇%

一九三三年——七八・一%

一九三四年——八四・三%

一九三五年——九二・八%

（註二）同註一，Aug. 1936, P. 345

我們從上表可看出兩件事：第一，從一九二九——三二年，工業生產指數是向下的；第二，從一九三二——三五年，工業生產指數是向上的；一望而知一九三二年的六九%為最低點，雖說到一九三五年距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約差百分之二八·八，然而在一九三二年以後，總算跳出經濟危機的深淵。因此，從經濟危機的洪水中甦生過來的人們，不得不異口同聲的說，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好轉」了！

「好轉」是事實，我們不僅應該認識這種事實，並且應該說明這種事實。

首先要指出的，這「好轉」是在加緊備戰的基礎上獲得的。許多國家受經濟危機的襲擊，百業不振，只有軍事工業特別繁榮，從而與軍事工業有關係的工業部門——如鋼鐵工業、化學工業、汽車工業——亦蒸蒸日上。這用不着多找證據，我們從各國財政預算中，見到軍費（軍事工業的培元湯）不斷的擴大，就知

道了。

其次，這「好轉」之另一基礎，恐怕要算通貨膨脹 (Inflation) 吧。現時實行通貨膨脹的國家，多至五十以上，尤其是日、英、美各以減低幣價爲武器，促進輸出貿易。使國內生產事業，由絕望中恢復過來。

除開了加緊備戰與通貨膨脹兩個因素之外，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力量 (The internal economic forces of Capitalism) 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好轉」有關。因爲有些軍事工業不大發展的國家以及貨幣安定的國家，其一般的生產亦有相當進步；這就證明了這「好轉」，另有其他因素。什麼是其他因素呢？無疑的要歸功於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力量了。資本主義把經濟危機中的損失，轉嫁於國內工人與農民身上，轉嫁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廣大民衆身上，當然可使震撼一切的經濟危機，漸漸「好轉」。

不過，在「好轉」的過程中，也有兩種現象不可忽視。第一，這種「好轉」是不平衡的；第二，這種「好轉」是不穩定的。要說明前一種現象，可看下表：

幾個主要國家的工業生產指數（註三）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日本
一九二九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一九三〇年	80.7	92.3	85.9	100.0	94.8
一九三一年	68.1	83.8	67.6	100.0	91.6
一九三二年	53.8	83.5	53.3	68.8	97.8
一九三三年	63.9	88.2	60.7	76.7	113.2
一九三四年	66.4	98.8	79.8	71.0	128.7
一九三五年	75.6	105.7	94.0	67.4	141.8

很顯明的，日本與英國已超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美、法、德都在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之下，就這三國比較說，德國最好，美國次之，法國最壞。這便是

（註三）同註二，P. 345

所謂不平衡。(德國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以後，也超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線)

要說明後一種現象(不穩定)，也有不少的例子。如前表，法國工業生產指數在一九三三年已升至七六·七，到一九三四年又降至七一，到一九三五年又降至六七·四，即是真憑實據。此外，如美國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工業生產指數已升至七四·八，但從三月起又開始向下，一直降至五月的七一·四。又如日本，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工業生產指數已升至一五二·八，到一九三六年一月降至一三五·三，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又升至一五〇·五，到六月忽降至一四六·九。(註四)這便是所謂不穩定。

我們既看出不平衡與不穩定兩種現象，誰還相信這個「好轉」，今後是一帆風順呢？

(註四)同註一。

二 總危機影響之下的特殊蕭條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本是週期性的，彷彿像春夏秋冬一樣，春去夏來，夏去秋來，秋去冬來，冬去則春又來，終而復始，循環不息。在過去，資本主義發展到繁榮 (Prosperity) 的頂點，必爆發危機 (Crisis)；危機之後，繼以蕭條 (Depression)；蕭條之後，轉為起色 (Revival)；起色之後，則又趨向繁榮。資本主義向來在繁榮——危機——蕭條——起色——繁榮的輪盤上轉來轉去。目前資本主義經濟既有「好轉」，可說已由危機進到蕭條。試問經過蕭條以後，是否可轉為起色而趨向繁榮呢？

在這裏，我們應該先請幾個外國的經濟學者來答復。英國的統計學者 (Statist) 是世界馳名的經濟週刊，在一九三四年的最後一期中，關於英國的前途，曾寫過下面一段話：

「雖說商業圈內正常的進行，可使英國鬆一口氣，然而事實還是如此：在我們未來的進展中，可以遇到妨害，或者要逆轉。除非別國得到相同的進步，則英國可能的進步，就一定大受限制」。

(註五)

美國有名的經濟學專家托普 (W. C. Thorpe) 最近也說過：

「今日擺在世界前面的經濟問題，不僅是怎樣進行恢復，而更緊要的問題，是怎樣替這種恢復建立一點穩定的基礎」。(註六)

假使認為這兩段話不大明顯，我們不妨再聽最有權威的世界經濟學者瓦爾加 (Varga) 的意見。他說：

「在一九三五年工業週期的發展中，沒有改善的前途。一九三四年完全在一九三三年的舊路上跑來跑去，未從蕭條階段得到新發展，進到週期的下一階段。一九三五年將沒有任何基本的改善或

(註五) "Statist", Dec. 29, 1934.

(註六) "Foreign Affair", Jan. 1935.

任何決定的轉變使資本主義世界有漸入佳境的前途」。(註七)

假定這些估計不錯，我們便知道：資本主義經濟雖在「好轉」之中，由危機進到蕭條，但一般說來，還不易由蕭條轉為起色，更談不到趨向繁榮。

爲什麼呢？英國首屈一指的經濟學家史騰普（Sir Josiah Stamp）說得對：「各國經濟制度正害着某種麻痺症（Paralysis），到現在，一切正統的經濟學原理，既不能解釋它，又不能解決它。」的確，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已失去原有的健康了，這便是所謂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最大標誌，即兩個經濟制度的對立，從前統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已縮小了六分之一的地盤；加以近年蘇聯經濟建設的邁進，使資本主義的殘壘又受到威脅，兩國經濟制度的爭鬥日益展開。其次，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中，一切內在的矛盾更趨尖銳化，尤其是生產力與消費力的不平衡；一方面市場的吸收力，就在繁榮時

（註七）Varga: *Econom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1934.*

期，也不能保證生產工具的完全使用，以致固定資本 (Fixed Capital) 發生慢性的剩餘；另一方面，市場的吸收力，又不能保證全體的勞動者都到機器旁邊做工，以致慢性的失業成爲經常的現象。此外，如農業危機的加深，如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高漲，亦是總危機時代不可避免的病症。所有這些標誌，無異告訴我們說，資本主義已經衰老了！這是戰前的資本主義與戰後的資本主義根本不同之處。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懂得一九二九年以來的經濟危機，本是週期性的，但它與戰前歷次週期性的危機不同，因爲這次週期性的危機是爆發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之上的。這次週期性的危機，雖跳出了一九三二年的最低點，然而總危機的程度却因這次週期性的危機而加深了。

不錯，資本主義經濟現已由危機進到蕭條了，甚至在某幾個國家內，長久而拖延的蕭條已經完結；然而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影響之下，或者說在資本主義總

危機的阻力之下，既不容易獲取新市場，復不容易利用舊市場，所以一般的情形不易由蕭條轉爲起色；就算某幾個國家已踏進起色吧，可是依然沒有普遍繁榮的希望。這種不死不活的現象，確非「由繁榮而危機而繁榮」的舊公式所能解釋。有些經濟學者仍想把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害過一次時症的資本主義經濟——拉進舊公式的輪盤上轉來轉去，但至少須辦到一件事，就是要求全知全能的上帝，擲下一瓶「聖水」，使資本主義「返老還童」。否則老態龍鍾的資本主義，恐怕要在不死不活的樊籠中多翻幾次筋斗吧！

三 世界經濟的前途

我們認識了今日的世界經濟，還要預言明日的世界經濟。

關於明日的的事情，彷彿像「謎」一樣，是大家樂意猜測的。怎樣猜測呢？翻劉伯溫的「推背圖」嗎？這是預言家騙人的把戲，在科學昌明的現代，沒有什麼

價值可言，或者照中國人慣用的老方法，「欲知來視諸往」嗎？這固然比較合理，比「推背圖」靠得住；可是未來的事變，有許多是歷史上無先例的，我們沒有理由斷定明日的世界經濟仍在舊軌道循環。

然則應該怎樣猜測呢？我們知道：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其客觀的規律性。如前面所說，資本主義向來在繁榮——危機——蕭條——起色——繁榮的輪盤上轉來轉去，就是在規律性支配之下所發生的現象。同時，我們又知道：所謂規律性決不是印版文章，這即是說，在規律性支配之下，並不排斥變化性，不過這種變化性不能超出規律性所許可的範圍吧了。如前面所說，一九二九年以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本是週期性的，但它與戰前歷次週期性的危機不同，由於這次週期的危機爆發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之上，就是變化性的具體說明。我們把握住規律性與變化性來預言明日的世界經濟，不僅勝過劉伯溫的「推背圖」，並且勝過單純的「欲知來視諸往」的老方法。

我們不是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好轉」嗎？我們不是推斷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影響之下，沒有普遍繁榮的希望嗎？在這種僵局之下，世界經濟將往何處去？

是的，各資本主義國家有勢力的人物，如鮑爾溫、墨索里尼、希特勒以至羅斯福之流，都用盡過一切方法，想把資本主義經濟的僵局打開；尤其是第一黃金國的白宮主人羅斯福，他所幹的一切，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領袖望塵莫及的、藍鷹運動的花樣真多極了！從白宮發出一道命令，可把全國黃金收歸國有，可把全世界的銀價提高。氣魄這樣偉大，兩年來的成績怎樣呢？

無可諱言的，羅斯福的新政失敗了！這不是羅斯福個人的失敗，而是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敗。儘管羅斯福還想繼續掙扎，我敢說，資本主義決不會從他的手裏挽救出來。美國如此，比美國次一等的更可想見了。

難道那些掌握資本主義命運的人物，就從此撒手麼？不會的。他們既不能把資本主義的車輪，拉到平坦的大道上去，自然仍聽其在戰爭與革命的火藥庫上盤

旋，這即是說，他們一方面仍要在加緊備戰與通貨膨脹的舊路上走，另一方面仍要在剝削國內工農及世界弱小民族的舊路上走。走前一條路，無疑的要爆發戰爭；走後一條路又無疑的將引起革命。戰爭與革命這兩個「災星」，似乎是在資本主義的「八字」內面預先注定了的！

如果戰爭與革命延緩下去，則不死不活的資本主義，也許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在總危機的基礎之上，再來一次週期性的危機。處在不平衡與不穩定的「好轉」之中，走向危機或者比走向起色與繁榮更爲便捷吧！現在有些經濟學者，已看到快要成熟着的經濟危機不是首先爆發於日本，便是首先爆發於英國了。

依照上面的分析，似乎明日的世界經濟，其前途是黯淡的，這不是悲觀者的論調麼？不！決不！

講到這裏，不得不鄭重指出：上面所述，不過預言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前途而已。但我們要記着，要牢牢的記着，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前途，並不是世界經濟沒

有前途。凡是用歷史的眼光去考察問題的人，都知資本主義經濟祇是歷史過程中一個階段，它從封建經濟的廢墟上誕生出來，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最後也與封建經濟一樣走向沒落。然而資本主義經濟的沒落，正是世界經濟向更高的形式展開，也可說是拋棄舊的不合理的世界經濟，而另行建立新的合理的世界經濟。這種歷史過程中的演變，是進化，是上升，是「從必然的世界進入自由的世界」。與其說是悲觀者的論調，無甯說是樂觀者的論調。

不過，世界經濟屬於社會現象而不屬於自然現象。社會現象是人類構成的，所以世界經濟的發展，雖有其必然性，究竟與「日蝕」「月蝕」不同；因為由人類構成的社會現象，一定要經過人類的努力才能實現。現在，我們預言世界經濟的前途，亦只就客觀的事實，指明其發展的趨勢。至於如何實現這種前途，那是人類——自然是一部分的人類——應該努力的事。

最後，我要附帶說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半殖民地，我們目前努力的

目標，與資本主義國家所要求者不同，它們是要求跳出資本主義的「迷宮」，我們則要求跳出半殖民地困境，這是應該分別清楚的。可是我們在努力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為民族求一條由解放而獲得自由之路，邁步前進；對於資本主義國內要求解放的人們，也不管加上一臂之助；這即是說，我們的努力對於全世界是有貢獻的，為自己而爭鬥，就是為全世界而爭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修正

中國國民經濟的出路

——中國經濟現勢講話的結論——

中國經濟的全領域，好像是一幅黯淡的畫圖。客氣一點說，彷彿似「病西施」，失掉了「健康美」；如果認為這句話還不夠味，那就應該指出：中國經濟的病症，是千瘡百孔的，目前正在痛苦呻吟，爲其未來的運命掙扎啊！

不過，我要聲明的是：中國經濟的病症雖是千瘡百孔，但決不會如悲觀論者所想像，以爲是羣醫束手的沉痾。假使吃了對症的藥方，以其先天稟賦之厚，恢復健康，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這即是說，中國國民經濟是有出路的。出路在那裏？即係本文應該解答的問題。

現在先就幾種流行的藥方，略加檢討吧！

一 「亞泰基」能不能實行

什麼是「亞泰基」呢？粗看起來，似乎像「金雞納霜」(Quinine) 和「阿司匹靈」(Aspirin) 一樣，一望而知是一種舶來品——外國藥方。可是，這種外國藥方（亞泰基）不是替個人治病的，而是替國家治病的；申言之，就是國家的經濟失了某種常態時，才用得着「亞泰基」。它是“Autarchy”的音譯，如翻成中國話，便叫做「經濟的國家主義」。

也許有人要問什麼是「經濟的國家主義」吧！這是我應該說明的。所謂「經濟的國家主義」，即是在經濟上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我不希望把東西賣給別國以圖發財，同時我也不買別國的東西以供消費，大家把大門關起來，過求己不求人的生活。這樣的外國藥方，在倫敦經濟會議以後，極盛一時。由國粹主義者看來，或者以為與我國老子所說：「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的舊湯頭無異吧！

嚴格說起來，「亞泰基」與老子的「小國寡民」，是不相同的。在這裏，沒有篇幅來說明。我現在，祇想提出兩點討論一下：

(一) 依據什麼理由替中國開出「亞泰基」的藥方？

(二) 「亞泰基」的藥方是否有效？中國是否吃得下喉？

茲從第一點說起。大家知道：中國是地大物博的，往昔閉關時代，我們一向在自給自足的情形下面生活，並且生活了數千年。自從高鼻碧眼兒光顧以後，中國經濟上的萬里長城，漸漸被西歐大炮似的商品打破。於是五光十色的商品，便像潮水洶湧而來，衝進城市，衝進農村，過去自給自足的四萬五千萬同胞，都變成外國商品的消費者。當然，這些商品不是白送給中國的，他們運輸商品進來，必須掉換金錢出去。於是我國的民脂民膏，就不斷的流到外國了。尤其是最近幾年，那些資本主義國家，在不景氣潮流中打得焦頭爛額，都拚命的到中國來加緊

榨取，以遂其「剝肉醫創」之計。中國經濟上的千瘡百孔，是在這種環境下造成的。所以，有些人主張：中國應該趕快關起大門，或者更具體一點說，應該高築關稅壁壘，保護本國市場，使自己剩餘的經濟命脈，落在自己手中，自己生產，自己消費，恢復過去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亞泰基」的藥方，是依據這種理由開出來的。

說到第三點——「亞泰基」的藥方是否有效？中國是否吃得下喉？話就很长了。一般講起來，「亞泰基」並不是立見奇效的靈丹，儘管有些國家把這種藥方吃了許久，然而仍不能克服經濟的病態。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既建立了世界市場，在世界經濟脈絡息息相通的今日，必用人為的方法，把整個的世界市場隔離起來，畢竟是開倒車，畢竟是抽絲自縛。請以美國為例吧！福特汽車是世界馳名的，倘若美國實行了百分之百的「亞泰基」，那就得不到東印度羣島的橡皮，只好讓四百萬汽車工人失業。固然，藉助現代科學技術，也可以人造橡皮來代替；

但耗費太多，不合經濟原則。同時，東印度羣島上靠出賣橡皮過活的人，就非餓死不可。退一步講，倘若美國祇實行某種限度的（不是百分之百的）「亞泰基」，則提高進口關稅為必採的手段。結果，不但引起別國以同種手段來報復，並且使國內消費者亦不得不以高價購買進口的商品，也是不合經濟原則的。這難道不是開倒車嗎？這難道不是抽絲自縛嗎？美國尚且如此，其他國家更不待論了。中國呢？顯然情形比美國更壞。華洋互市，已有百年之久，人家硬把我們拖進世界市場裏去，使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環子。倘若一旦關起大門的話，那麼，中國農民替外國工業家所栽培的原料，就無異廢物了。另一方面，我們有些生活必需品，是靠海外供給的，米亦其中之一（每年約有二千萬擔以上），關起大門餓肚皮，恐怕要引起麻煩吧！也許有人以為在「兩害相權取其輕者」的原則之下，我們不妨實行某種限度的「亞泰基」，拒絕不必要的進口貨，以減少入超。這種辦法，自然是對的。不幸中國是列強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受不平等條約的

束縛，自己沒有法子關起半邊大門。就是列強大發慈悲（？），讓我們這樣做；可是大門以內，有外人組織的銀行，有外人設立的工廠，有外人開採的礦山，有外人把持的鐵路……也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啊！

「亞泰基」能不能實行呢？事實告訴我們：這條路走不通，在中國目前環境之下，尤其走不通。

二 統制經濟問題

第二種藥方是統制經濟。

統制經濟，名不見於經傳，無疑的也是舶來品。近幾年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看了蘇聯五年計畫的成功、有些眼紅，大擂大鼓的喊出「統制經濟」的口號，以為這種藥方可以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生產與消費的剪刀問題（即一方面，工廠內製造品堆積如山，賣不出去；另一方面，許多窮光蛋需用製造品用，

又沒有錢來買)。

我們知道：生產與消費的剪刀問題，是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之一，這種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無法解決的。因此，某些實行統制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儘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然而結果，祇能走上限制生產或毀滅生產的道路：前者如美國政府用獎金的方法，使六百萬小農減少耕地面積及生產量；後者如英國把整船的香橙拋入海中。這樣大刀闊斧的幹，仍不能使生產與消費適合。鐵面無情的事實先生，已宣告統制經濟的藥方，對於資本主義的「肺癆病」，沒有絲毫益處。

不料我國一些經濟學者，呼吸於統制經濟風靡全世界的氛圍氣中，也想在中國來玩這一套。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要反抗帝國主義有計畫的侵略，只有實行統制經濟以求死裏逃生。於是中國統制經濟的最高機關——全國經濟委員會也建立起來了，在全國經濟委員會指導之下，設立棉業、絲業、食糧等統制委員會，彷彿這些統制委員會即是我們死裏逃生的新堡壘。

現在請看這種新堡壘所得的效果如何？

姑就棉業統制爲例吧！穩定紗價是棉業統制委員會成立後第一步成績。該委員會會認爲紗價跌落的癥結，由於上海交易所的存紗過多，設法把交易所內存紗，分運各地推銷，以謀提高紗價。而對於充塞市場上的外商存紗，却置之不問，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談」。到了紗價提高的時候，外商則乘機拋售，大賺其錢。像這樣的統制，無異爲外商打開銷路，更露骨一點說，無異爲帝國主義統制市場。這種效果，也許是主張統制經濟的人們所不及料。倒霉的中國人，往往所求在此，所得在彼。棉業統制如是，棉業以外的統制亦未嘗不如是。假使說，這是死裏逃生的新堡壘，那麼，在雪亮的事實之前，我們應該承認這種新堡壘已被敵人利用去了。

另一方面，實行統制經濟以普及全國爲原則，這一點中國也辦不到，曾經出現過所謂「省本位的統制經濟」，即是有力的證明。廣東與山西爲實行統制經濟

的「模範省」，前者有三年計畫，後者有十年計畫。在大家得過且過的年頭，肯有計畫的去幹，總算是難得的。不過，統制計畫以省爲單位，姑無論在資源上能否自給自足還是問題，假定資源上勉強可以對付，而把整個的國家造成若干獨立的區域，甚至可說是造成若干獨立的小國家，於政治割據之外，向經濟割據的窄路上走，即是說，向封建時代的舊軌道上走。所謂「省關稅」也應時而興了。在政治與經濟兩重自行分割的形式下，物價抬高又是必不可免的現象，一般人民當然要叫苦連天了。

請不要誤會，我指出統制經濟的害處，並不是說在中國應該採用自由放任政策，對帝國主義有計畫的侵略不加反抗。正相反，我以爲帝國主義有計畫的侵略，是中國經濟的致命傷，如再自由放任，一定自速其亡。目前臨到死裏逃生的時候，無疑的需要一種新堡壘，以作反抗侵略的武器。我祇覺得統制經濟這個武器在目前不合用而已！

三 貿易統制與匯兌管理

究竟應該怎樣辦呢？於是第三種藥方又出現了。第三種藥方有兩味主藥：一是貿易統制，一是匯兌管理。

貿易統制與普通關稅政策不同。現在各國流行的關稅政策，大抵注重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出口；這種辦法，在某種限度內本有相當意義，然而也不免有壞影響。例如：提高出口稅，即加重出口業的負擔，使其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力為之削弱；而提高進口稅，却又加重本國消費者的負擔，直接減低消費者的購買力；這兩點，都對本國不利。貿易統制不一定要提高關稅，甚至可以完全取消關稅，專從貿易本身實行有計畫的統制。

怎樣統制呢？首先應該建立一個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或者叫做對外貿易統制局。一年之內，要進出多少貨？要買賣什麼貨？都由這個機關來決定。買進買

出，都由這個機關來經手。換句話說，就是「貿易國營」。如果做到這一步，不獨一切奢侈品以及本國能夠製造的日用品可以禁止入口，並且集合全國的購買力——每年十萬萬元以上——交給一個代表機關去與外商周旋，可以左右世界市場，取得最優越的條件。十萬萬元以上的定貨單，是誰也看了眼紅的。

與貿易統制相輔而行相須爲用的，恐怕無過於匯兌管理吧！前者是關於商品進出的管理，後者是關於貨幣進出的管理。上面既主張貿易統制，使不必要的商品無從輸入；同時，實行匯兌管理，防止國內現金向外逃避，亦屬急不容緩之事。尤其是中國到現在仍爲銀本位制的國家，常因銀價的變動，引起匯兌上的變動，使本國金融市場爲之動搖。所以，藉助匯兌管理，以謀匯價安定，的確是醫治病態的中國經濟所不可缺的良藥。自美國採取購銀政策抬高銀價以來，海外銀價比國內銀價略高，以致我國存銀大批湧出。在這種情形之下，匯兌管理更不容不列入議事日程了。

可是，在這裏應該討論的，不是貿易統制與匯兌管理本身好不好的問題，而是目前行不行得通的問題。就貿易統制說，如果想曉得一年之內，要進出多少貨？要買賣什麼貨？那就必須使全國經濟各部門具備組織性與計畫性。這一個條件，在支離破碎的中國決談不到。至於禁止什麼奢侈品等入口的話，亦是外交部檔案中那些通商條約所不許可。大家總還記得：在中日互惠協定滿期的時候，我國會把海關進口稅則修改過一次，據說修改的結果是對中國有利的，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公佈的新稅則，又把某些進口貨的稅率減輕了。再就匯兌管理說吧！不錯，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財政部會發表「限制外匯」的辦法，到十月十五日又有征收白銀出口稅的創舉。然而白銀仍不斷的外流，轉口偷運固然是公開的祕密，而現金從外國銀行金庫逃到外國軍艦，大搖大擺的出口，也是外商不可侵犯的「自由」。此外；如貿易上的入超以及賠款與外債的本息，仍然要大批白銀去支付，這是我們對於「友邦」經常的「孝敬」，更不是匯兌管理所能阻止的。總

之一句話，貿易統制與匯兌管理本是良藥，可惜命苦的中國人吞不下咽哩！

四 打破兩重障礙

凡是替中國經濟的病症特別關心的人，看見我把三種流行的藥方否定了，一定要問：中國國民經濟的出路在那裏呢？

一般人在尋不到出路的時候，一個不小心，就跌入失望的深淵裏去。假使失望，我就要說錯了，大錯了！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歷史發展的過程，被這兩句詩描寫盡致了。中國經濟的現勢，雖是「山重水複」，然而未來的遠景，却是「柳暗花明」。渴慕「柳暗花明」的境界麼？歷史先生保證我們可以達到。不過，在達到「柳暗花明」的境界以前，大家應該努力打破兩重障礙。

是那兩重障礙呢？

常聽見說：「中國經濟的本質，對外是半殖民地的，對內是半封建的。」因為是半殖民地，所以到處遇見帝國主義的屠刀；因為是半封建，所以到處碰着封建勢力的毒刺。在這些屠刀與毒刺共同作祟的情形之下，整個中國國民經濟自然被蹂躪得千瘡百孔體無完膚了。不管是財政金融也吧，國內外貿易也吧，民族工農、農業、交通事業也吧，一切經濟部門都有帝國主義的踪跡與封建勢力的爪牙。而直接握在外人手中的經濟機關，如銀行、工廠、礦山、鐵路……更從城市到農村，從農村到城市，佈滿了天羅地網。一切封建勢力無不直接間接與這天羅地網結不解緣，幹「爲虎作倀」的勾當，一般中國人跳來跳去，儘管像孫行者一樣，一個筋斗可翻十萬八千里，終究跳不出如來的巴掌心。我們的祖父，是在這種天羅地網裏面犧牲了的，現在臨到我們本身，還是四面碰壁，無路可走。這樣下去，則我們的子孫——假使叨天之福，自己不致餓死，幸而有子孫的話——未出娘老子的肚皮以前，就注定了要做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下的牛馬。

大家看到這裏，或者像喝了幾杯「白干」一樣，精神有幾分興奮吧！但我仍勸大家再喝一杯「冰淇淋」，把頭腦寧靜一點，思考我們當前的問題。

我在前面已聲明：中國經濟的病症雖然千瘡百孔，但決不會如悲觀論者所想像，以為是羣醫束手的沉痾。可是，同時也應該認識：像這樣外感內傷綿纏百年的病症，也決非用頭痛醫頭痛醫腳的方法所能挽回。我已批評過「亞泰基」，批評過「統制經濟」，批評過貿易統制與匯兌管理，其理由很簡單，正因為這些藥方，都是頭痛醫頭痛醫腳。外科醫生告訴我們：凡病症到了不可不用手術的時候，那就必須忍痛開刀。中國經濟的病症，的確已到了必須忍痛開刀的關頭。怎樣開刀呢？我的答復是：應該把中國國民經濟有機體內兩個毒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割去。在割的一瞬間，痛苦是有的，然而為我們的生存起見，為人們的生存起見，為整個民族的生存起見，不可不咬緊牙關忍受這一刀。

也許有人要說，「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勢力」，不是早已喊得震天

的響了嗎？

是的，這本是「老口號」，但問題不在於口號的老不老，而在於口號的行不行，尤其在於口號的對不對症。我們根據前面的分析，既認定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為當前的兩重障礙，那麼，打破這兩重障礙，就解決了中國國民經濟的出路問題。茶是止渴的，飯是止餓的，人類喝茶吃飯儘管經過了數千萬年，然在渴了餓了的時候，還是喝不厭，吃不厭。口號的老不老，沒有什麼關係，如果「對症」的話，老口號却更有效哩！

打破這兩重障礙，中國國民經濟就有出路了。

五 向重工業的坦途上走

聽到有出路的時候，是否眼前還有失望的暗影呢？我想：那些暗影早已飛到海角天邊去了。這是值得我們歡呼的事。然而有了出路，祇算得勝利的第一步，

換句話說，打倒帝國主義與剷除封建勢力，不過是爭取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前提而已。有了這種前提以後，怎樣發展？向什麼方向發展？更是應該討論的問題。

我在這裏，不打算把問題牽涉太多，祇想就最重要者略講一二。

有些人認為中國「以農立國」，應該提倡農業生產。是的，中國在過去本為「以農立國」的國家，但這祇是閉關以前的事。現在時代已變了，西方資本主義按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了全世界，一切農業國家變成工業國家的附庸。這就是說，從前「以農立國」，現在則「以農弱國」，「以農亡國」了。所以撇開工業而單提倡農業生產，不是我們應該採取的路線。

然則應該怎樣呢？不用懷疑的，應該提倡工業生產，尤其應該提倡重工業生產。中國是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煤鐵不愁缺乏，加緊重工業化，為新時代一切不可少的建設樹立強固的基礎，是最要緊的急務。顯而易見的理由，計有下列數項：

⊙加緊重工業化，可以保證全國經濟脫離帝國主義的依賴而獨立。

①加緊重工業化，可以製造大批農業機器，使全國散漫的小農業，漸漸改造為現代科學化的農業。

②加緊重工業化，可以在短時期內，改進全國交通事業，消滅各自為政的割據局面。

④加緊重工業化，可以鞏固國防，增加反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

有上述四大理由，證明重工業是新經濟結構的骨幹，所以我們在打破兩重障礙——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以後，應該大踏步的向重工業化的坦途上走。

還有什麼懷疑呢？也許有人覺得：現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大抵都是注重工業的，我們提倡重工業生產，是否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競賽」呢？

這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我對這問題的了解是如此：中國決不會有資本主義的前途，因為：①就外部條件說：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逼近總崩潰的時候，在秋風落葉聲裏，不能單獨養出一朵資本主義的鮮花。②就內部條件說：中國在打

破兩重障礙的時候，被剝削者必定得勢，他們得勢了，還讓剝削人的資本主義抬頭麼？所以在這兩個具體條件之下，未來的方向——非資本主義——就可決定了，這就是前面所說的「柳暗花開又一村」。到那時候，東亞大陸上，便出現了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

也許有人認為過於樂觀吧！但是，我要聲明一句，這祇是一種可能（在排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後所爭取的可能），並不是一種現實。如果想把可能變成現實，那就要靠大家努力！努力！再來一個努力！

假使不努力，那就另有一個前途。不努力即是聽其自然，即是讓目前的病態惡化，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繼續飛揚跋扈。結果不可避免的要深深陷入殖民地化的泥坑之中，而不能自拔，印度、安南、朝鮮……都是我們的榜樣。

殖民地化呢？還是獨立自由呢？這就看我們的努力。現在就是努力的時候了。

太平洋民族解放的展望

——太平洋問題十講的結論——

不管是坐在飛機上向全世界飛行一週，或者坐在斗室內向壁上掛着的世界地圖縱覽一次，祇要他的感覺不十分遲鈍的話，總可預知太平洋上快要爆發震撼全世界的暴風雨。目前，天空有黑雲密佈，海面有白浪翻騰，水底與沿岸到處有火山噴口。所有這些證據，無異告訴我們說：太平洋已經不太平了。

太平洋的命運握在誰的手裏呢？處在帝國主義時代，除開蘇聯那塊「和平國土」外，其餘的世界都在帝國主義的鐵網籠罩之中。太平洋及其沿岸，自然也是如此。澳洲，新西蘭，馬來半島，香港，加拿大屬於英帝國主義；菲列賓，關島，夏威夷，屬於美帝國主義；台灣，朝鮮，琉球，庫頁島，滿洲，屬於日帝國

主義，安南屬於法帝國主義；南洋東印度屬於荷蘭帝國主義；這些都是曾經分割好了的殖民地，似乎是物各有主。而尙待分割與正在進行分割的半殖民地，在東太平洋則有拉丁美洲，在西太平洋則有中國與暹羅。有這幾隻「肥羊」擺在面前，那些貪欲無厭的帝國主義——特別是英、美、日帝國主義——安得不磨刀霍霍，準備及鋒而試呢？

加以帝國主義已進到戰後第三時期，在資本主義總危機與一九二九年以來的週期性危機兩重打擊之下，一天天向牛角尖裏鑽。到現在，費盡一切「頭腦托辣司」之力，雖然勉強把週期性危機的深淵跳過，然而前途茫茫仍看不見繁榮的影子。怎麼辦呢？帝國主義者的代表及其御用的策士們，自然想設法割他人的肉補在自己身上，換句話說，依舊要向弱小民族開刀。於是重行分割世界的戰爭，便如箭在弦上了。按照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定律，以弱小民族為犧牲的戰爭，終究是帝國主義必走的一條路。看吧，從前分割太平洋的華盛頓條約早已撕破了，

太平洋的主人——英美日帝國主義不是在海上在空中加緊準備來一次大廝殺嗎？羅斯福好久以前就看到這一點，所以說過：「二十世紀是太平洋時代」。有些新聞記者以至政論家，衆口一詞的贊美羅斯福這句名言，可惜未注意這句名言內面，含有極濃厚的血腥氣。

試問太平洋上各弱小民族，是否一聲不響的靜待宰割呢？事實的答復是否定的。我們知道：自從帝國主義的毒爪伸入太平洋及其沿岸以後，無論所採用的是海盜式的搶劫政策，或是掛着文明招牌的自由貿易政策，都是以剝削弱小民族爲唯一的內容。這些被剝削的奴隸們，陷入飢寒交迫無以爲生的火坑之內，當然要舉起「叛旗」，與殘酷的侵略者爭鬥。一部帝國主義侵略史，同時是一部弱小民族反抗史。至十九世紀之末與二十世紀之初，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即所謂帝國主義階段，那些先進的國家除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推銷商品與榨取原料外，又厲行其資本輸出政策，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銀行交通，鑛山水利，以及若干輕

工業，總之一句話，無非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喪失其獨立性而變成帝國主義的附庸吧了！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天羅地網一經造成，則在這種天羅地網下苟延殘喘的奴隸們，越發被迫到無以生存，越發拚命展開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是與反帝國主義運動分不開的。如果在羅斯福的眼中，就認為二十世紀是太平洋帝國主義戰爭的時代；那麼，在一切被壓迫者的眼中，就要認為二十世紀是太平洋弱小民族解放的時代了。

關於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的事實，真是「史不絕書」。茲以篇幅的限制，且從戰後講起。誰也知道：自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以來，建立了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堡壘，這可說是促進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向前發展的重要酵素。果然，朝鮮在一九一九年即爆發了三月一日的民衆革命；菲律賓從一九二一年以瓊斯法案（The Jones Act）為根據的獨立運動，日見昂揚；中國香港海員亦於一九二一年宣布了反帝國主義的總罷工；同時，墨西哥的革命更從此一年年的高漲。這

樣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運動，遍于太平洋東西兩岸，在戰前實未見過。至一九二五年中國五卅運動發生後，不僅在中國捲起空前未有的革命怒潮，而且以中國的革命怒潮爲中心，使太平洋各方面爲之震盪。朝鮮在少年總聯盟領導之下的反日運動，延續三年之久；台灣的工農組織，是在一九二五——二七年期內開展的；安南的兵工廠工人曾於一九二五年罷工，拒絕修理兵艦，使法帝國主義不能用以干涉中國的革命；荷屬東印度在一九二五年有幾個工業中心的罷工，在一九二六年有爪哇的暴動，在一九二七年有蘇門答臘的暴動。這些鐵一般的事實，說明了中國是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各帝國主義在過去一致鎮壓中國的革命，的確不是偶然的。當中國的革命怒潮過去以後，這即是說，當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暫時消沉以後，帝國主義者是否可以彈冠相慶呢？也沒有這回事。原來，客觀形勢的發展畢竟與帝國主義者的志願相違。未幾，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了，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仍在不斷的躍進之中。就中國言，從一方面去

看，固然祇見到屈辱的事實；從另一方面去看，却更激起我們猛烈的反抗；應該說，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已進到更高的形式。東北英勇不屈的義勇軍，不就是明顯的例子嗎？中國以外的情形，也使帝國主義者不能安枕。朝鮮自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一九三〇年三月，曾掀起一次反日運動的巨浪；台灣一九三〇年十月的武裝暴動，是歷史上無先例的；安南一九三〇年的革命，更表現得有聲有色；南美從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一年七月，已絡繹不絕的發生革命，除巴西與阿根廷屬於大西洋範圍外，如玻利維亞，如祕魯，如智利，都是太平洋東岸的國家；就是准許十二年內完全獨立的菲律賓，也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演了一齣革命的悲喜劇。有這些事實擺在面前，誰敢說二十世紀不是太平洋弱小民族解放的時代呢？

不過，就現階段說，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雖有蒸蒸日上之勢，然而發展不平衡，却是無可諱言的缺點。正因為有這種缺點，所以被帝國主義用慘無人道的屠殺政策各個擊破了。到現在，帝國主義統治太平洋的鐵網，依然保存着。朝

鮮，台灣，安南，菲列賓，東印度……的奴隸仍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中國，暹羅，以及拉丁美洲半獨立國的小百姓，亦不勝其「兔死狐悲」之感。帝國主義的勢力一天不打破，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衆，祇有死路，決無生路。

帝國主義果能維持它的統治到底麼？祇有那些依靠帝國主義生存的人們才相信如此。秦始皇以爲自己的江山，將「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不料無情的歷史證明了這是一種愚笨的幻想。帝國主義支配下的世界，無疑的要與秦始皇的江山一樣。儘管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在發展不平衡的狀態下，授帝國主義以可乘之隙；可是整個帝國主義的統治日趨動搖是事實，在帝國主義加緊進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過程中要引起更普遍的反抗是事實，各帝國主義爲重分世界起見將在自己的營壘內互相殘殺也是事實。照客觀的趨勢去看，歸根結局是對帝國主義不利的。

再從主觀方面考察：從前，帝國主義遇到弱小民族反抗的時候，還可給與某

種讓步以平積憤；現在，帝國主義自己已鑽進牛角尖裏無步可讓了。從前，帝國主義遇到弱小民族反抗的時候，還可賣弄欺騙手段以示拉攏；現在，各帝國主義所玩的老花樣，都被戳穿了。各弱小民族呢？它們在過去的失敗中，多上一次當，就多學一次乖；多受一次痛苦，就多得一次經驗；現在，它們已由自發的反抗變為有目標的運動了，已由孤軍奮鬥的方式變為大規模的聯合而且在指揮統一之下聯合了。這即是說，過去散漫的民族解放運動，快要匯成衝決一切的洪流，帝國主義要想各個擊破就不容易了。

如果有人認為帝國主義今後毫無辦法，那也是錯誤的。帝國主義雖說迫近日暮途窮的時期，却不見得是「束手待斃」。在目前，帝國主義至少還有一個「法寶」可以使用。什麼「法寶」呢？簡單一句話。就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代理政權。帝國主義深知殖民地半殖民地內部已起分化：下層羣衆是與帝國主義不共戴天的，而上層分子則與帝國主義時通款曲，甚至托庇帝國主義的保護以生

存。因爲民族陣綫內有這種分歧，所以帝國主義便採用兩重政策(dual Policy)，以砲火對付下層羣衆，以飴糖收買上層分子，更毒辣的一着，是要上層分子在帝國主義指揮之下，拿住機關鎗向下層羣衆掃射。這種政策的具體效果，就是指使朝鮮人殺朝鮮人，指使安南人殺安南人，指使暹羅人殺暹羅人，指使菲列賓人殺菲列賓人；把這種公式應用到中國，那就是將李鴻章「以夷制夷」的方法倒過來，改爲「以華制華」。殖民地半殖民地代理政權統治之下，似乎更可消弭許多反感。居其實不享其名的帝國主義，都在運用這個「法寶」來維持自己走向沒落的統治哩。

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隸們，受過「血的教訓」，對於「名」與「實」是辨別得清楚的。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展中，反對代理政權的呼聲，也不弱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這即是說，弱小民族的被壓迫者是把國外的敵人與國內的敵人一樣看待的。講到這裏，我們就知道：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已經改變。

用流行的話說，就是：過去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現在，這種重擔子——反帝國主義的領導權——已落到勞苦大眾的肩上了。在太平洋勞苦大眾覺醒的時候，民族解放運動，一定更活潑，更擴大，以不可抗禦的力量向前邁進，一直到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包括直接的與間接的——為止。

我們相信太平洋民族解放的前途是光明的，太平洋未來的主人，不是任何帝國主義，而是一切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被壓迫者，即朝鮮人，台灣人，安南人，菲律賓人……以及中國人。這種預言，比天文家推算「日蝕」「月蝕」尤為準確。不過，「日蝕」「月蝕」屬於自然現象，與人類的努力與否無關，而民族解放則屬於社會現象，須以人類努力的大小為其實現遲速的條件。因此，我們估計太平洋民族解放的勝利，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基本隊伍及其友軍這一條件放在考慮之中的。依照這種論據，我們認為：要保證太平洋民族解放的迅速勝利，不可不具備下述三個條件：

第一，前面講過，中國是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無論從中國遼廓的幅員看，或從中國廣大的人口看，誰都承認所謂太平洋問題主要的就是中國問題。自西力東漸以來，英法美等帝國主義都放一隻腳插進中國，日本帝國主義抬頭後、更以中國爲其蠶食的對象，以致東亞這塊肥美的處女地，成爲各帝國主義的「生命線」。近三四年內，日本帝國主義有獨吞中國之勢，而英美帝國主義則堅持瓜分或共管政策以與日本帝國主義抗衡，可說國際帝國主義的矛盾都集中到中國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祇有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高漲，才可給各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祇有中國推翻帝國主義達到民族解放，才是太平洋各弱小民族解放的先聲。歷史先生加在中國身上的任務是非常偉大的。中國的被壓迫者，應該站在反帝國主義的陣前，與太平洋沿岸的小兄弟們結成聯合戰線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

第二，前面講過，蘇聯是反帝國主義的堡壘，是促進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向

前發展的重要酵素。儘管某些人非難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但不能不承認它是弱小民族的朋友。要擴大反帝國主義運動，當然應該與這個反帝國主義的堡壘取得聯絡。各帝國主義向弱小民族加緊壓迫的時候，也在必要的場合攜手並進，難道陷在帝國主義包圍中的弱者，甘心放棄這支有力的友軍而不知利用嗎？退一步說，就算某些人不了解蘇聯，然它爲帝國主義之敵是毫無疑問的。依照「敵之敵即我之友」的原則，與蘇聯在反帝國主義這一點上攜手，對於要求解放的弱小民族是有利的。

第三，前面又講過，帝國主義採用兩重政策，收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上層分子去對付反帝國主義的下層羣衆，這即是說，利用民族陣綫內部的敵人以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可是帝國主義在國內也有它的敵人，那就是受帝國主義剝削的勞苦大衆，它們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隸同是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犧牲者。在弱小民族未達到解放的時候，帝國主義國內的勞苦大衆是受壓迫的，反過來說，也是一

樣。所以，這些勞苦大眾是弱小民族天然的友軍。近幾年來，它們推翻帝國主義政府的革命運動，正在潛滋暗長；有了這支友軍從內部給帝國主義以打擊，則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就容易進行，至少是帝國主義不能用全力來壓迫弱小民族。如果被壓迫民族今後與這些勞苦大眾在戰略上有緊密的聯合，我想：帝國主義在內外夾攻之下，是一定要棄甲曳兵而走的。

這三方面，在反帝國主義運動中，有其聯繫性，帝國主義者的代表及其策士們是知道的。所以，帝國主義在鎮壓太平洋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鎮壓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時候，一方面組織反蘇聯的戰爭，另一方面加緊防止國內的革命。話雖如此，然而，「客觀形勢的發展，畢竟與帝國主義者的志願相違」。我們瞧着吧！我們瞧着征服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終究要在弱小民族抬頭的時候，走進坟墓裏去！

中日關係的前途

——中日問題講話的結論——

「最近幾個月之中，又有一個好聽的新口號出現，叫做「調整中日關係」。這個口號出於日本的廣田外相，在幾個月之中，又差不多成爲報紙上的一個最時髦的名詞了。」

——胡適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

當中日關係正在「調整」的今日，不，當中日關係加倍緊張的今日，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東亞這一隅，似乎是用最大的注意來觀察中日關係的變化。

試問中日關係將有什麼變化呢？或者說，中日關係的前途怎樣呢？這是因各人的立場不同而異其答案的。

假使你問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例如駐南京總領事須磨，他必定說「中

國唯有在與日本維繫或與日本作戰的兩途中選擇其一」。所謂「維繫」，照須磨的意思，就是「有求必應」，就是誠心誠意的投降。所謂「作戰」，當然不是鼓勵我們「抗敵」，而是表示他們以暴力侵略的決心，否則「如退一步即無異總退却」。言外之意，大抵是無論維繫也好，作戰也好，未來的中日關係應該是宗主國或殖民地的關係。

假使你問的不是須磨而是室伏高信，他必定裝出同情中國的樣子，說什麼「目前的事態，當然應該解決，我在這一點覺得焦心」。怎樣解決呢？他是希望日本有一個大政治家，「理解日本的真正使命，不是侵略鄰國而是援助其解放與自由」。「中國國民與日本國民攜手而立於世界舞台上的時候一定要來的。……我們應該在東方諸民族的自由平等的立場上結合起來，使世界為之戰慄。」（見獨立評論一九二號）他認為中國的敵人，不是同文同種的鄰邦日本而是西歐帝國主義。所以主張中日攜手共同反對西歐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英國。這顯然是替

日本帝國主義解脫侵略中國的責任，要把我們全國仇恨的對象移到英國身上。他的夢想是中國跟在日本的屁股後面，爲日本的利益去反對英國。

假使你向這些日本人攀談，而特向胡適先生請教。他必定說：「中日關係所以需要調整，正因爲四五年來造成的局勢是一個仇恨的局勢。……」中日關係的調整「唯一可能的意義是要解除這個仇恨的局勢，以謀在不太遠的將來，可以逐漸做到合作與親善的地步」。試問怎樣才可解除這個仇恨的局勢呢？胡適先生曾經站在「中國國民的立場」提出過調整中日關係的七項先決條件如下：（見獨立評論一九七號）

（一）廢止塘沽停戰協定，取消非戰區域。

（二）宣告所謂何應欽梅津協定的無效。

（三）日本政府自動的放棄辛丑和約及其附帶文件所規定的平津鐵路地帶駐兵的特權；日本大使館遷往南京之後，所有日本駐屯關內的軍隊一律撤退回國，以爲辛丑和約其他簽字國的首倡。

(四) 宣告去年六月的察東協定無效，撤退察哈爾境內的「滿洲國」軍隊。

(五) 禁止華北各省以及福建境內一切運動偽自治的活動。

(六) 日本政府自動的取消中國境內的領事裁判權，以爲歐美各國的首倡。

(七) 統一外交，由日本政府宣告一切凡非兩國正式外交全權代表所簽訂的文件完全無效。

胡適先生深信這些條件可以在中日關係史上開闢一個新時代，可以打開一條新路。

儘管從東亞侵略者去看，胡適是一個「排日宣傳家」或是一個「學生抗日運動的指導者」。然而他所提出的七項條件，沒有談到被侵佔了的東四省。無怪徐日洪先生對此大大不滿，在致胡適之先生的公開信裏說：「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最大的原則應是收回已失土地，這也正是「中日仇恨」的根本癥結。如果忽略了這點，那麼所謂七項條件便會變成一張「賣身契」，把東四省的土地、同胞來做這七項條件的交換品。」（見獨立評論二〇〇號）

現在的事實告訴我們，就是胡適先生這樣「慷慨」，願意拿東四省去交換這七項條件，結果，日本並未照胡適先生的希望，自動的放棄什麼，自動的取消什麼，而是自動的在華北進攻，自動的在華南搗亂。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便知道：所謂「調整中日關係」，是一種新幻術，是一種新烟幕彈。

以上三種答案，——須磨的，室伏高信的，胡適的，代表三種立場。須磨主張繼續暴力侵略，把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室伏高信則擺出「偽善」的面孔，玩弄「自由平等」的詞句，要中國在反對西歐帝國主義的陣線上與日本攜手；也是日本帝國主義求之不得的。（室伏高信雖明白指出英國為中國的敵人，可是心裏也許是希望中國在反蘇的陣線上與日本合作吧！）我們的胡適先生呢？儘管他聲明站在「中國國民的立場」；然而放棄東四省不提，不見得適合大多數中國國民的意見，至少已不能代表徐日洪先生之流的意見。退一步講，就算胡適先生的七項條件祇是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

但胡適先生沒有提出保證這些條件實現的方法。難道多發幾次「敬告日本國民書」，就可以使日本當局改變態度麼？最近在第六屆太平洋學會上，胡適先生說：「日本的最後目標，顯欲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國」。這不能不說是胡適先生的觀察力已進一步。同時，日本代表芳澤則以「人口膨脹」的鬼話為理由，說明日本向華發展，不能中止。這句簡單的話，似乎把胡適先生過去的希望打破了。然則中日關係的前途，究竟怎樣呢？

我以為這個問題，決不像胡適先生所想的那麼簡單，也不是室伏高信的花言巧語所能迷惑，更不是須磨之流以咄咄逼人的氣燄便可如法泡製。老實講：中日關係是世界政治漩渦裏的中心問題。特別是太平洋政治漩渦裏的中心問題。目前的中日關係，是現存的各種對抗的勢力所決定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五年來，站在相當的優越地位，從內部，從外部，尤其是從中國，未受到特殊的打擊；所以自「九一八」以後，向中國進攻，如入無人之境，這是千真萬確的事

實。假使我們要根據事實來估計中日關係的前途，那就應該把決定中日關係的各種勢力加以正確的分析，並應該注意這些勢力在未來，有無變化？有何變化？

讓我先從太平洋方面講起吧！大家知道：太平洋上幾個巨頭，除蘇聯係以另一姿態出現外，就是英美的三角關係。美國早以太平洋主人自居，它在「九一八」事變初起時，頗想拉英國共同干涉。但因英國支持日本，以致未能如願。近來美國在表面上似乎沈默，然在實際上却在厲兵秣馬，積極準備。這正如美國代表費爾特在太平洋學會所宣稱：『一九三五年美國為推行其遠東政策，費去金錢在六萬萬元以上，大部分係用於擴充海軍，藉以抵制日本的威脅。』又說：『美國在太平洋維持強大的海軍，專為對付日本，已非秘密。此外，美國在遠東駐軍亦年費數百萬元。』（八月二十六日約桑密地電）這證明美日矛盾無法消釋，遲早要比一下雌雄。英日呢？本是一對老盟友，它倆在反蘇反美的立場上，向來藕斷絲連。所以在日本進攻中國的過程中，英國大抵是支持侵略者。不過，當日本

勢力伸入華北的時候，影響到英國的利益，這位資本主義之王，總覺得不痛快。不久以前，李滋羅斯在東京碰壁，更使英國紳士啼笑皆非。最近因英蘇關係好轉（英蘇海軍協定與英蘇商務貸款協定成立）的刺激，英日協調的空氣又忽然濃厚起來。但據一般觀察，如果日本始終封鎖中國的門戶，則英日關係是要惡化的。至於蘇聯，在遠東方面常與日本衝突，日本也高張「反赤之旗」，藉此求得資本主義各國的諒解，甚至蘇聯數次提出互不侵犯條約也被日本拒絕。日蘇戰爭，恐怕是無可避免的了。從這三方面——美日、英日、日蘇——分析，日本在國際關係上是孤立的。固然，近來，日德同盟已證實；可是正因為已證實，所以反對德國的國家，也起來反對日本；因此，日本仍陷於孤立的圍牆之中。倘若日本繼續侵略中國的話，則樹敵越多，從國際方面所受的壓力就越大。誰也不相信日本能夠蠻幹到底？這是決定中日關係的一種勢力。

再從日本內部來看，上層勢力——如軍閥、財閥、元老、重臣等等——在對

華政策上的紛歧是大家皆知的，這一點用不着多說。我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日本的統治者，怎樣強調剩餘人口問題，無論他們說明對華侵略是怎樣為大衆謀利益；然而鐵面無私的事實，却證明日本帝國主義五年來在滿洲與華北所進行的掠奪戰爭，對於日本國內的大衆，是有害的。按照官方消息，日本陸軍的損失，死者達四萬人，負傷及累病者達十七萬一千三百九十八人，（見八月二十六日華美晚報第二頁）這當然是大衆遭殃。其次，就軍費說，從一九三一年的四萬五千四百萬元（占預算總額三〇・八%）增到一九三六年的十一萬九千二百萬元（占預算總額四八・六%），無疑的落在大衆的肩上。加以在通貨膨脹的景氣下，生活費指數，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一五八・六（以一九一三年的數字為基準），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已增加到一八四・九。而勞動者的實質工資指數，恰恰與此相反，在相同時期內，從一六四・六降落到一三八・五。可見日本大衆生活貧困化，一年年加深，誰說日本大衆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利益分得開呢？假使日本對

華蠻幹到底的話，那麼，就算在國際方面不引起火併，而藏在日本大衆底層的炸彈，到了某時期，一定要炸毀櫻花島上的金字塔。這是決定中日關係的又一種勢力。

可是，最重大的勢力，却是我們自己，却是我們全國上下的對日態度。在過去，因爲一貫的不抵抗，因爲一貫的逆來順受，任憑侵略者「要怎樣，便怎樣」。敵人不折一兵，我國失去數省，開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創例。被侵略者既像馴羊一樣，伏在虎狼面前，靜待宰割；則站在局外的第三者，也無從援助了。到現在，我們受過長期的血跡淋漓的教訓，都知道非抗敵無以生存，都知道非團結不能抗敵。所以從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所開始的救亡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洶湧澎湃的怒潮，建立了日益展開的民族陣線；一向爲民族獨立而奮鬥的人固然願爲前驅，就是思想不同，信仰不同，甚至彼此間有深仇宿怨的人，也在「抗敵第一」的前提之下，一致攜手。這一點，確是中華民族新生的契機。如果我國

當局實踐「保持領土主權完整」的諾言，在「最後犧牲」的關頭，發動全民族的抗戰，我想：在以大礮對大礮以飛機逐飛機的抗戰之中，侵略者一定大受打擊，至少它的侵略計畫是不能順利進行的。這樣一來，不僅在國際方面的壓力要加到日本身上（儘管這種壓力有一定的限度），並且日本大衆底層的炸彈也要乘機爆發了。這是決定中日關係的主要勢力，即是決定一切的勢力。

有了這些不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滿可以推進目前的中日關係打開僵局，滿可以保證未來的中日關係轉入新的階段。祇要我們有決心，有勇氣，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打倒的時候，室伏高信所說：「我們應該在東方諸民族的自由平等的立場上結合起來」這一句預言，才是現實而不是幻想。不過應該修正一句，我們這樣結合，決不在「使世界爲之戰慄」，而在「使世界進到和平」。

中日關係未來的前途，就是這樣，也祇有這樣。

此外，是否有別種前途呢？我不想再嚙嚙，在這裏，祇引上海大陸報一段論文以供參考！

「今後中日兩國關係之前途，不出下列三種：一、雙方基於平等原則，重修舊好；二、繼續猜疑仇視之現狀；三、仇恨日深，最後兵戎相見。自前任大使有吉辭職歸國及外相有田選任以還，中日外交陷於停頓狀態者凡數閱月。自川越大使蒞任，始恢復常態，而兩國之糾紛，今後或可漸趨和緩。惟就此時情勢而論，欲冀雙方基於平等原則，重修舊好，恐不可能；即日方之平民政治家及商人，亦並不以當局之向大陸邁進爲可慮。中國人民，雖不乏希望兩國言歸於好，惟爲輿論所不容，恐蒙賣國之辱，不得不力守緘默。而日本人民，固有希望其政府對華採取和平之政策者，而又憚於軍事當局之跋扈，藏之中心，不敢或宣。由是中日雙方不易接近之缺陷，其深叵測。若復如歷來之互相仇視，冰炭不容，則兩國居民，齟齬時起，一星之火，可以燎原，禍患之來，有不堪言喻者。潘陽之被佔，瀋陽之爆發，固無不始於機芥之嫌疑也。」

大陸報記者的意見，自然與我們不盡相同，但他鄭重指出：「雙方基於平等

原則，重修舊好，恐不可能」；而在「互相仇視冰炭不容」的局面下，最後必以「兵戎相見。」

現在綏東正在告警，「自成都事件發生後，中國全國已充滿反日情緒，類似易致燃燒之氣體，一經點燃，即可爆發。」（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語）我們遇到這樣嚴重的時期，應該怎樣認識中日關係的遠景來決定當前的態度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前途

祇要不是眉毛下沒有長着眼睛的人，大抵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目前吧！祇要不是神經系統完全麻木的人，大抵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火中以決定中國的命運吧！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的討論，年來所發表的意見很多，勿須再來「畫蛇添足」。在這裏，我擬專就一般人時常提到的問題——假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則中國的前途怎樣？——略加剖析，并附述個人的管見。

在國內流行的時論中，有一種以爲：近三四年來我們在帝國主義者鐵騎蹂躪之下，「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大有「抱薪救火，薪不盡則火不滅」之勢。當黑暗吞蝕一切的時候，沒有一點熹微之光。如果世界大戰一經爆發，中國更是遠東的戰場。我們目前苟延殘喘的「國命」，一定要在礮火中葬送。甚至有

些人在「國步艱難」之中，看見大家不爭氣，而漢奸又層出不窮。於是牢騷滿腹，斷定「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這是百分之百的悲觀論調。

另一種時論，却與上述者相反。這些人以爲：中國所以弄得焦頭爛額，完全由於帝國主義者之賜。在平時，帝國主義者的統治是不易動搖的，這即是說，在各帝國主義者和平共處的時候，我們很難翻身。只有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不問大戰的形式怎樣？——各帝國主義者勢必陷於手忙腳亂的窘境中。我們抓住敵人的弱點，才可出奇制勝。目前祇好等着，等到各帝國主義者殺得不能開交的時候，中國再與他們算總賬吧！這種論調顯然是樂觀的。

究竟那一種推測對呢？我相信真理常在二者之間。悲觀論者的眼中，彷彿是「天下事不可爲」，全中國人有如判決的死囚，祇待綁赴刑場，梟首示衆。這種「坐以待斃」的心理，無異「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是對帝國主義者有利的。而樂觀論者則又走向另一極端，一切留待未來解決。好像在目前除了

「等着」以外，簡直不能做什麼。從這種觀點出發，遇到某一敵人單刀匹馬來壓迫我們的時候，自然要忍耐，要鎮靜，反正以後還有算總賬的一天。拋棄當前的任務不幹，而以未來的渺茫不可知的幻想自慰，這與那些出賣靈魂的牧師，開口「天國」，閉口「天國」，是一樣的欺騙，歸根結局也對帝國主義者有利，

我不是悲觀論者，亦不是樂觀論者。我常常記着：斯賓諾沙所說：「不哭不笑加深了解」這句名言，認為中國的前途，既不如悲觀論者所想像的祇有死滅，復不如樂觀論者所期待的祇有光明，目前正處在死滅與光明的歧路之中。究竟向那一方面走？須由我們自己來決定，須由我們自己用最大的努力來決定。如果中國人大家懷着「坐以待斃」的心理，得過且過，不思振作，甚至一部分人，雖知國亡無日，却利用現有的權勢，拚命搶錢，預備在國亡以後去過富裕的猶太人生活。那就真是「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了。如果中國人大家有目的，有決心，為未來的運命爭鬥，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結成堅固的民族戰線。同

時，懂得一切須從現在幹起，「今日能做的事，決不延至明日」。對於外來的侵略者，不妥協，不退讓，更不投降。有鎗者穩拿着鎗，有鋤者緊握着鋤，……全國一致的把民族利益擺在第一位。誰佔領我們的領土，就給誰以迎頭痛擊；誰與敵人勾結一氣，就把誰當敵人看待。我們在世界大戰的前夜是這樣準備着，一到世界大戰爆發，更趁着各帝國主義者手忙腳亂的時候，或者正確一些說，趁着帝國主義者國外的敵人與國內的敵人總動員向帝國主義者內外夾攻的時候，我們就絲毫不猶豫的與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勢力，訂立攻守同盟，從遠東方面向帝國主義的堡壘衝鋒，則困在核心的帝國主義者，在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共同打擊之下，就必不可避免的要變成俘虜了。固然在我們衝鋒的過程中，犧牲是有的，但不經過犧牲，又怎能產生獨立的自由的中國呢？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使中國萬劫不復，也可使中國一鳴驚人，問題在於我們有無充分的準備？能否利用快要到來的千載一時的機會，與帝國主義者算總賬？

二十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本是弱者抬頭的黃金時代。當時遠東方面並未成爲帝國主義者的戰場，中國要翻身比現在更容易。不幸這種黃金時代被國民公敵的袁世凱出賣了，他不在帝國主義者火併的時候，爭取民族解放，而祇圖謀個人的利益，由總統而「高陞」——帝制自爲。我國外交史上大書特書的二十一條，就是這個遺臭萬年的獨夫出賣民族利益的證據。雖然他的皇帝之夢，被民衆的鐵拳打破，但是却把中國翻身的好機會，白白的斷送了。

我國在歷史上既鑄成大錯，加以戰後十餘年來，各帝國主義者又向我們開刀以補償其在大戰中所受的損失，弄得我們不僅體無完膚，並且枷鎖滿身，連手足也不能動彈。我們如果要生存，如果不願做奴隸，除了與帝國主義者肉搏以打碎這些枷鎖外，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們翻身的機會，已被袁世凱斷送了，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成熟，爆發祇是時日問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不可不記取歷史上這種慘痛的教訓，一方面要勇氣百倍的

高舉反帝國主義之旗，一方面要小心翼翼的隨時隨地「謹防扒手」，謹防帝國主義者御用的扒手。現在居然有人勸我們大家「到堪察加去」，試問被敵人四面包圍的中國，何處是我們的堪察加呢？顯然的這種說法不過是「小扒手」混亂視線的一種烟幕彈而已。

或許有人覺得：我們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翻身，這種任務不是太難麼？一點不客氣，這種任務確是太難！然而中國是帝國主義矛盾集中的焦點，中國問題即是世界問題。如果中國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圓滿的解決，這即是說帝國主義支配中國的鐵網被我們撕破，則在中國達到獨立自由的勝利中，帝國主義在世界的其他部分也不容易立足了，可見中國的前途是與全世界的前途分不開的。我們爲中國而爭鬥，即是爲全世界而爭鬥。這種神聖的任務，是中國人不能夠逃避的，也是不應該逃避的。

楚囚對泣的悲觀，燕巢危幕的樂觀，都非應抱的態度。怎樣好呢？我們要

「不哭不笑加深了解」，了解中國的前途，了解中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以及在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應該做些什麼。

一九三五年七月

世界和平還能挽救嗎？

濃厚的戰雲瀰漫着全世界，特別是在西歐與遠東。

這些濃厚的戰雲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第一是從日本帝國主義的礮口裏冒出的。自「一九一八」以來，遠東瘋狂的侵略者，佔領滿洲，進攻上海，奪取熱河，蠶食冀東察北，且進而吞併華北五省，最近又在綏東和福建方面開刀，以多割一樹爲快，整整五個年頭，遠東的礮聲沒有停歇過。固然，因我國政府在「一二八」後未加反抗，到現在，還祇有義勇軍與敵人肉搏，所以戰爭的範圍，停滯在滿洲一隅之內；可是從日本帝國主義的礮口裏所冒出來的黑烟，早在遠東的天空構成「陰霾蔽日」的局面。

第二是從意帝主義的礮口裏冒出的。自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起，「新羅馬帝

國」的遠征隊正式向東非大肆屠殺。在「黑炭頭」的頑強抵抗之下，那裏就不是「陰霾蔽日」，而是「野火燎原」了。到一九三六年五月初阿皇塞拉西出走之日止，已足足鏖戰了七個月。東非的天空不僅有火光照耀，並且有毒氣翻騰。這些都是黑衫宰相「宣揚文明」的結果。同時，在意阿戰爭的過程中，實利主義者的英國紳士也挺身而起，想與黑衫宰相比雌雄。於是紅海地中海一帶的戰雲又與東非的「火光」「毒氣」相照應，幾乎要鬧出更大的亂子。目前，英意關係雖已和緩，意阿戰爭雖已轉到另一形式，然而東非的戰雲是並未消逝的。

第三呢？當然與德帝國主義的礮口有關係。自希特勒跳上德國政治舞台後，立刻使歐洲的風雲變色。一方面是蒂森克虜伯等支配下的重要工業，開足馬力，製造殺人器械；另一方面是這個唱黑花臉的獨裁者，先後撕破凡爾賽和約與羅迦諾公約，準備用大礮、飛機、毒氣、死光來完成「第三帝國」的好夢。所以德國截至現在為止，雖未從礮口裏冒出黑烟，可是由那些製造殺人器械的烟囪所吐出

的黑烟，凝結在「第三帝國」的邊境上，已成爲濃厚的戰雲了。

上面的事實告訴我們：日本、意大利、德國這三個帝國主義是戰爭的製造者，是和平的死對頭，是吞蝕人類吞蝕世界的大怪物。

在過去，它們是各唱各的「獨脚戲」；有時因機會不湊巧，也發生過衝突，（如德意在對奧問題上。）現在則由「獨脚戲」而改串「雙簧」了。日德同盟已經不是謠言，而是百分之百的事實。德意關係近來也密切得多，特別是德奧協定成立後，這兩個「法西同志」已經攜手合作。能夠合作到什麼程度？能夠合作多少時間？本值得精密研究，但就目前而論，總算釋嫌修好了。在西班牙人民陣線與法西勢力的大搏鬥中，德意都一致幫助叛軍，都想扶植法西勢力在意卑里亞半島抬頭，恐怕就是德意合作的第一次表現吧！

它們在唱「獨脚戲」的時候，已把西歐與遠東的局面，鬧得一塌糊塗：現在由「獨脚戲」而改串「雙簧」，德國與日本在蘇聯的東西邊境上遙相呼應，而德

國與意大利又在歐洲大陸上狼狽爲奸，在這種情形之下所造成的戰爭危機，自然比從前要嚴重若干倍。所以一般愛護和平的人，都覺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如箭在弦上。

*

*

*

*

戰爭危機的嚴重性，是沒有人否認的；在這裏，應該再進一步分析戰爭危機的根源，並討論這種戰爭危機是否可以延緩下去或設法避免？

戰爭危機的根源是什麼呢？扼要的說，現在的戰爭危機是由世界經濟危機而來的，並且是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洪流中，幾個金融資本控制一切的國家，爲維持自己的殘喘起見，不得不進行潑辣的經濟戰——如關稅戰，貿易戰，貨幣戰。當它們在經濟上短兵相接的時候，其中某些先天不足的國家，就愈不能支持，而引起內外矛盾的尖銳化。因此，在「狗急跳牆」的情形之下，便喊出戰爭的口號，要求國外市場，要求殖民地，要求「日光之下的地盤」，甚

至故弄玄虛，要求什麼「國家光榮」的滿足。所有這些說法，祇有一種意義，就是：要求重分世界。像日意德這三個法西國家即其典型的代表。

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經濟戰中，比較應付裕如的國家，相互間的利害關係也極其複雜，如英美在全世界的爭霸，英法在歐洲的不調和，使這些以維持現狀為有利的列強，不能採用一致的步調去反對侵略者。在這一點上，常使日意德有乘間抵隙的機會。日本在遠東的橫行，意大利在東非的勝利，德國在歐洲的飛揚跋扈，都是英美與英法不能合作所促成的。同時，在兩個體系對立的現世界中，資本主義各國與蘇聯之間，有基本的矛盾存在着。因此，瘋狂的侵略者——尤其是日德，也高舉「反赤之旗」，博得資本主義國家的默契與諒解，而售其「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陰謀。結果，日本的「皇軍」未踏進蘇聯的邊疆，只見中國的領土一大塊一大塊的喪失；同樣，德國的褐衫隊距離烏克蘭很遠，而從萊茵到但澤，已經「草木皆兵」了。這些侵略者進一步，英法就讓一步；英法讓一

步，侵略者又進一步；在一進一讓的過程中，戰爭危機便一天天擴大了，以肉餉虎，不僅不能填滿虎的慾壑，終究要被虎咬傷。過去的事實，難道還不夠明白嗎？

是的，戰爭危機在日意德侵略與英美法優容的條件之下，一天天擴大是事實，然而到現在，大規模的戰爭尚未爆發，也是事實。這又如何解釋呢？

問題是這樣：橫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個世界而是兩個世界。資本主義世界，到處是戰爭的火種；而與資本主義對立的另一世界（蘇聯），却充滿了和平的呼聲。戰爭準備的急進與和平運動的昂揚，是目前國際形勢的特徵之一。這一點，的確與一九一四年的國際形勢不同。我在歐洲兩大陣線的檢閱一文中，曾寫過下面一段話：

「蘇聯對外以和平政策為骨幹，這是與社會主義國家最高原則不可分離的政策，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不需要爭奪市場，不需要剝削殖民地，不需要擴張領土，所以不需要戰爭，所以始終站在反

侵略的前線，而貫徹其保護世界和平的任務。這種和平政策，一方面固然與蘇聯自己的經濟建設有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却與全世界一切被壓迫者（包括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有利，甚至對某些主張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國家也有利。因此，蘇聯和平政策，近數年來，在遠東，特別在西歐，得到廣大的同情者。」（現世界創刊號）

假定這種觀察不錯，我們應該認定：蘇聯在西歐方面與十一個國家簽訂互不侵犯公約，尤其是與法國簽訂互助公約，把全歐洲擁護和平的力量（如小協約國與巴爾幹協商國）都吸引到自己的周圍，奠定了集體安全制度的基礎，使歐洲的侵略者不敢馬上挑起戰爭。這是鐵般的事實。在遠東方面，蘇聯向日本迭次提議簽訂互不侵犯公約雖被拒絕，而在一九三三年十月曾與十六年來不通聘問的美國復交，使遠東緊張的局勢為之緩和；一九三六年三月又與外蒙簽訂互助協定，使侵略者不能不稍存戒心。這又是鐵般的事實。在蘇聯和平政策的勝利中，建立了與侵略陣線對抗的和平陣線；於是主張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以及全世界的弱小國

家，都與蘇聯站在同一陣綫上，彷彿築成一道反侵略反戰爭反法西斯蒂的萬里長城。大規模的戰爭，到現在所以未爆發之故，簡單言之，就是如此。

＊

＊

＊

＊

今後怎樣呢？更具體些說，在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對抗的形勢下，戰爭危機是否可以延緩下去或設法避免呢？

一般說來，戰爭危機本是從資本主義矛盾中發生出來的。跟着資本主義矛盾的展開，一定要演成大屠殺的慘劇。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例子。不過在資本主義世界已經分裂的時候，在與資本主義對立的另一世界已變為和平堡壘的時候，在全世界一切反戰爭的力量已結成和平陣綫的時候，假使和平陣綫十分強固足以壓倒侵略陣綫的話，則戰爭危機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也當延緩下去。一杯之水固然不能撲滅車薪之火，但用千杯、萬杯、十萬杯、百萬杯之水，噴在車薪上面，火勢縱大，終究是要撲滅的。侵略陣綫與和平陣綫的鬭爭，其情形正與此同。

講到這裏，或許有人要問：在目前，已結成的和平陣線是否可以壓倒侵略陣線呢？

我在前面引過的歐洲兩大陣線的檢閱一文中，曾說到：「就歐洲範圍內而論，且就現階段的歐洲範圍內而論，不管從那一方面說，和平陣線都占着優勢。」同時，我又指出兩點：一是歐洲的侵略陣線正在努力拉攏夥伴；二是決定歐洲全局的中心力量是英國。根據這種估計，我很同意杜特 (R. P. Dutt) 的說法，假使能夠締結一個與法蘇公約相同的英蘇公約，則在歐洲就可制止法西的侵略戰爭了。說到遠東，和平陣線的薄弱是無可否認的。在中國不抵抗的情形之下，在英美隔岸觀火（有時且向日本送秋波）的情形之下，侵略者越發猖獗起來。這種事實的教訓，不僅中國民衆牢牢的記着，就是英美當局也不能不深深反省，幡然變計。這即是說，遠東和平是蘇聯、中國以及英美等主張維持現狀的國家所共同需要的。假使在蘇蒙協定的基礎上，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以與瘋狂的侵略者

對抗，則遠東的侵略戰爭也會被制止的。所以無論就西歐說或就遠東說，擴大和平陣線，鞏固和平陣線，使分散在全世界的和平勢力，團結起來，把幾個侵略國包圍着，像鐵欄包圍老虎一樣，它就要繼續咆哮，也無法跳出鐵欄之外。這樣的確可以延緩戰爭危機。

也許有人要這樣懷疑吧！前面既講過：英美與英法因本身利害關係的複雜，不能採用一致的步調去反對侵略者，誰敢保證它們今後可以結成和平陣線呢？是的，我們把和平事業的重擔子，完全加在各國政府的肩上，自然是不對的，甚至可說是一種「幻想」。可是，各國政府如深深感到侵略者的威脅，同時又在本國愛好和平的民衆共同壓迫之下，則從優容的態度，轉到積極反對的態度，再進而參加和平陣線，也不是不可能。法蘇互助公約就是真憑實據。近數月來，法國人民陣線的勝利，不僅使法蘇關係益加鞏固，並且給各國民衆以新的刺激，新的推動，使大家一致奮起，要求和平；一九三五年英國薛西爾爵士所號召的和平投

票，參加者達一千一百萬人，會把雷爾頓伐爾分割阿比西尼亞的提案打消，這是衆所周知的事。一九三六年六月，英國在黎芝（Leeds）所開的和平會議，出席代表有七百五十人（約包括三百個團體的代表），使英國的和平運動又進一步。同月，中歐各國也在布拉格（捷京）舉行中歐和平會議，共謀保障中歐與巴爾幹半島的安全。八月十五日在加利福尼亞開幕的第六屆太平洋學會，有十一國代表參加（蘇聯係初次派代表），最重要的議題是：設立維持太平洋和平的國際機關及締結太平洋各國的互助與不侵犯公約。近來這些和平運動的支流已有匯合爲一之勢。從九月三日到六日在布魯捨爾（比京）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有四千餘人的代表列席，可見世界範圍內的和平運動，正在迅速的發展；可見要求和平不僅是各國大眾的呼聲，並且是全世界各政派各階層目標一致的行動。在這樣情形之下，一定促成各國政府重新考慮它的政策，一定壓迫某些國家的統治者，在不妨害本身利益的前提之下，參加和平陣線。倘若英國人民陣線獲得相當勝利，壓迫

保守黨政府在西歐與法蘇攜手，反對德意在歐洲的侵略，在太平洋與蘇聯或美國攜手，反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那時天空中瀰漫着的戰雲，總會比現在稀薄得多吧！

總之：就目前各方面情形加以嚴密的考察，我們應該確信世界和平尚未到山窮水盡之境。祇要愛好和平的國家——特別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大家手拉着手，肩挨着肩，用集體的力量反對侵略，一定能夠從戰爭危機中把世界和平挽救出來。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國能跳出半殖民地嗎？

——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的結論——

中華民族現在正走進一個極嚴重的歷史階段上。

從鴉片戰爭到現在，不滿百年。在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以前，我們是東方的「泱泱大國」，西方的黃鬚碧眼兒，把中國看做「天堂」，我們的祖先，也「想像自己是住在天堂上」。當然啊！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而又處在自給自給的封建經濟時代，所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大家有飯吃，大家有衣穿，大家過太平生活，這不是「天堂」是什麼呢？

可是不幸得很，我們在封建經濟的樊籠中翻筋斗，人家已舉起脚步跑到我們

的前面去，這即是說，人家已脫離封建經濟時代進到資本主義經濟時代了。我們依舊是「抱殘守缺」，人却家要按照資本主義的模型來改造世界。無論我們歡迎也好，拒絕也好，資本主義的巨靈之掌，終於要敲破中國的大門。於是鴉片戰爭——西方帝國主義第一次進攻中國的戰爭，就在東方的「天堂」，留下了鮮紅的血跡。

假使說鴉片戰爭是我們第一次「國難」的話，那麼，自第一次「國難」以後，第二次，第三次……「國難」都接踵而來。舉其最重要者為例，則有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五八——六〇年），中法戰爭（一八八四年），中日戰爭（一八九四年），八國聯軍之役（一九〇〇年）……一直到「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甚至在表面上似乎與中國無關，如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年）與日德戰爭（一九一四年）之類，其實遭殃者還是「咱們貴國」。像這樣充滿了血跡的歷史，真使我們想起來沉痛，說起來傷心！在重重「國難」之下，我們歷代祖先

與洪水爭門，與猛獸爭門，與異族爭門，辛辛苦苦所造成的「天堂」，便因西方的與東方的這一大羣強盜，進門搶掠，而變成「地獄」了。從前是「自足自給」，現在是破產，是失業，是饑餓，是逃亡，是無家可歸，是不知死所，一句話，四萬五千萬人都像牛馬一樣，讓人家寅時割一刀，卯時割一刀。

照這樣看，似乎我們在「國難」中打滾，快有一百年的長時期。在這個長時期中，侵略者進一步又進一步；我們呢？恰恰相反，總是往後退，現在已經沒有退路了。在鴉片戰爭的時候，甚至在中日戰爭的時候，侵略者祇想從中國多搶掠一點東西，並不要把中國一古腦兒吞下去。到八國聯軍的時候，瓜分中國的計畫雖已列入議事日程，然而在強盜們同床異夢的情形下，畢竟瓜分不了，所以我們很僥倖的從虎口裏逃出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的「友邦」未嘗不企圖獨占中國，可是因它自己的羽毛未豐，當時祇能適可而止。一到大戰結束，它的獨占中國之夢也被現實打破了。在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二二年）以後，中

國便逃脫「獨占」的血口，而跌入「共管」的陷阱中，在「門戶開放」的形式下，苟延了十年。不幸到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西方帝國主義無暇東顧，而我們的「友邦」，——不，我們的侵略者，就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舉起「九一八」的烽火，吞了滿洲不算，吞了熱河不算，吞了冀東不算，吞了察北不算，吞了內蒙古不算，現在要吞華北五省，就是華北五省進子了，一定還不能填滿慾壑，要把整個中國囫圇吞下。我們已經到不能再忍受的時候了。

難道我們的命運是經「歷史先生」註定應該如此麼？決不是這樣！中國近百年來，弄得一塌糊塗，並非民族的命運不好，而是我們的政府——從清廷到袁世凱，從袁世凱到現在——沒有執行過正確的國策。從基本方面講，自然是不能使這個東方古國，跳出封建經濟的樊籠，走上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以致永久受資本主義各國的壓迫與圍攻。到了資本主義各國前來「敲門」的時候，又不知道怎樣對付，更不知道謹守不喪權不辱國的原則以與敵人周旋。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

軍之役，清廷的手慌脚亂不用說了；關於中日戰爭，據說是有準備的，並且準備了二十多年，結果，依然一敗塗地。可見在官僚包辦之下，就是準備一百年也是徒勞無功的。中日戰爭以後，索與不準備了，如李鴻章之流，且在暗裏幹賣國的勾當。袁世凱時代竟不惜以簽訂「二十一條」爲自己「高陞」的代價，比李鴻章更無恥。袁世凱以後，大家競演「同胞殺同胞」的慘劇，把微弱的國力耗於內戰之中。這樣，不向帝國主義投降，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最令人痛心的是：政府本身既無力對外，或者不願對外，而又不讓民衆抬頭，甚至在民衆自動起來抗戰的時候（如三元里的「平英團」），政府官吏反站到敵人方面，把民衆鎮壓下去，以博得帝國主義的諒解與歡心。有了這些嚴重的錯誤與罪惡，更授敵人以「得隴望蜀」的機會。所以中國在侵略者與賣國賊勾結之下，就一天天降到半殖民地地火坑了！

然而歷史是對立發展的，一方面是黑暗，另一方面是光明；一方面是侵略者

與賣國賊狼狽爲奸，另一方面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發揚光大。誠然，資本主義的大廠，把東方的封建國家炸毀了，這是侵略者樂意的事。而同樣的大廠，在炸毀中國的過程中，使酣睡的被壓迫者從夢中翻轉身來，這又是略侵者所不及料的事。跟着中日戰爭之後，我國的士大夫覺醒了，「戊戌維新」（一八九八年）便是證據。跟着八國聯軍之後，我國的中等階級覺醒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便是證據。跟着「二十一條」之後，我國的廣大羣衆覺醒了，「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以及由「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所激起的大革命高潮便是證據。跟着「九一八」之後，我國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都覺醒了，淞滬爭爭（一九三二年）、長城戰爭（一九三三年）以及五年來奮勇殺敵的東北義勇軍與從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所展開的全中國救亡運動，便是證據。帝國主義與賣國賊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把四萬五千萬同胞趕進半殖民地的火坑，萬想不到我們在火坑裏騷動起來，咆哮起來，反抗起來，要與制我們死命的帝國主義搏鬥。

中國能夠從半殖民地的火坑裏跳出來嗎？我們堅決的相信：這是能夠的！這是一萬二千個能夠的。

要怎樣才能夠呢？答復很簡單：第一是抗戰！第二是抗戰！第三還是抗戰！投降是死路，抗戰是生路。我們過去是朝着死路上走，現在應該掉轉頭來朝着生路上走。

或許有人要反駁：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之役，我國不是「抗戰」過幾次嗎？結果，還是失敗。與其抗戰而失敗，簽訂城下之盟，何如忍辱負重，等待機會，再圖報復呢？

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絕對不正確的。不錯，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之役，似乎也會「抗戰」過。可是把當時的實際情形仔細分析一下，與其說是「抗戰」，不如說是「投機」，更不如說是「開玩笑」。退一步講，就承認當時是「抗戰」吧，然而至多祇能說是官僚之戰，不是民衆之戰；祇能說是一隅之戰，不是全國

之戰；那種「抗戰」的內容，不過是「爭點面子」「出口閒氣」而已，與我們所說的抗戰——爭取民族獨立與自由——是相去十萬八千里的。

要發動一個民衆之戰與全國之戰，首先必須全國大團結，更具體些說，必須建立全民族抗敵陣線。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不問他是什麼黨派，什麼階層，什麼職業，什麼信仰……只要他在民族危機之前，贊成抗戰，我們就應該與他攜手，就應該歡迎他做全民族抗敵陣線內面的一員。過去私人間或是黨派間的成見、意氣、糾紛、甚至仇隙，都要本「昨死今生」的精神拋棄得乾乾淨淨，大家站在一條陣線上向敵人瞄準，向敵人衝鋒。要做到全民族抗敵陣線像鋼鐵一樣的堅固，要做到全民族抗敵陣線內面的分子像骨肉一樣的親密，要做到四萬五千萬人一條心，要做到四萬五千萬顆子彈打在一個槍靶上。

我們知道：要鞏固這樣的全民族抗敵陣線，僅靠「精誠團結」一類的道德信條，是不夠的；僅靠少數領袖的「諒解」或「合作」，也是不夠的；要保證全民

族抗敵陣線不至因敵人的造謠中傷而中途瓦解，要保證這種長期艱苦的鬥爭達到最後的勝利，要保證未來的勝利之果，不落到少數人的荷包或被少數人出賣，那麼，在開步走的時候，即是說在建立全民族抗敵陣線的時候，我們就必須決定一個共同行動的抗戰綱領。

這個抗戰綱領的內容，至少應該包括下面十項：

(一) 成立全民族抗敵的最高國防機關，指揮全國軍隊，武裝全國民衆，討伐滿洲冀東等傀儡組織，收回五年來被敵人佔領的土地。

(二) 用全國軍民的武裝力量，驅逐敵人在中國各處的海陸空軍與警察，奪回敵人在中國境內所佔據或建築的軍事要塞與軍事設備（如飛機場與軍用鐵路等）。

(三) 廢除中日間的不平等條約與祕密協定，取消敵人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如租界，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等）。

類）。

(四) 封閉敵人在中國的經濟侵略機關與文化侵略機關（如報紙、學校之類）。

(五) 沒收敵人在中國的銀行、工廠、公司、鑛坑、鐵路、輪船……等等。

(六) 抗戰不是「排外」。凡敵國在華的僑民不參加侵略活動者，我們仍給以營業與居住的自由；凡敵人的軍隊，警察及傀儡組織下被脅從的軍隊，願意解除武裝者，我們更給以優良的待遇。

(七) 對一切漢奸與親敵通敵的官僚政客，設立特別法庭，公開審判，嚴加懲罰。

(八) 釋放一切政治犯，共同參加抗戰工作。

(九) 保障全國人民有救國愛國的集會、言論、出版、行動……等自由。

(十) 在「抗敵第一」的原則之下，與各友邦攜手，並歡迎國際上的一切援助。

上面十項抗敵綱領，是全民族抗敵陣線的中心任務。凡是參加抗戰的各黨派或個人，都應該忠實履行，且尊重這些綱領的不可分割性，不得接受一部分，拒絕一部分。

抗戰有勝利的把握麼？這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在這裏，先引一位軍事專家——參加淞滬戰爭的將軍——的意見。他說：

「……從軍事上簡單的來說一說抗戰必然勝利的理由。

(一) 散人國防的對象，乃是主義衝突的蘇聯，和利害衝突的英美，他們必須控制其動員於自己掌握中，引滿不發，然後才能應付一切世界及太平洋問題。至於中國，並非其整個國防的對象。他們祇能以常備軍的力量，來對付中國。他們常備軍的人數僅僅二十三萬人，戰時編制也不過四十餘萬人，我們以全國的力量對付這四十餘萬的敵人，無論敵人如何堅強，當然不難摧毀。如果他們動員其全國的力量，以對付中國，那麼，他們的國際敵人，也必伺隙而動，縱使他們在中國暫時得到勝利，而自身結果必歸失敗。

(二) 他們是統治者侵略的戰爭，如果其常備軍悉數調到中國，那麼，國內革命勢力必然乘機抬頭，因內部的一亂，必然使前線動搖；而我們則因為是為整個民族生存而戰爭，戰事愈擴大，內部愈團結。

(三) 他們是工業發展的國家，戰事一起，一切生產必多數崩潰；而我們則因為是經濟落後的國家，縱使海岸線被敵人封鎖，除軍火供給困難外，其餘不受何種影響。

(四) 他們的軍隊，平時養尊處優，一入生產落後的中國內地，必難忍受物質上的困苦，而我們的軍隊和民衆則因素來生活貧困，慣於吃苦，不致影響到作戰的效力。

(五) 敵人入我內地，到處民衆都是他們的敵人；而我們則到處都是自己的戰士。

(六) 敵人入我內地，地形不熟，言語不通，處處都於他們不利；而我們却適得其反。

(七) 敵人入我內地，戰線愈延長，兵力愈分散；我們隨時可以選擇一攻擊點，以突破敵人戰線。

再從國際環境觀察，也對我們的抗戰有利。蘇聯乃「友邦」的死對頭，是誰

都知道的。美國正在執行大礮巨艦政策，要與它比一下雌雄。英國雖說有時不忘情於它的「老盟友」，然它在中國的利益以及在遠東的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至少當守中立。其他弱小民族與西方的和平陣線，無疑的要站到我們這方面。可見侵略者在太平洋上是孤立的。就算日德同盟一天天具體化，正因為這樣，凡屬討厭德國的國家，也跟着討厭日本。祇要我們抗戰，它們總會乘機而起給侵略者以打擊。這即是說，到處是我們的友人，到處是他們的敵人。

此外，從敵人內部去看，以侵略中國而獲利益者祇有少數軍閥財閥，而大多數民衆，却是反對戰爭的。在「一二八」的時候，這種矛盾已顯露出來了。跟着近年民衆生活的貧困化，而敵人內部的矛盾更一天天展開。假使我們發動抗戰，從外部投進一顆開花彈，則敵人內部的矛盾也一定要炸裂。在內外夾攻之下，櫻花島上的金字塔，還能夠支持下去嗎？

總之：抗戰是中華民族唯一的生路，我們應該向這條生路邁步前進！從今

後，要做醒獅，不做綿羊；要把腰兒硬起來，不要把膝兒跪下去；要拿手裏的武器去抵抗侵略者，不要拿手裏的武器去屠殺同胞！

全世界的侵略者，利害是一致的。全世界的被侵略者利害也是一致的，我們打擊東方的侵略者就是打擊全世界的侵略者。假使我們抗戰到底，從侵略者的毒爪之下解放出來，則全世界一切被侵略的「小兄弟」更容易走上解放之路了。

怒吼吧中國！怒吼吧全世界！

我們爲中國的生存而抗戰，就是爲全世界的大解放而抗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今後各國政治制度發展的趨勢

——各國現行政制鳥瞰的結論——

現世界幾個主要國家的政治制度，籠統的說，可分爲三種形式：即（一）資本主義型（如英、法、美、日、意、德等國），（二）殖民地型（如印度等），（三）社會主義型（如蘇聯）。這三種形式，並不是造成什麼「鼎足之局」，就目前言，似以資本主義型最占優勢，而殖民地型則爲資本主義型的附屬品，至於社會主義型，實建立於資本主義的廢墟上，在六分之一的世界內與資本主義殘壘抗衡。現世界各國政治制度的分野，簡單言之，就是如此。

不過，這種分野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常的處在動盪之中。一般說來，戰

後與戰前不同；戰後十餘年間也發生過多少次的改弦易轍；未來怎樣呢？當然是「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前途的變化正多着哩！我在這裏，應該指出一點，就是政治制度的變化，是被經濟組織決定的，要預測未來政治制度的變化如何，仍須把目前的世界經濟作一次扼要的敘述。

是的，目前還是帝國主義時代，或者更精密一點說，目前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Crash）爆發後，資本主義的「肺癆病」已進到第三期了。數年來經濟危機的黴菌作祟，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僅存皮骨，竭各國名醫之力打了若干「嗎啡針」，像什麼加緊備戰啦，通貨膨脹啦，以及剷國內外廣大羣衆之肉以醫資本主義之創啦（經濟危機中所受損失的轉嫁）……才暫時鬆一口氣，用流行的術語說，即由經濟危機的深淵跳到特殊蕭條（Special depression）的階段。的確，從一九三三年起，資本主義經濟似乎已趨「順調」。不過，這「種順調」，不是「肺癆病」有什麼轉機，而是藉「嗎啡針」的藥力，

暫時把微菌的毒素減弱一點。因為如此，所以資本主義的機構沒有恢復健康的希望，再明白些講，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不能由特殊蕭條進到普遍的繁榮 (Prosperity)，大抵要在不死不活的迷宮內繞圈子。在繞圈子的時候，自然少不得再打嗎啡針，這即是說，要繼續加緊備戰，繼續通貨膨脹，繼續執行剝肉醫創政策。這樣幹下去，無疑的一方面要引起戰爭，另一方面要引起革命。戰爭與革命，恐怕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快要分娩的一對孿兒 (twin) 吧！

資本主義國家受到戰爭與革命這兩重威脅的時候，在政治制度方面有什麼影響呢！誰也知道：對外要準備戰爭，對內要鎮壓革命，這兩種任務決不是過去的議會政治所能貫徹。從此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的議會政治就在戰爭與革命的前夜破產了，從此獨裁政治就在議會政治破產的過程中一天天的抬頭了。獨裁政治在準備戰爭與鎮壓革命上，當然比議會政治有力得多。所以金融資本遇到最後的難關，不得不要強有力的政權出現，換句話說，不得不要獨裁政治出現。

先以意大利爲例吧！意大利的金融資本因出世過遲，搶不到肥美的殖民地，就是一度加入歐戰，結果，也是兩手空空。在戰後，受經濟危機的襲擊，以致革命昂揚，從尼提內閣到法克泰內閣，都無法超渡難關。於是歷史先生選中了墨索里尼，他自一九二三年起，即建立公開的法西斯專政，四千萬人民由一百萬黨員來支配，一百萬黨員由六萬寡頭來指揮，六萬寡頭由二十五巨頭來統治，二十五巨頭則由一人來主宰。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鐵腕下面，已使金融資本得以苟延殘喘了。

其次，再看德國。自凡爾賽和約簽字後，德國原有的殖民地全被戰勝國所瓜分，使這個發展到高度金融資本的國家，沒有透氣孔。尤其是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漩渦中，站在飢餓線上的大衆企圖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這麼一來，金融資本家便覺得議會政治軟弱無力。從白魯甯內閣起，德國已走上獨裁政治之路；由白魯甯而巴本，由巴本而希萊轍，大抵都有幾分傾向獨裁。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怪傑

希特勒便正式登臺了。國社黨人無情的棍子，把民衆的自由打得粉碎。事實證明德國是法西斯專政的後起之秀，或者說是變本加厲的獨裁政治。

假使說，法西斯專政的種子，是在金融資本的園地裏萌芽的，那麼，除意德兩國外，其他金融資本壟斷一切的國家，是否也有法西斯專政的趨勢呢？我們應該這樣答復：只要這個國家是金融資本家掌握政權，只要這些金融資本家所接觸的對內對外各問題臨到非議會政治所能解決的時候，則法西斯專政的趣劇，大半是要公演的。在日本，德謨克拉西的成分本來就不多，法西斯性質的獨裁早已準備推翻虛有其表的政黨政治，五一五事件以及二二六事件，即是法西斯正式登臺的預告。近年雖標榜着什麼「舉國一致」內閣，然軍閥的指揮刀有決定全局的力量，由政友會與民政黨所支持的議會，是可以隨時解散的。跟着加緊侵略中國而來的戰爭危機以及跟着國內大衆貧困化而來的革命危機，既一天天成熟，則日本的法西勢力將不可避免的要盤據整個政治舞臺。在凱瑪爾將軍統治之下的土耳其，儘管掛上共

和國的招牌，儘管有憲法，儘管有國民會議；可是實際上，土耳其國民黨是國民會議的唯一支配者，而凱瑪爾將軍又是土耳其國民黨的唯一支配者，所以革命後的土耳其也是不折不扣的獨裁政治。以上是就亞洲方面說的。在美國，本是典型的德謨克拉西制度。然自羅斯福出任總統以來，恰如意大利報紙所說，「正走向法西之路」。他的得意之作——產業復興計畫，不過是白宮與華爾街結合以謀逃脫經濟危機的手段而已。羅斯福迭次向國會所要求的權力，固然趕不上墨索里尼或希特勒，但在美國歷史上，的確未曾見過，幾乎使人不相信他是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這是獨裁政治的又一形式。英國呢？韋斯敏斯德寺（Westminster Abbey）旁的巴力門（Parliament），是世界議會政治之母。不幸在世界經濟危機的襲擊下，英國的議會已失去駕馭政治的能力，從一九三四年通過所謂防止煽亂法（Sedition Bill）後，一般民衆都感受失去自由的恐怖，在某種程度內也可說是法西在英國昂頭。就算莫斯萊一時不能出而主政，然而英國傳統的德謨克拉西，在內閣

獨裁的演進中，一天天趨向沒落，則爲不可掩之事。至於法國，常被人稱爲「自由的最後壕溝」(Last trench of freedom)。但在不久以前，這道壕溝亦有逐漸縮小之勢。杜邁格內閣富於獨裁政治的色彩，是大家知道的；而佛蘭亭與賴伐爾內閣先後提出全權法案的要求，也是議會政治沒落的朕兆。加上右派勢力的抬頭，尤其是火十字團的活躍，更是醞釀法西獨裁的明證。(幸而這種醞釀，在一九三六年人民陣線成立以後，已宣告流產了。)不論就美洲說或就歐洲說，獨裁政治這個怪物已向各處留下爪印了。假使今後各國法西運動的經濟條件(危機深刻化)及其政治條件(革命勢力擴大)同時成熟，則美英等國大抵要步德兩國的後塵。

照此說來，法西專政是金融資本統治的國家必有的趨勢，所以有許多人都不致替德謨克拉西的前途擔憂，如拉斯基(Harold J. Laski)曾寫過一本德謨克拉西的危機(Democracy in Crisis)，武爾夫(Leonard Woolf)與拍息(Lorr Eustace Percy)在現代國家(The Modern State)一書中，有過德謨克拉西能否

殘存 (Can Democracy Survive) 的爭論，便是最好的例證。但在這些人中都有
 一種流行的意見，以為德謨克拉西與法西專政的本質不同；其實這種觀察非常錯
 誤，目前的法西專政固然是金融資本的獨裁，就是過去的德謨克拉西亦何常不是
 在議會政治掩飾之下進行資產階級的獨裁呢？我們祇要看資本主義國家的議員，
 是誰的代表？是替誰說話？就明白一切了。因此，過去的德謨克拉西與目前的法
 西專政，其本質是相同的（都是資產階級獨裁），所異者一是五十步一是百步而
 已。

難道政治制度的演進中，沒有純粹的德謨克拉西 (Pure democracy) 麼？的
 確，在各階級同時並存的社會裏，純粹的德謨克拉西是不會有的。不過，與資產
 階級德謨克拉西對立的還有另一種德謨克拉西，這種情形在蘇聯可以看到。茲從
 拙著民主政治論（詳見附錄）中摘引幾段以供參考。

「俄國在十月革命後，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簡稱蘇聯），從前在帝俄時代，與

克倫斯基政府時代，被壓迫的勞動者，一躍而為國家之主人，實行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制」，這却是近代政治史上別開生面之事。因此，受盡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一切代言者的嬉笑怒罵。許多人都認為無產階級獨裁是民主政治的最後破產；就是「以背對着二十世紀以面向着十八世紀」的考茨基 (Kautsky) 在其所著的無產階級獨裁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這一本冊子中，也論到「德謨克拉西方法與獨裁方法根本相反」，甚至明明白白的說：「獨裁」這個字，即是「廢棄德謨克拉西」 (Abrogation of Democracy) 之意。不錯，勞動者的政權是壓迫資本家的，在蘇聯境內，一切剝削者（資本家也在內）沒有任何自由，這一點，確使「資本家的民主政治」從此窒息而死。然由另一視角去看，資本家被壓迫是一件事，而以前的被壓迫者得到解放又是一件事。到現在，蘇聯的勞動者，不僅參加政治生活，並且負責管理國家。……

「蘇聯的政治制度是一種嶄新的形式，它對於資本家則為獨裁，而對於勞動者則為民主，獨裁與民主原來是對立的而又是統一的啊！如果說，美法等國所流行的是狹隘的民主政治，是少數人的民主政治，則蘇聯所流行的就是廣泛的民主政治，是多數人的民主政治了。根據「最大多數的最大

幸福」之原則，我們應該承認「多數人的民主政治」比「少數人的民主政治」合理得多。

「現在是兩個世界——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對立的時代。資本主義世界從自由競爭轉變為壟斷制度以後，假幌子的民主政治業經戳破，大半以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代之；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世界內，民主政治已失其存在的根據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世界的孤島——蘇聯，則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已突破克倫斯基政府統治的羅網，在「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外衣之下，展開民主政治的新局面。這種歷史上劃時代的轉變，使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絕處逢生。「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此景彷彿似之。誰謂「無產階級獨裁」是民主政治最後的破產呢？我在這裏，應該鄭重指出的：蘇聯不僅否定了獨裁政治，同時又使過去的民主政治起了本質的變化，而發展到更高的形式。可見由少數的民主政治到獨裁政治，由獨裁政治到多數人的民主政治，是政治形式發展上「正」(Thesis)「反」(Antithesis)「合」(Synthesis)的過程；換言之，就是辯證 (Dialectics) 的過程」。

依照上述論據，我們便知道：在金融資本壟斷一切的國家，有獨裁政治抬頭

的趨勢，一方面固然是德謨克拉西破產，另一方面却是向另一種德謨克拉西推移。蘇聯史達林的新憲法通過以後，更證明了這一點。看透了這種歷史發展的過程，那就不用不着替德謨克拉西的前途耽憂了。

講到這裏，或者有人要問：從少數人的德謨克拉西進到多數人的德謨克拉西，是否以法西專政爲橋梁呢？這是不一定的，因爲獨裁政治的方式不必爲法西主義，這即是說，法西專政爲歷史過程中可有的階段，並非必經的階段。如意國與德國，固然走上了法西專政的道路；但蘇聯却逕由沙皇時代的獨裁政治而實現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了。再就法國說，從前法西專政雖在醞釀之中，然而因爲「人民陣線」(People Front)的勝利，已給法西勢力以致命的打擊，假使法國人民陣線勢力今後繼續壓倒法西勢力，則法國就不會跟着意國與德國的尾巴跑。法國如此，英美又何嘗不如此？誰忽視這一點，誰就墮入機械論的泥坑之中。

話又說回頭了，政治制度的變化是被經濟組織決定的，但是還要補充一句，

在經濟組織所決定的範圍內，人類的努力可以推進政治制度的變化。我們既認識今後政治制度發展的趨勢，我們就應該順着這種趨勢努力，爭取有利於人類的前途！

一九三七年一月修正

附

錄

民主政治論

——其起源，其發展，及其前途——

一 何處是民主政治的搖籃

「民主政治」這一名詞，爲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義譯，這是海禁大開以後，跟着洋火(Match)與來福鎗(Rifle)一起輸入中國的。儘管有些人從線裝書裏摘出什麼「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以及「民爲貴君爲輕」一類的陳說，牽強傅會起來，把舶來品的民主政治，貼上「國產商標」，彷彿東亞這塊神祕的國土無美不備似的。然而，依照科學證據去講，則上述的陳說，祇能看做「氏族制度」(Gentile Constitution)的子遺，與舶來品的民主政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註一)就是儒家奉為理想政治的唐虞盛世，在我看來，也未跳出氏族制度的巢穴，並非近代民主政治的典型。(註二)侯官嚴幾道說得對：「中西政想有絕不同者。夫謂治人之人，即治於人者之所推舉，此求之於古聖之胸中，前賢之腦海，吾敢決其無此議也。」(註三)這即是說，德謨克拉西確是一種舶來品。正因為是舶來品，所以在「五四運動」的前後，有些「村學究」見到流行的雜誌上有以「德先生」與「賽先生」並舉的詞句，即認為德謨克拉西是西方人名。甚至當時江西教育廳長許某，開口閉口總離不掉德謨克拉西，表示自己具備前進的意識。不幸在他鎮壓了一次學潮以後，南昌的學生因其言行相反，即以「德謨克拉東」的徽號贈之。假使德謨克拉西是道地貨，那就不會引起這些「趣談」

(註一)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State. Chap. III

(註二) 錢亦石儒家理想政治之解剖(暨南大學出版學術月刊創刊號。)

(註三) 嚴譯社會通詮第十四章案語。

了。

我認爲德謨克拉西是一種舶來品；這就是說，它像洋火與來福鎗一樣，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西方社會的產物；或者更精確一點講，是西方社會發展至某階段的產物。中國在海禁未開以前，未發明洋火，未製造來福鎗，未產生民主政治，並非中國社會在本質上與西方社會有什麼差異，不過中國社會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尙未進到與西方社會相同的階段罷了。

一般說來，德謨克拉西是一種政治形式，或者借拍息(Lord Eustace Percy)的話說，「德謨克拉西卽民衆所運用的政治權力」。(註四)民衆如何取得這種政治權力呢？我想：決不會「不勞而獲」吧！祇要是稍懂西方歷史的人，都知道在近代，有兩次爲德謨克拉西而爭鬥的大事變，一是美國獨立戰爭，一是法國大革命。前者爆發於一七七四年，後者爆發於一七八九年。這兩次大事變，確是近代

政治史上劃時代的界碑 (Landmark)。所以，我們要談到舶來品的民主政治，就不可不談到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

武爾夫 (Leonard Woolf) 說過：『最初的民主主義者——近代民主政治的發明家——是美國獨立戰爭諸領袖』。(註五) 這當然是以哲斐孫 (Thomas Jefferson) 起草的獨立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為根據的。這篇宣言宣布了民主政治的三大原則：(一) 凡人皆有其天賦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即生命、自由、求幸福等權；(二) 政治目的在使這些權利得到保證，而政府的權力也祇是從人民得來；(三) 倘若政府不能執行職務，人民有權撤換這個政府，於必要時得訴之於武力，乃是革命的特權。真的，這篇宣言總算是千古不朽的文章吧，現在看起來，似乎仍是光芒萬丈！

歷史告訴我們：『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好像警鐘一樣，敲醒了歐洲的

(註五) 同註四，第二八頁。

中等階級』。(註六)這就是說，美國獨立戰爭所宣布的民主政治，可以推進法國大革命的怒潮。果然，在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的第八年（一七八九），波士特格特（Postgate）所說「現代民主政治的母親」之法國大革命便接踵而起了。假使說，哲斐孫起草的獨立宣言成爲少年的北美合衆國的經典；那麼，在法國大革命中，也有一篇與其先後輝映的文章，這就是人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Man）。人權宣言的第一條說：『人生而自由，人的權利應當平等，』一望而知是盧騷（Rousseau）民約論（Social Contract）的反映。以致拿破崙（Napoleon）說：『沒有盧騷，法國就沒有革命』。這句話，雖不免過火；但盧騷的學說，給予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確是無可比擬的了。

如上所述，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樹起了民主政治的模範，是無人持異議的。然而這是否說，獨立宣言祇是哲斐孫個人的創作，人權宣言祇

（註六）Capital,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是盧騷民約論的再版呢？果真如此，那就如黑格爾（Hegel）所說，是「頭腦支配世界」（The world stood upon its head）了。（註七）假使這樣解釋的話，則中國在海禁未開以前未產生民主政治的問題，應該說是由於中國沒有哲斐孫與盧騷。這樣，無疑的墮落到形而上學（Metaphysics）的泥坑中去了。

我們知道：「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其存在，而是社會的存在決定其意識」。（註八）這是近代科學證明的真理。我也用不着把整個的公式都搬出來，在這裏，祇想引證下面一段話：

「不能根據轉變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一時代，正如不能根據個人的意識來判斷這一個人一樣。

恰恰相反，這一時代的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從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中間的衝突來說

（註七）這句話直譯起來，應該是「世界顛立在頭上」。詳見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第四八頁腳註。

（註八）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11—12

明。」(註九)

是的，哲斐孫與盧梭都是暴風雨般時代中傑出的人物，他倆的意識可以代表時代的要求。但這不過如我國成語所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而已。申言之，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所展開的民主政治，不過是當時物質生活的矛盾之反映而已，不過是當時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中間的衝突之反映而已。所以，「站在這種觀點上，則關於一切社會變遷與政治革命的最終原因，不應求之於人類頭腦中以及人類對永久真理與正義的較深認識中，而應求之於生產方法與交換方法的變化中。這即是說，不應求之於哲學中，而應求之於每個特別時代的經濟中。」(註十)講到這裏，便知民主政治的搖籃所以不在東方而在西方，就無須再加解釋了。

(註九)同註八第十二頁。

(註十)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P. 94.

二 產生民主政治的客觀條件

翻開近代政治史一看，誰也知道：民主政治是在封建制度（Feudalism）統治下突起的異軍。要說明產生民主政治的客觀條件，必先從封建制度講起。

關於封建制度，似乎是一座神祕的殿堂。像我這枝粗笨之筆，決不能把這座殿堂描出逼真的輪廓來。爲藏拙計，恕我暫時用杜博洛夫斯基（Dubrovsky）所繪封建制度的圖樣爲藍本吧！從杜博洛夫斯基的圖樣中，看出封建制度有如下的特色：

- （一）封建的生產方法，是以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聯合爲前提，大抵是自給的性質。
- （二）封建的生產關係，是地主用超經濟的壓迫，去榨取農奴式的農民之剩餘勞動。

(三)：封建的社會結構，是土地佔有者與直接生產者（農民）的對立。

(四)：封建的政治形式，是梯形的組織制度。（註十一）

這幅圖樣是大致不差的。我們從這裏就不難想像出封建制度的殿堂，無異由農民的赤血與白骨所造成的磚石而一層層堆積起來的金字塔。坐在塔頂上的是國王；國王之下，有僧侶、貴族、武士；……壓在塔底下的就是大多數的農民，就是世世代代替其主人做牛馬而不得一飽的農民。假使農民蠢動起來，則這座殿堂便根本靠不住。然而那些坐在殿堂上享樂的統治者是有方法應付的。教條、法令、警察、軍隊……都是馴伏農民鎮壓農民的好工具呢？於是這座殿堂，經過許多風暴，依然歷久常存。

不料天下事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封建制度的主人雖有方法鞭策農奴式的農

（註十一）杜博洛夫斯基亞細亞生產方式，封建制度，農奴制度及商業資本之本質問題第六九一

民作工，却不能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引起生產方法與交換方法不斷的變化，在封建經濟的荒原上，就有資本主義的種子散佈其中。於是工場手工業代替了行會工業。接着，市場一天天擴大，需要一天天增加，應時而起的機器工業，又取得了工場手工業的地位。從前零星的細小的生產機關，都變成近代生產強有力的骨幹。到這時候，封建經濟的基礎，就始而動搖，繼而崩潰了。新興的資本主義即在封建經濟的廢墟上欣欣向榮起來。（註十二）

真的！「經濟基礎一有變動，則全部巨大的上層建築必隨之而起緩慢的或急劇的變革。」（註十三）爲什麼？因爲新生產力與舊生產關係衝突；或更具體些說，因爲由舊胚胎中發展着的資本主義與包圍在其外面的封建遺物衝突。資本主義經濟的主人，過去本是封建制度下的被壓迫者，現在經濟勢力既大大進步，自然在

（註十二）Capital, vol. I, Chap. XII, XIII.

（註十三）同註八，第十二頁。

政治上不願再受封建錄錘的桎梏了。「風磨機(Windmill)給我們以封建貴族統治的社會，蒸汽磨機(Steam-mill)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註十四)某種生產力就產生某種經濟，某種經濟就產生某種政治，客觀真理，本是如此。

固然，歐洲在十八世紀封建制度由動搖而崩潰的時期中，曾有過所謂專制主義(Absolutism)據說：「……專制君主制者，明明是在過渡期間出現的。在這過渡期間，那舊封建門閥沒落，中世紀市民階級成長為近代資產階級，而這爭鬥的一方面，沒有克服他方面」。(註十五)或者更詳細一點說，「當十八世紀……貴族是在封建的生產方法日就沒落中的一個階級，它與資產階級達到了某種均勢。故十八世紀王權在形式上便統治了兩個階級，超立於這兩個階級之上；同時，實際上又必然的去保護這兩個階級的利益。……然而，資產階級的利益與貴族的利

（註十四）(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P. 119.

（註十五）道德的批判與批判的道德（引自讀書雜誌二卷年終特大卷專制主義論）

益，大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專制的君主決不能使他們彼此完全適意或融洽。專制的君主若不凌辱資產階級，那他便不能滿足貴族的慾望」。(註十六)所以，在專制主義統治之下，終無法抑止新興階級要求政權的嘗試。於是民主革命便鼓盪而成洶湧澎湃掃蕩一切的怒潮了。

總之：民主政治是推翻封建制度以後所成就的「偉業」，它的產生，不是幻想的結晶，而實根據兩個客觀條件：第一，就經濟條件說，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已建立相當基礎，其發展頗有不可遏抑之勢；第二，就社會條件說，資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力量，可以壓倒封建貴族。

如果以前的說明，略嫌抽象，那麼，我就舉法國大革命為例，作具體的補充吧！

法國本是一個農業與家庭工業占優勢的國家。自一七七五年採用織布機與紡

(註十六) Kautsky: French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Chap. II.

紗機以來，工業革命的洪水，向全國奔流。雖然小規模的企業居多數，可是，大規模的氈呢廠，玻璃廠，以及礦山等等，亦與日俱增。在資本主義侵入農村後，一方面使農村人民分化，公社土地絕跡；另一方面，又使貴族破產，高築價台，甚至把向來藉以剝削農民的土地也出賣與資本家了。從一七二〇——一七八九年間的對外貿易，增加至五倍之多，特別是出口所占的比例更大。所有這些事實，祇有一個意義：即法國已跳出封建制度的樊籠而走上資本主義的大道了。這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經濟條件。（註十七）

說到社會條件，法國也是成熟了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把法國人民分成三大等級（Estate）：第一等級是僧侶，約計十三萬人；第二等級是貴族，約計十四萬人；兩者是享有特權的。第三等級則包括資本家、手工業者、小店主、智識分子、工人、農民，在全國二千六百三十七萬人口當中占絕對多數，他們祇

有義務，沒有權利。正如息葉斯 (A. Stoyes) 所說：「第三等級本來一無所有。其前途怎樣呢？一切都是它的。」當法國大革命的前夜，第三等級營壘內，除為國家債主的少數財閥以及一部分從事粧飾品的生產或交換的工商業家擁護舊制度外，其餘都是一致反對特權等級之人。豈止這些第三等級一致而已，即第一等級內的下等僧侶與第二等級內的地方貴族，在「三級會議」開幕之日，都站到第三等級方面。有這樣優越的社會條件，所以革命之火一經燃燒起來，就釀成燎原之勢，路易十六的專制主義以及封建貴族的一百五十種特權，都毀滅於火光熊熊的烈燄之中。（註十八）

在這裏要附帶聲明的是：法國大革命的客觀條件，不止上述兩者，此外如政治危機的嚴重，時代意識的左傾，都是促成革命爆發的酵素，不過上述兩者比較重要耳。至於美國獨立戰爭，雖其具體環境與法國大革命不盡相同，然據西門士

（註十八）W. Blos 法國革命史第一篇。（中譯本第一——七六頁）

(Simons)說：「它是英國內亂在美洲的一幕……是互相對抗的各社會階級間龐大爭鬥中的一仗……資產階級即藉此推翻封建制度並取得政權」。(註十九)可見它與法國大革命並無原則上的差別。限於篇幅，恕我未加說明。

三 民主政治的理想與實際

前面曾講到美國的獨立宣言，宣布了民主政治的三大原則：一是人民有不可侵犯的生命、自由、求幸福等權，二是政府的權力由人民授予，三是人民有權撤換不能執行職務的政府。這三大原則，或者就是民主政治的理想吧！

自然，這種民主政治的理想，從獨立宣言裏公開的宣布出來，在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次；當時美洲殖民地人民在美國煩重賦稅壓榨之下，不管是工商業家也罷，或是工農羣衆也罷，都對此一致歡迎。十三州同舉「叛旗」，八年中繼續

(註十九) Simons: 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中譯本第八七頁。

血戰，可說是以這種理想爲團結的基礎。豈僅美洲殖民地人民如此，就是率領英兵五萬與殖民地交戰的豪大將（Sir William Howe）在這種理想的閃光之前，也不免動搖起來，認爲不能用武力削平美國的獨立。

不錯，民主政治的理想是輝煌燦爛的，試問在獨立戰爭勝利以後，是否一一兌現呢？換言之，理想是否與實際一致呢？講到這一點，話就很長了。在這裏，祇打算把一七八七年在斐列得爾斐亞（Philadelphia）召集的憲法會議解釋一下。關於憲法會議代表的選舉，其財產限制很高，三百萬人口中，能參加選舉者不過十二萬人。證明憲法會議祇是由商人、製造主、銀行家與種植者所組成的委員會，在各項討論中儘可能的剝奪人民的權力，甚至有些人很坦白的說，過分的民主政治乃是暴徒政治。在這種「口實」之下，把勝利之果，完全送到有財產者的荷包中去。於是獨立宣言上漂亮的詞句，都成爲「水中月」「鏡中花」了。

何況下層人民的情形，甚至比獨立戰爭以前還要壞？茲再引西門士一段話爲

證。

「美國的革命，和大多數的戰爭一樣，係由一般在成功中獲得利益最少的人所擔任。在康科特 (Concord) 的工人和「編成隊伍的農民」——他們是「細民」——的鎗聲全世界都聽得到，他們的熱血洒遍福格 (Forge) 流域與約克唐 (Yorktown)。但戰事一經告終，他們對於沿海各城市的商業與財政階級，反負着重大的債務。政府支付給養品的大陸貨幣，現在在財富生產者的手中變成一文不值了。這樣從人民榨取出來的金錢，計有一萬一千二百萬元。稅捐的分配最不公平，人丁稅是最普通的徵稅方法之一種。有人在馬薩諸塞 (Massachusetts) 提議用這種方法從九萬納稅的人民中徵收五百萬元以上的款項。漁業在戰爭中幾乎完全消滅，當和平出現才漸漸恢復原狀。馬克馬斯特 (Mc Master) 對於威爾滿州 (Vermont) 說：「民衆的半數是完全破產的，還有一半則陷入赤貧之中。」他又對於另一州說：「新罕布什爾 (New Hampshire) 當時所流行的習慣——其實無論何處都是如此——是，如果有人不幸欠了他們同類六辨士或一先令的債，便要被抓入監獄中。當一七八五年的秋季，如果嚴格的施行這種法律，那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民衆要陷入羸

鏡之中。」（註二十）

看啊！這是怎樣一幅黯淡的圖畫啊！在這幅圖畫中，映出美國民主政治的真相。所以，溫忒門（Earnest Unterman）老實不客氣的說：「……這觀許多事實，可以知道美國革命是一種商業革命。它不是為解放美國勞動者的革命，只是為使美國商人得以自由榨取的一種爭鬥。……縱令這次革命標榜了自由、平等與正義，但那也不過是革命的商人指導者，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的理想化的詞句。……美國的自由與獨立，不過是美國商人的自由與獨立」。〔註二〕我認為這段話，是一針見血的。

也許有人要引培根（Bacon）的話來解嘲，說什麼「始生之物其形必醜」。似乎對於美國的民主政治，不應該求全責備。那麼，我們姑且撇開美國不談，再

（註二十）同註十九，第一〇五——一〇六頁。

（註二）E. Unterman: World Revolution, Chap. V.

就法國大革命——「現代民主政治的母親」——來檢討一下吧！

法國的人權宣言是與美國的獨立宣言先後輝映的文章，這在前面已講過。人權宣言本是法國國民會議在巴黎民衆攻下巴士提爾獄 (Bastille) 之後數日，以獨立宣言做榜樣而起草的。它的內容怎樣？據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的意見，認為人權宣言也重複了獨立宣言的缺點。他說：

「國民會議和在斐列得爾斐亞集會的美國立憲主義者一樣，對於人民間經濟關係完全不提，只限于聲明人民在法律前平等，一國人得依其志願成立政府和規定人民的憲法上的自由。關於財產問題，法國的宣言急忙聲明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而且接着說：「除掉為合法證明的公共必要事件，而且在如數的和事先的賠償條件之下，一切產財都不得剝奪」。這是公開反對農民對於地主的權利，和反對廢除屬於封建性質的義務。」(註二二)

(註二二) Peter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3 中譯本上卷第

人權宣言還是當法國大革命高潮中產生的。在承認財產有「神聖不可侵犯性」的前提下，自然「人生而自由，人的權利應當平等」一類美麗的條文，成爲「空頭支票」。可是到一七九一年憲法制定的時候，連這些不像樣的「空頭支票」也撕破了。第三等級內的資本家，既有鎗桿在手，便想在君主立憲制度之上，建立自己的新政權，一方面承認法蘭西君主的尊號，另一方面又將君主、貴族及僧侶的特權剷除，而擴大自己的權力。又於選舉法中，將法國的男性國民分爲兩級：一爲積極國民，一爲消極國民。凡年滿二十五歲並年納三佛郎稅的人稱爲積極國民，其他不納稅的人稱爲消極國民，只有積極國民才有選舉權。至於被選舉權，必須有一百五十到四百佛郎價值的地產。這不明明白白是資本家排斥勞動者於政權之外麼？正如德斯瓦靈（Desmoulins）所說：「積極國民的含義完全是虛偽的，因爲就這種含義講：一個收利坐食的人稱爲積極國民，而一個勞苦的農夫沒有付出三佛郎的稅，反是一個消極國民，享不到政治上的權利」。（註二三）

可是，法國大革命浪濤的激盪，終究毀滅了資本家的如意算盤。誰都知道；在路易十六上斷頭台以後，演了一幕有聲有色的山嶽黨（Mountainers）專政。在山嶽黨專政時代，曾公布了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據布洛斯（Blos）的記載，這種憲法含有絕對的和純粹的民主政治。它規定凡年齡達到二十一歲的法國人即為國民，具有一切政治上的權利，無任何財產關係的限制。這種特色，是從前的憲法上未曾見過的。同時，在憲法的緒論中也提及「勞動權」。雖說這種憲法未予施行，然已深得民衆的信任。在一七九五年工人暴動的時候，曾用粉筆在他們的帽子上大書特書：「麵包與一七九三年的憲法」。可見這種憲法是法國大革命的結晶，其光芒更超出人權宣言之上。（註二四）

隨着山嶽黨的失敗，「共和國滅亡了！強盜們勝利了！」羅伯斯庇爾，

（註二三）同註十八，第二篇第九節（中譯本第一五〇——一六四頁。）

（註二四）同註十八，第四篇第十四節（中譯本第四二——四一七頁。）

(Robespierre) 臨終的呼聲，不幸竟成事實。於是拿破崙便因緣時會一躍而登政治舞台，法國歷史的車輪遂逆轉到專制主義的舊軌道上去。(註二五)

讓我重覆說一句，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並無原則上的差別。民主政治的理想，在山嶽黨專政時代顯然比美國更向前發展一步，可是在實際上仍與「始生之物」有相同的「醜形」。我很贊同溫忒門的意見，認為：「美國的商人革命是法國商人革命的前奏曲。且在許多地方，法國商人模仿了美國商人的方法和腔調。在歷史上所不同的，只是以法國君主代替美國革命時的英國君主，以法國封建貴族代替英國商人。……美國的商人終於支配國家的政權，但法國的商人，怕勞動者的憤怒，而逃匿於軍人執政官——拿破崙的麾下了。……要之：美

(註二五) 拿破崙的專制主義與法國大革命前的專制主義微有區別。後者是在貴族與資產階級對

立中間維持平衡，前者是在資產階級與勞動者對立中間維持平衡。請參看 The Pea-

sant: War in Germany, P. 23.

國和法國這兩次革命，同是資本家的真勝利。」（註二六）

總括起來說：十八世紀民主政治的理想，不過是適合資本家利益的理想。在資本家與其壓迫者——封建勢力——爭鬥的時候，要得到工農羣衆之助，不可不開些「空頭支票」，認爲自己的利益與工農羣衆的利益是融成一片的。一到了敵人塌台的時候，或到了敵人的殘餘勢力不足與自己抗衡的時候，那麼，資本家就馬上把狐狸的尾巴露出來了。或用以財產爲標準的選舉法，或創立「積極國民」與「消極國民」的界限，使工農羣衆永遠生活於十八層地獄之中。結果，民主政治的實際就無異一顆煙幕彈。在民主政治的煙幕掩飾之下，一切慘無人道的把戲也不亞於中世紀的殘酷。因此，有人說：像美國與法國這一類的民主政治，骨子裏就是「資產階級獨裁」。

四 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的矛盾

我在前面，關於美國與法國的民主政治，比較講得詳細者，無非以這兩國為例，便於說明耳。自然，民主政治的園地，決不限於美法兩國。資本主義之王的英吉利，更是民主政治的老祖宗。它在一二六五年，因貴族與市民反對王權的結果，已成立兩院制的國會。從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英國歷史幾乎盡是王權與國會爭鬥的篇幅。在一六四二——一六六〇年「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期間，曾一度宣布共和，民主政治已奠始基。經過短期的復辟，又於一六六八年發生所謂「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成立了「權利法典」(Bill of Right)。自此以後，王權大大減削，自由保守兩黨更迭主政，樹立政黨內閣的典型。至十九世紀，經過長期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在老態龍鍾之中，亦表現若干生氣。雖說始終留下了傀儡的王冠，然其政治上所含德謨克拉西的成

分，仍與美法兩國相頡頏。就一般情形講，從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是歐美民主政治狂流澎湃的時期。一八四八年的怒潮又把德國、奧國、意大利、匈牙利……都捲入民主政治的漩渦中去了。在美洲也發生過釋放黑奴的戰爭。至十九世紀下半期，西方民主政治的浪花，更飛濺到遠東的扶桑三島上，演了一幕明治維新的喜劇。至二十世紀之初，兩個亞洲國家——俄羅斯與中國，終不能站在民主政治的圈外。前者曾發生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後者亦發生一九一一年（辛亥）的革命。總之：地不問東西，種不分黃白，有資本主義成長之處，即是民主政治蔓延之處，這恐怕是歷史運動的鐵律吧！

在民主政治正式開幕的國家，每每照抄法國大革命的老文章，豎起自由（Liberty），平等（Equality），博愛（Fraternity）三面大旗，似乎已進入「理性的王國」（The Kingdom of reason）。裝飾門面的東西，不僅有憲法（Constitution），不僅有政黨（Party），而且又有國會（Parliament），使國家的面目煥然一新。固

然，「我們承認民主政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最有利於勞動者的國家形式，但我們決不能忘掉，即在十分民主的中等階級共和國中，工錢奴役（Wage slavery）仍是民衆的命運」。（註二七）申言之，民主政治上一切優美的條件，都不過是替資本家開拓順利的環境以促進資本主義繼續發展而已。所謂「理性的王國」，實際上祇是「資本主義的王國」（The Kingdom of Capitalism）。

民主政治是否永久有利於資本主義呢？或者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是否與民主政治「偕老」呢？講到這一點，話又很長了。我們知道：萬物是生長流變的，每種現象，當其發展前進及其所包含的各種因素暴露出來時，即轉變為與原來相反的另一種現象，即轉變為自己的「否定」。資本主義也不能逃出這個公式。因生產力的發展，封建的壟斷制度轉變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由競爭，在自由競爭的過程中，資本一步步集中起來，結合起來，到了某種階段，就轉變為資本主

（註二七）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P. 127 (Vanguard Press).

義末期的壟斷制度。從自由競爭到壟斷制度是資本主義發展上不可避免的結果。(註二八)當資本主義處在自由競爭的階段，是與民主政治「熱戀」的，大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概，十八、十九兩世紀蓬勃而起的民主政治，即是自由競爭時代的產物。可是到了壟斷制度形成的時候，出現了卡特爾 (Cartel)、辛狄加 (syndicate)、托辣司 (trust)、康拜因 (combine)、康采恩 (concern) 等等特殊的組織，財政巨頭 (Financial oligarchy) 已成了「天之驕子」。過去的伴侶——民主政治，在財政巨頭的眼中，就等於「秋風團扇」。與這種壟斷資本主義適合的政治形式，自然不是德謨克拉西，而是狄克推多 (dictator) 了。尤其是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在兩重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總危機與一九二九年爆發的工業循環的危機——襲擊之下，受革命與戰爭威脅的財政巨頭，為挽救自身的沒落起見，勢不得不脫去華麗的外衣 (民主政治)，而露出猙獰的形相 (獨裁政治)。

(註二八)同註十四 pp. 158—167.

「自由」，「平等」，「博愛」三面大旗，早換上「壓迫」，「掠奪」，「屠殺」幾個大字。從前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憲法，成了廢紙；從前各樹一幟的政黨，必需服從指揮刀；從前代表民意（？）的國會，已經「關門大吉」。（就是勉強開門也不能與獨裁者對抗）整個世界都變了，並且都變得不成樣子了！

乾脆些說吧！戰後十餘年來，凡屬壟斷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都有走向法西斯主義（Fascism）的趨勢。在墨索里尼的意國，希特勒的德國，陶爾斐斯的奧國，皮爾蘇斯基的波蘭……這些公開宣布法西斯主義獨裁的國家不用說了。就是民主政治策源地的美法兩國，近來情形，亦有些蹊蹺。羅斯福的「廣大權力政府」即是獨裁的別名。法國自杜邁格上台以來，也數上不少獨裁的脂肪。此外，如英國，如日本，法西運動正在醞釀的過程中。總之一句話：過去的民主政治已成強弩之末了。爲什麼？理由很簡單，因爲壟斷資本主義處在內外矛盾緊張的今日，對內

要鎮壓革命，對外要重分世界，欲貫徹這兩種任務，決不是用國會制度的舊方法與資產階級一般的德謨克拉克西所能奏效的啊！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才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強心劑。目前法西斯運動，到處昂揚，其原因就在這裏。固然，一般黑色或褐色的英雄，不同意這種解釋，他們常常誇贊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可是，事實勝於雄辯，他們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替壟斷資本加緊榨取的另一形式而已。

然而，民主政治已成強弩之末，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於是一些擁護民主政治的學者，就不免慌張起來。如拉斯基 (Harold J. Laski) 曾寫過一本民主政治的危機 (Democracy in Crisis)；武爾夫與拍息亦有民主政治能否殘存 (Can Democracy Survive) 的長篇討論；(註二九) 撒母耳 (Herbert Samuel) 在獨裁呢或民主呢 (Dictatorship or Democracy?) 一文中，也承認民主政治在今日有被推

(註二九) 同註四，第一五一—一六二頁。

翻的危險。(註三十)所有這些學者都是各本所見，對民主政治的前途，表示深切的憂慮。他們共同的出發點，大抵以爲「資本家的民主政治」(這是拉斯基慣用的名詞)與法西斯主義之間有一道不可踰越的鴻溝。但我的意見却與此兩樣。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固然是代表壟斷資本，而過去國會制度下的民主政治又何嘗不是資本家所變的戲法呢？不錯，國會是經過人民選舉的，姑無論大多數人民的選舉權被以財產爲標準的選舉法一筆勾消，即就這少數有選舉權的人民說，仍不能自由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人。『祇有在經濟上居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方能在改選之時，大規模的利用宣傳及鼓動的工具，應用大批金錢，來作廣大的宣傳；他們握有大部分的報章，他們擁有大部分的公共集會場，他們可以自由的開盛大的改選會議，他們可以撥巨量經費來派遣演說家到各城市和鄉村去，作廣大的羣衆的宣傳；他們還利用教堂的教師，去愚弄一般不覺悟的落後的農民及半無產階級羣

(註三十) *Current History*, June, 1934.

衆，叫他們選舉資產階級的代表。諸如此類的怪現象，真是不勝枚舉。因此，就是在國會制度之下，人民的代表也並不是真正人民的代表，他們除極少數的例外，都祇是代表統治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國會不過是資產階級統治機關之一而已。』(註三一)這樣說來，「資本家的民主政治」與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拋棄前者，採用後者，也值得慌張，值得憂慮。

在這裏應該討論的是：如前面所說，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強心劑，試問打了這種強心劑之後，是否可以挽回壟斷資本主義的命運呢？這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際問題。我們只要看見墨索里尼統治意大利與希特勒統治德意志的「成績」就知道了。

關於意大利的「成績」，奎格勒 (Hugh Cugley) 在法西斯主義貽誤意大利 (Fascism Fails Italy) 一文中，提出如下的結論：

(註三一) 辦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第一九六——一九七頁。(心弦書社出版)

「(一)從一九二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三月，意大利在文化、經濟與政治各方面，到底沒有獲得什麼，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試金石。不幸意大利已虛度了十二年。

(二)在工業與社會方面，意大利確已失勢。只要爬上奧略(Oglia)谿谷，訪問米蘭(Milan)、吐林(Turin)、威羅思(Venice)一帶的製造業中心，便窺見工業機械已經腐朽。

(三)在藝術與文化方面，意大利勉強回到一九二一年的狀況，但人民更窮，缺乏有效的教育，如無國家扶助則不能進行文化運動。

(四)貨幣緊縮(Deflation)已經掘毀了國家財政與銀行業的基礎，只有拚命的加緊束縛，才能維持現狀。在目前制度之下，它的崩潰不過是時間問題。」(註三二)

德意志怎樣呢？巴克 (Robert L. Baker) 在德意志陷於破產度 (Is Germany Facing Bankruptcy?) 一文中，分析國社黨上台十五個月後的經濟概況是如此：

「(一)物價上升，工資下落。結果，一切領受工資者的生活標準降低。

(註三二) Current History, June, 1934.

(二) 各種社會業務大大縮小，以致人民一般的福利有顯著的減退。

(三) 在某些工業中，因政府補助，僱用人數已有增加，但工資總額反見減少；同時，利潤却歸於股東與經理人。就整個德國說，消費者的購買力及大部分的貧困，則愈趨愈下。

(四) 德國的輸出貿易已經解體。

(五) 德國的預算與統計弄得一場糊塗。

(六) 德國的貨幣不安定，信用借款毫無。」(註三三)

事實是鐵面無私的。根據上述事實，應該說，法西斯主義的強心劑，仍不能挽回壟斷資本主義的命運！

五 民主政治的演變及其前途

講到這裏，問題又發生了。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資本家的民主政治」既

(註三三)同上，July, 1934.

成了「秋風團扇」；而法西主義的獨裁政治又不是「救命金丹」；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辦呢？

我們知道：歷史的車輪是運轉不息的，在平坦的大道上是如此，在崎嶇的危岩上也是如此。「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歷史先生在長期旅途中所常遇到的境界。明白些說吧！當封建貴族沒落的過程中，資本家便袍笏登場，扮演它的時代劇；這一套場面，比封建貴族漂亮得多，其博得觀衆喝采，當非偶然。不過，在資本家登場之日，跟在它的背後的，則有一羣叛逆的小弟弟——勞動者。資本家愈得意，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愈發展，到了勞動者飢火內燒的時候，或者更正確一點說，在勞動者集團意識成熟的時候，就不可避免的要「珍兄之臂而奪之食」了。歷史注定資本家的成功，歷史又注定資本家的失敗。「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還有何話可說呢？結局，資本家不得不追隨過去的封建貴族之後，走向沒落，長嘆一聲「流水落花春去也」！

爲充實上面的輪廓起見，不妨徵引幾件史料。當法國大革命期間，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制定以後，資本家與勞動者的衝突，已見端倪。到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之初，勞動者頗得勢，當時有兩個代表——路易勃郎（Louis Blanc）與亞爾伯特（Albert）——參加臨時政府。因爲如此，資本家與勞動者益不相容。「六月天」（June days）的流血慘劇，是勞資兩大營壘第一次武裝衝突，「這次事變，宣告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即一階級對別階級之無限制的獨裁」，（註三四）從此以後，法國勞動者便與資本家勢不兩立了。二十年後（一八七〇）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的建立，是「從壓迫者的民主政治變爲被壓迫者的民主政治，從以壓倒某一階級的特殊勢力的統治變爲用大多數人民——工農的整個勢力來壓倒壓迫者的統治。」（註三五）這種偉大的企圖雖歸於失敗，然而創造了最新的政治形

（註三四）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P. 21.

（註三五）同註二十七，第一五〇頁。

式，並且這種政治形式，首先在俄國見之實行。所以，俄國十月革命史，不是法國大革命的「再版」，而是巴黎公社的續篇。

俄國在十月革命後，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簡稱蘇聯），從前在帝俄時代與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時代被壓迫的勞動者，一躍而為國家的主人，實行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制」，這却是近代政治史上別開生面之事。因此，受盡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一切代言者的嬉笑怒罵。許多人都認為無產階級獨裁是民主政治最後的破產；就是「以背對着二十世紀以面向着十八世紀」的考茨基（Kautsky）在其所著的無產階級獨裁（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這本小冊子中，也論到「德謨克拉西方法與獨裁方法根本相反」，甚至明明白白的說：「獨裁」這個字即是「廢棄德謨克拉西」（abrogation of Democracy）之意。不錯，勞動者的政權是壓迫資本家的，在蘇聯境內，一切剝削者（資本家也在內）沒有任何自由，這一切，確使「資本家的民主政治」從此「窒息」而死。然由另

一視角去看，資本家被壓迫是一件事，而以前的被壓迫者得到解放又是一件事。到現在，蘇聯的勞動者，不僅參加政治生活，並且負責管理國家。茲引二、三實例如左：

「就第五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一九二八年）說，出席的代表總共二千五百五十九名，內中工人計占百分之五六·四，農民占百分之二四·八，機關僱員占百分之一八·八。而工人代表中直接由生產中選出來的有百分之三五·四，農民代表中直接由生產中選出來的約有百分之六一·八。

「再就下級行政機關——鄉村和城市蘇維埃言，蘇聯工農在政權上的統治地位，尤為顯著。一九二九年全蘇聯各地鄉村蘇維埃委員中，貧農計占百分之九一·三，僱農占百分之六·一，其他分子如農藝家、鄉村教師、醫師等共占百分之二·六。同年，城市蘇維埃委員中，工人占百分之五三·四，機關僱員占百分之二五，家庭僱員占百分之七·二，婦女占百分之二四·六。

「一九二九年所改選的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政府）全體委員當中，計工人出身者占百分之六九·六，農民出身者占百分之二六·五，機關僱員占百分之一三·九。而工人中有百分之

一，農民中有百分之六〇，是直接來自工廠和鄉村實際生產的。

「誰統治着蘇聯？誰掌握着政權？由這些數字便可得到明白而肯定的答案了。」（註三六）

從這些實例中，可以看出蘇聯的政治制度是一種嶄新的形式，它對於資本家則為獨裁，而對於勞動者則為民主，獨裁與民主原來是對立的而又是統一的啊！如果說，美法等國所流行的是狹隘的民主政治，是少數人的民主政治，則蘇聯所流行的就是廣泛的民主政治，是多數人的民主政治了。根據「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之原則，我們應該承認「多數人的民主政治」比「少數人的民主政治」合理得多。伊里契（Ильич）講過：「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比任何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要更民主一百萬倍；蘇維埃制度比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極端民主制度要更民主一百萬倍。」（註三七）這幾句話，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自圓其說的。

（註三六）張任遠蘇聯政治制度淺說（申報叢書）第八——九頁。

（註三七）Ильич: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Renegad Kautsky, P. 30.

也許有人幻想着「純粹的民主政治」(Pure democracy)吧！是的，在理論上，「純粹的民主政治」本優於「階級的民主政治」(Class democracy)，不過，理論真確與否？須受事實的裁判。依照事實，「在各階級同時並存的時候，我們不能說「純粹的民主政治」，只能說「階級的民主政治。」」(註三八)美法是如此，蘇聯亦是如此。如果離開事實而談理論，那與一般基督教徒在「人間地獄」之前以「天國」騙人者有什麼兩樣？「純粹的民主政治」，既屬「子虛」「烏有」，則在少數人與多數人兩種民主政治之間，不能不慎擇其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雖是一句陳言，其中却含有顛扑不破的真理呢！

現在是兩個世界——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對立的時代。資本主義世界從自由競爭轉變為壟斷制度以後，假幌子的民主政治業經戳破，大半以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代之；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世界內，民主政治已失其存在的

(註三八)同上，第二三頁。

根據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世界的孤島——蘇聯，則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已突破克倫斯基政府統治的網羅，在「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外衣之下，展開民主政治的新局面。這種歷史上劃時代的轉變，使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絕處逢生。「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此景彷彿似之。誰謂「無產階級獨裁」是民主政治最後的破產呢？我在這裏，應該鄭重指出的：蘇聯不僅否定了獨裁政治，同時又使過去的民主政治起了本質的變化，而發展到更高的形式。可見由少數人的民主政治到獨裁政治，由獨裁政治到多數人的民主政治，是政治形式發展上「正」(Thesis)「反」(Antithesis)「合」(Synthesis)的過程；換言之，就是辨證(dialectics)的過程。

綜合這些論據，本節劈頭所提的問題就容易解答了。我在那裏不是說過：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資本家的民主政治」既成了「秋風團扇」，而法西主義的獨裁政治又不是「救命金丹」嗎？這似乎在政治軌道上已無路可走。然由歷史先

生看來，前面還是「別有天地」。在歷史的車輪運轉不息之中，無論所經過的是大道或是危岩，總而言之，它是朝着最後的樂園前進。目前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儘管對於民主政治不利，儘管把民主政治的遺跡——如憲法、政黨、國會等等——掃蕩無餘，這正是逼迫一切憧憬民主政治的人——尤其是小有產者、自由職業者、智識分子，放棄其「中間人」的態度，使資本主義國家內兩大對抗的營壘，界線分明。

不經過黑雲密布，就不會有風暴；不經過寒冬風雪，就不會有春天；不經過殘民以逞的獨裁，（獨裁的方式不一定是法西斯主義的，所以這句話的含義，與相信法西斯主義為歷史過程中必經階段的說法迥不相同，）就不會有更廣泛的民主；這也許是歷史運動的又一鐵律吧！根據這一鐵律，未來的世界即是民主政治之光照徹一切的世界。

假使這種估計不錯，便知道拉斯基、武爾夫、拍息、撒母耳之流，替民主政治的前途躁急，真無異「杞人憂天」了！

一九三四年作，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一卷二期。

校後記

在冷風刺骨的冬天，在黑暗籠罩一切的午夜，我已把這本近四百面的書校完了。校完以後，嘯了一口長氣，似乎有幾句話想說。

這本書內共有二十篇文章，是三四年來在黃浦灘上寫的，且在各種銷路很大的刊物上先後發表過。我覺得這些文章，分開看，雖然各篇獨立，可是拚攏來，仍有某種脈絡互相聯繫，所以把它們編在一起，分爲上中下三篇：上篇是世界政治的演變，中篇是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下篇是世界與中國的前途，並加上一個總名字，叫做「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

本來，世界是很大的，中國也非常遼闊，要分析各方面，當然不是十五萬字的左右的文章所能包舉無遺。不過，就緊急時期幾個主要問題而言，在這本書內

總算大半接觸到了。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世界的中國人，處在暴風雨快要襲來的前夜，先把幾個主要問題鬧清楚，確是饒有興趣的事。

我在分析問題上所用的工具，很簡單，除了一把「社會科學的解剖刀」外，什麼也沒有。正因為所用的「解剖刀」祇有一把，所以這些文章儘管是在不同的時間寫的，甚至隔了兩三年之久，然而內容還能前後一貫，且有許多大胆的臆測，都與後來的事實相符。自然，錯誤是誰也難免的，我不願掩飾，悉存其真。內中有幾篇，在付印前稍加修正，但這不是修正觀點，祇是補充新材料而已。

在文字方面，我很知道一般讀者不愛看歐化的文字，尤其討厭日本化的文字，所以在下筆時，總替讀者設想，極力避免「晦澀」「笨重」……一類的毛病。在這點上，我頗費些工夫。不過，我的文字也有無可諱言的缺點。因為在「五四運動」以前，多翻了幾部「線裝書」，曾有一度揣摩過所謂「詩古文辭」，

以致筆尖上還留着一點「舊氣味」。近二三年來，特別注意改正，幸而「舊氣味」已漸漸減少了。

與這本書同時付印的，還有「戰神翼下的歐洲問題」與「白浪滔天的太平洋問題」，是這本書的「姊妹篇」，不日當與讀者見面。

很慚愧的，這本書都是「鬻文自給」的急就章，不是什麼「名山著作」；所以，我不想拉什麼名人做序文或題跋來「捧場」，祇由自己在校後把想說的話記在這裏。

凡屬看過這本書的朋友——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如肯對內容有所指正，我是異常歡迎的！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燈下十二時，上海。